



Everlasting Memories
The Friendship Between My Family and
Soong Ching Ling

永不飘逝的记忆

——我家与宋庆龄事业的情缘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编
邓广殷 口述 郑培燕 撰文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永不飘逝的记忆

——我家与宋庆龄事业的情缘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编

邓广殷 口述 郑培燕 撰文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宋庆龄文献资料与研究”系列丛书

编审委员会

顾 问

龚心瀚 金冲及 胡锦涛 张 磊 林家有 姜义华 熊月之
沈志华 李玉贞 盛永华 吴景平 邵铭煌 陈立文 宋曹琍璇

主 任

鲁 平

副主任

许德馨 薛晓峰 秦 量 艾柏英 马玉成

编 委

(排名不分先后)

季红星 沈渭滨 蔡建国 沈海平 朱士忠 王金山 邹 镭
黄亚平 刘金驰 陆柳莺 陈亚玲 刘国友 孙娟娟 朱玖琳
邵 雍 王锡荣 宋时娟

总策划

黄亚平

策 划

沈海平 朱玖琳

谨以此书献给

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

宋庆龄诞辰 120 周年！



邓小平题词：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
宋庆龄同志永垂不朽

总 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1893—1981）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伟大战士，被誉为“国之瑰宝”和“二十世纪伟大的女性”。1981年宋庆龄逝世后，在有关部门推动下，宋庆龄文献的整理、编辑出版工作逐步展开，先后出版了《宋庆龄选集》（上、下卷）、《宋庆龄书信集》、《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和《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等资料性著作，推动了宋庆龄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随着学术研究的愈益深入，海内外对宋庆龄研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参与学术研究工作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大家普遍感觉现有的宋庆龄文献资料已不敷使用，亟需有关部门开展有计划、全方位、系统的宋庆龄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以满足广大学者开展宋庆龄学术研究工作的需要。为此，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福利会和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决定联合开展此项工作，编纂出版“宋庆龄文献资料与研究”系列丛书，为有志于从事宋庆龄学术研究的广大学者提供服务，以期宋庆龄学术研究在新的世纪取得更大突破和成绩。

“宋庆龄文献资料与研究”系列丛书计划编辑出版六个系列，即宋庆龄的“档案文献”、“往来函电”、“回忆口述”、“报刊史料”、“海外译著”以及“最新研究”，将开展宋庆龄学术研究所必需的但过去从未在国内公开出版，或虽已零星出版但从未完整、系统公开出版的有关宋庆龄的各类文献资料，以及海外出版的相关文献资料或文献类著作，分门别类予以编选出版和译介，同时也收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系列研究成果。

编辑出版“宋庆龄文献资料与研究”系列丛书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任务，蕴含着非常大的工作量和难度，需要社会各界予以充分支持和协作。为此，我们特地将系列丛书设计成开放的形式，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将符合这个系列丛书要求的作品或项目计划，交与我们评审，如果获得通过，我们将给予包括出版经费在内的各种资助。

2011年是宋庆龄逝世30周年，我们特地从是年起推出这套丛书，以对这位一生“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伟大女性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和怀念。

“宋庆龄文献资料与研究”系列丛书
编审委员会

《永不飘逝的记忆——我家与宋庆龄事业的情缘》

编审委员会

顾 问
金顺德

主 编
陆柳莺 金晓春

副主编
董 卫 麦灵芝

口 述
邓广殷

撰 文
郑培燕

目录 Contents



总序

前言 / 1

1. 经何香凝介绍，父亲与宋庆龄相识 / 1
2. 保卫中国同盟贡献卓越 / 3
3. 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绩斐然 / 8
4. 被迫撤离战火中的香港 / 14
5. 《华商报》——1940年代香港上空的一盏明灯 / 17
6. 筹建中国福利基金会华南分会 / 23
7. 宋庆龄称我父亲为“BB” / 26
8. 仅存的宋庆龄致我父亲的最后四封信 / 30
9. 父亲对我人生的影响 / 36
10. 我与宋庆龄开始通信与往来 / 41
11. 宋庆龄称我为“圣诞老人” / 46
12. 宋庆龄晚年的病痛 / 50
13. 宋庆龄的生活喜好 / 56
14. 宋庆龄抱病送别何香凝 / 59
15. 宋庆龄晚年与廖梦醒 / 62
16. 宋庆龄信中的“肥仔廖” / 65
17. 宋庆龄与路易·艾黎 / 68
18. 宋庆龄与邻居马海德 / 72



19. 宋庆龄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 / 75
20. 安多利恒花背后的故事 / 82
21. 宋庆龄与斯诺一家的友情 / 85
22. 外国友人纷纷来访 / 89
23. 宋庆龄的未了心愿 / 94
24. 为宋庆龄澄清历史事实 / 99
25. 惊心动魄的 1976 年 / 104
26. 宋庆龄亲自过问的一份邀请函 / 110
27. 宋庆龄的感谢与回报 / 112
28. 宋庆龄像一位慈祥的祖母 / 119
29. 保姆李燕娥最后的日子 / 128
30. 巨星陨落在世界的东方 / 131
31. 捐出宋庆龄赠给我的藏书 / 140
32. 邓颖超推荐我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 144
33. 创设“邓文钊优秀教师奖励金” / 146
34. 资助海南文昌市医护人员培训 / 149
35. 在香港接待宋庆龄事业的追随者 / 152
36. 让宋庆龄的遗物“回家” / 157
37. 将珍藏的宋庆龄书信辑集刊布 / 160
38. 捐赠宋庆龄书信的小插曲 / 163

前 言

我们一家与宋庆龄的友谊，始于20世纪的30年代，自我父亲邓文钊开始，至今已延续了三代。我的父亲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以“资产阶级”身份投身革命的一个特例，也是香港革命史上的一个特殊人物。在我脑海里，他的形象是与宋庆龄、廖氏家族以及所有为中国独立和人类进步而奋斗的中外友人的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生爱国，为了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鞠躬尽瘁，可谓是香港爱国人士的典范，由此也成就了他与宋庆龄数十年的友情。

1971年父亲去世以后，邓家与宋庆龄的友谊则由我来传承。宋庆龄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一直与我和我的家人保持着友好交往和频繁的通信。1981年宋庆龄逝世以后，我始终珍藏着她给我和家人的近200封英文亲笔信，并且继续关注和支持着她生前所热爱的事业。

光阴荏苒，而今的我已是一位耄耋老人，我竭尽所能将我所了解的宋庆龄与我父亲的交往以及记忆中有关宋庆龄的片段重新组合起来，以此作为对宋庆龄诞辰120周年的献礼，作为对这位伟大女性的怀念。



2012年12月



1935年我的父亲邓文钊（右）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时的留影

1. 经何香凝介绍，父亲与宋庆龄相识

香港乃弹丸之地，望族之间多有联姻。父亲邓文钊 19 岁那年与我母亲何捷书的婚姻，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我母亲的姑妈便是女中豪杰何香凝，父亲与我母亲的结合使得他与一门忠烈的廖氏家族成了亲戚。

廖氏家族是父亲与宋庆龄之间友谊的纽带，父亲与宋庆龄的相识就是由何香凝介绍的。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12 月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12 月底，宋庆龄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经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掩护，由中共联络员李云暗中陪同，乘坐外国轮船到达香港。中国共产党建议宋庆龄转移到香港，除了出于对她安全上的考虑外，还因为在香港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需要以及宋庆龄在这里工作具有诸多便利条件。香港当时是所谓“保持中立”的自由港，有着比内地其他地方更为宽松的活动空间。这里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各条战线的爱国人士；许多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也来到这里，或经此转赴内地，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宋庆龄有着高涨的爱国热情，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望，她在这里主持开展抗战活动，可以更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救国力量。差不多同一时期，何香凝也举家来到香港，暂住在我家。在香港期间，何香凝与宋庆龄的联系非常密切。经何香凝介绍，父亲认识了宋庆龄。

我的父亲本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结识了孙夫人宋庆龄后，父亲便竭尽所能，为宋庆龄提供生活上的便利。宋庆龄初到香港时住在干德道 11 号 2A，位于半山区，有时候出行需要汽车，虽然她的弟弟宋子良有汽车可以供她使用，但有些时候宋庆龄不方便使用或者不想使用宋子良的车，我父亲便安排他比较熟悉的明星的士公司为宋庆龄



香港坚尼地道130号邓文钊寓所，俗称“红屋”

提供租车服务，让她可以方便地乘坐记账出租车。宋庆龄的有些会见不方便在自己的寓所进行，父亲就帮她将会见地点安排在邓家的大宅“红屋”。邓家在浅水湾有个私人游泳棚，到了夏天，父亲就将这个游泳棚提供给宋庆龄招待朋友。廖家的人也是那里的常客。廖梦醒经常在星期天带着年幼的女儿李湄去那里。不下水游泳的人就坐在棚里聊天。现今我们所见到的一张宋庆龄与我父亲、李少石（廖梦醒的丈夫）等在邓家游泳棚的照片，便是宋庆龄挚友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于1939年拍摄的。除此之外，我父亲还负责供应宋庆龄生活所需的用品和药品等，对宋庆龄关心有加。

除了在生活上的照顾之外，父亲也积极参与和支持宋庆龄的工作，他与宋庆龄持续数十年的友谊，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1939年于香港浅水湾邓家游泳棚。
左起：宋庆龄、邓文钊、李少石等

2. 保卫中国同盟贡献卓越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如火如荼，宋庆龄在香港的四年为抗日救亡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创立和领导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

“保盟”这一机构的产生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那时候，抗日战争形势严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条件异常艰苦。来自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人士的捐款，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对捐款渠道的控制而无法送达八路军、新四军手中。鉴于这样的形势，中共感到有必要成立一个机构来从事这一工作。这个机构必须是能够冲破蒋介石政府阻挠的民间组织，而且能同国际友人、海外侨胞以及他们的救援机构进行联系和交往，并且成为捐赠者与中国抗战第一线军民之间的桥梁。这一机构还需要由一位在国际上有声望的人士来主持。宋庆龄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在争取海外援助方面，早已成为一面特殊的旗帜，很多海外人士响应宋庆龄的号召，为中国抗战捐款，所以宋庆龄是主持这一机构最合适的人选。

“保盟”这一机构的产生以及名称的确定都是在邓家的“红屋”酝酿的。那是1938年4月初的一个傍晚，表姨妈廖梦醒和表舅廖承志邀请了一些中外人士在我父亲家中聚会，其中包括著名记者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据贝特兰的回忆，在这次聚会上，廖承志谈及当前迫切需要在西北地区建立一家国际和平医院并继续组织募捐，还透露将要成立一个新的机构，由孙逸仙夫人宋庆龄领导。在那次聚会上，“保卫中国同盟”这个机构名称被提出来并获得了通过。

1938年6月14日，在宋庆龄位于香港干德道11号2A寓所的小客厅里，“保盟”正式宣告成立。“保盟”的英文全称是China Defence League，其主要任务是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结合起



香港西摩道21号保卫中国同盟旧址



1938年冬，“保盟”中央委员合影。
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
宋庆龄、司徒永觉夫人、诺曼·法
朗士、廖承志

来，同时“保盟”也担负着在国内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特作用。“保盟”的中央委员中，宋庆龄任主席，廖梦醒任秘书兼办公室主任，我父亲任司库，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中文名，原名 Percy Selwyn Selwyn-Clarke）的夫人希尔达·布朗宁（Hilda Browning）任名誉秘书，诺曼·法朗士（Norman France）任名誉司库。贝特兰也是中央委员，他的一个任务是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地做宣传工作和帮助筹款。有了这些知名人士以及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友好人士的参与，“保盟”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保盟”的主要工作是为抗战前线募集捐款和医疗用品，同时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实际上从事的是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前获得中共中央组织部承认的少数几个革命团体中的一个，而且从一开始就是在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关怀下开展工作的。




抗战期间运送海外
援华物资的香港码头

宋庆龄磁石般的个人魅力，将一大批国内外进步人士团结在她周围，通过“保盟”这个机构，为了正义的事业不懈努力着。在宋庆龄的领导下，“保盟”很快与英、美、法、加、澳等国援华组织建立了联系，并获得了大量援助。从1938年6月14日“保盟”创立到1939年6月15日为止，13个月中各国朋友通过“保盟”捐助的款项共约25万港元（约合8万美元），这些捐款大多用以购买医疗物资运往内地。

“保盟”对中国国际和平医院的建立做了很大贡献。除了争取英国援华委员会和一些国际组织的援助，将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边区五台山建立的一所八路军医院改建为国际和平医院以外，“保盟”又通过多方募捐，在延安、

1941年7月15日《华商报》关于“保盟”为国际和平医院筹款的报道



保衛中國同盟

售章籌款救傷

爲我各戰區國際和平醫院

按發司夫人等積極推動

已定期本月十九日舉行

（本報特訊）

萬國國際和平醫院（即原中國同盟）現定於本月十九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在華商會舉行籌款救傷義演。屆時將有各國人士參加，並由宋慶齡夫人主持之女界領袖團演說，並由陳嘉庚夫人及蔣經國夫人等，目擊演說。該團演說內容，係關於救傷及及防空等問題，屆時分演九項，並由宋慶齡夫人主持。演說之中心，在於救傷及及防空，並由宋慶齡夫人主持。演說之中心，在於救傷及及防空，並由宋慶齡夫人主持。演說之中心，在於救傷及及防空，並由宋慶齡夫人主持。

邯郸和苏北相继成立国际和平医院。这些战时医疗机构的条件相对比较好，在救治伤员、预防疾病、提高公共卫生水平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保盟”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援助也是极其可贵的。宋庆龄指示“保盟”不仅要利用自己的出版物《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宣传八路军和新四军，还要积极为这两支军队筹集捐款和大量医疗物资。此外，“保盟”还资助过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和抗日军政大学，救济过战灾儿童和难民。

据不完全统计，“保盟”在三年半时间内约送出120多吨药物和其他救济物资，平均每月送出3吨左右。这样庞大数量的物资，运送途中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就是在香港，也需要有个仓库存放才行。幸好我父亲在西环西安里和轩尼诗道有两个大仓库，提供给“保盟”存放过境物资。1939年冬天，新四军军长叶挺在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陪同下到香港拜见宋庆龄。宋庆龄设家宴招待他们，向他们介绍“保盟”对新四军的援助计划，还陪同叶挺去我父亲提供给“保盟”存放物资的仓库，清点查看即将发运的援助新四军的物资。



《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第24期



1940年代戴爱莲
参加抗战募捐演出

在向海外募捐的同时，“保盟”在香港举办各种赈灾或筹款义演活动。舞蹈家戴爱莲、歌唱家斯义桂等多次参加“保盟”为筹款而举行的义演。戴爱莲祖籍广东，1930年代赴英国伦敦学习舞蹈，是我父亲在英国留学时认识的。1940年3月戴爱莲刚从英国回到香港，宋庆龄便邀请她参加“保盟”为支援抗日前线与国际和平医院而举办的募捐义演，戴爱莲欣然同意，多次为“保盟”的筹款活动义演，还曾经特别创作了一个现代舞《东江》献给宋庆龄。

宋庆龄积极领导“保盟”的各项工作，很多事情亲历亲为，例如起草文件，特别是英文信件等，大家总是看到宋庆龄在打字机前工作；“保盟”为八路军提供救援物资，宋庆龄常常亲自参与打包的工作，并与司徒永觉夫人以及法朗士前往码头视察支援抗战物资的装运情况。我父亲作为团结在宋庆龄身边的爱国进步人士之一，既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成员，又担任了“保盟”司库。在宋庆龄精神和人格魅力的感召下，父亲满怀爱国热情，积极参与“保盟”发起的募捐，当募集来的资金、医药和其他物品源源不断运到香港时，他与宋庆龄、何香凝、廖承志、廖梦醒等组织“保盟”和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人员认真接收入库，分类安排船只运往抗日前线，用于供给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战队伍。同时，我父亲还利用任华比银行华人副经理的便利条件，为海外捐款作财务上的安排。

3. 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绩斐然



“工合”运动标志

1937年，以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和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夫妇为首的一些外国友好人士，联合中国爱国人士胡愈之、沙千里、章乃器、孟用潜等发起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在各地建立生产自救组织——工业生产合作社，旨在将失业工人组织起来，寓救济于生产，支援军需和民用，支援抗日战争。“工合”成立后成为“保盟”重点帮助的组织之一，“保盟”不仅在自己的刊物上向国外友人介绍了“工合”的情况，呼吁人们对它帮助，宋庆龄还在她的对外广播讲话中介绍中国发展工业合作运动的计划，说明发展工业合作运动在重建社会、改善经济、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的作用，呼吁国际社会通过提供资金援助中国的战争灾民，允许他们以赊购机器、原料，选派技术人员来中国等方式帮助“工合”的发展。因此，“工合”与“保盟”，实际上是两个殊途同归的组织，“保盟”通过筹款捐物，“工合”通过发展经济，最终目的都是支持抗战。

当时正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募捐到的款项，他们企图据为己有。为了便于与海外联络，促进“工合”运动的发展，更有效



1939年宋庆龄在香港与埃德加·斯诺讨论开展中国工业合作运动

地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并将国外的援助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且不被国民党官吏贪污，宋庆龄团结国内外著名人士，于1939年1月在香港倡议成立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并任名誉主席。

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工作班底几乎就是“保盟”的原班人马，即团结在宋庆龄周围的爱国人士，其中当然也包括我的父亲。而宋庆龄本人就是一面旗帜，是廉洁的象征，外国友人觉得工合国际委员会是捐款不被国民党贪官贪污的可靠保证。同时，这两个组织也得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后，在国际上宣传抗日，得到众多国际友人、海外华侨的支持。宋庆龄还着手进行在国外建立工合促进委员会的工作，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工合”运动的开展。

“保盟”对“工合”的援助最有名的、也是声势最浩大的举措要属1941年夏天与工合国际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一碗饭运动”。该运动最早是美国医药援华会于1937年首倡的，每年在美国友人和华侨中举行一次募捐，所得善款用于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以支援中国抗战。后来该运动在英国影响也逐渐扩大，国际人士因对中国难民深切同情，纷纷解囊相助。

1941年的中国形势十分严峻，广州已经沦陷，日军对香港步步进逼，同时，黄河泛滥，受灾地区的灾情十分严重，大量难民逃难到西北地区。此时的香港，民众爱国热情高涨，港九各界纷纷发起募捐，支援抗战，救济难民。1941年5月6日，“保盟”在香港成立了“一碗饭运动”委员会。为促进这次运动，宋庆龄亲自担任名誉主席，香港立法局的华人首席议员罗文锦律师担任主席，“保盟”名誉秘书司徒永觉夫人担任副主席。经委员会研究决定，这场运动的募捐形式是委员会以每张2元的价格发放1万张餐券，持券者可到指定的餐馆吃一碗炒饭，由参加赞助的饭店、酒家、茶室提供。活动的全部收入都将捐赠给工



1941年7月1日、2日《华商报》关于“一碗饭运动”的报道

合国际委员会作为救济基金。消息传出后，港九地区的饭店、酒楼、茶室、西餐馆都积极响应。

7月1日晚，在香港英京酒家举行“一碗饭运动”开幕典礼，香港各界名流百余人齐聚，其中有英军驻香港陆军总司令贾乃锡、海军司令哥连臣、辅政司史美夫人、医务总监司徒永觉、中国“工合”技术顾问路易·艾黎、香港华商会主席郭泉、中国红十字会主席林可胜以及工商界著名人士周寿臣、林培生等。

宋庆龄当时身体不适，仍抱病主持开幕式并发表了讲话。她说：“这次捐款是要帮助工业合作社组织及救济难民伤兵，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宋庆龄还在会上义卖她珍藏的孙中山先生遗墨及其他文物和纪念品。会上放映了路易·艾黎拍摄的介绍“工合”情况的电影，还听取了从灾区视察归来的英国友人巴吉尔的报告。

在宋庆龄的号召和影响下，香港各界人士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和响应“一碗饭运动”。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筹备，“一碗饭运动”于8月1日正式开始。原定举行三天，由于民



1941年8月1日《华商报》关于“一碗饭运动”开始的报道及广告



1941年8月2日《華商報》關於“一碗飯運動”第一天的報道

众爱国热情高涨，要吃“爱国饭”的人太多，致使这一活动一再延长，一直到8月30日结束。据不完全统计，仅一个多月，共募得港币22144.95元，国币615元；另外，香港振华会也慷慨认捐，将港币捐款凑足整数，即25000元整，全部捐助给工合国际委员会。

9月1日，宋庆龄在英京饭店主持“一碗饭运动”结束典礼，何香凝、印度妇女大会领袖卡玛拉黛芙（Kamaladevi）夫人等中外来宾、各社团代表百余人出席。何香凝和卡玛拉黛芙夫人先后讲话，祝贺该运动在短时期内所取得的好成绩。宋庆龄向英京等13家被指定就餐的酒家，分别赠送了绣有孙中山手迹“爱国模范”的锦旗，还给英京、小祇园、乐仙三家业主赠送了孙中山的遗墨“努



1941年8月6日《華商報》關於廖夢醒與貝特蘭在小祇園吃炒飯的報道



1941年9月2日《華商報》關於“一碗飯運動”結束典禮的報道

力前进”作为表彰和鼓励。

宋庆龄的不断呼吁，很快在大洋彼岸也得到了响应。在美国同时开展的支援中国抗战的“一碗饭运动”中，一天之内就募集到了30多万美元。

除了“一碗饭运动”以外，“保盟”帮助“工合”筹款的活动还有1941年11月的嘉年华会。11月11日下午5时，“保盟”与工合国际委员会联合在香港海军操场举行嘉年华会开幕式，宋庆龄主持仪式并用英语发表了讲话。众多知名人士如何香凝、柳亚子、陈淑英、陈翰笙、钟秉铎以及美国平准基金会的福克斯、香港社会名流周寿臣、郑铁如等出席了大会。“工合”顾问艾黎专程从重庆来香港参加。宋庆龄在致词中对英、美等国友好人士支持中国抗战表示感谢。开幕式结束后，宋庆龄与众人参观了“工合”产品展览。展会上展出“工合”的产品包括各种织品、刺绣、机电、化学、军用物品等百余种，香港中国国货实业服务社也组织各厂商参展。“工合”的产品很受欢迎，



1941年11月12日《华商报》关于嘉年华会的报道



1941年11月13日《华商报》关于“工合”展览在嘉年华会的报道

大家踊跃购买。

嘉年华会持续了三个星期，各类活动丰富多彩，有香港出版的各类图书展销，当地文艺团体、学校、精武体育会的轮流表演，还有服饰展销、化装晚会和电影放映，以及各类娱乐活动等，吸引了大量群众，热闹异常。嘉年华会也受到中、英、美各国名流热烈赞助，充分表现三大国的合作精神。嘉年华会共筹得港币2万元，存入银行。可惜随着香港沦陷，这笔款项被日本侵略者冻结。

我父亲作为工合国际委员会成员，对于“一碗饭运动”、嘉年华会，自然积极参与。然而，我父亲是一位不求闻达的实干家，对自己为革命所做的事情从来绝口不提。所以，他究竟是如何为这些革命活动出力的，至今已无从考证。但是，有一点明确无误的是，这些宋庆龄在香港为了支援抗战，为了拯救民族危亡而进行的活动，父亲都是全力支持的。宋庆龄也从中对我父亲的为人和他的爱国热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抗战胜利后，工合国际委员会由香港迁往上海。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防止国民党没收筹得的款项，工合国际委员会又在香港注册了国际合作商业有限公司，将所余5万元款项从上海转到香港这家公司的宝生银行账户里。公司最初的注册人是我父亲，后来加入者有当年任保卫中国同盟会计师的陈乙明，以及一位名叫查尔斯·史密斯（Charles Smith）的路透社记者。1951年工合国际委员会停止活动，但在香港的国际合作商业有限公司一直存在。我父亲虽然在1950年代初已回国参加工作，但他仍然是该公司的注册人之一，直到1962年他自己提出作为广东省副省长不宜担任公司董事，他的名字才被取消。父亲和陈乙明在1970年代相继去世后，公司董事由我和陈乙明之子陈文裘接任。1987年，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恢复工作，此时“工合”存在香港的款项已由5万元连本带利增值至40余万港元。我和陈文裘将这笔款项交还“工合”，并结束了在香港的国际合作商业有限公司。

4. 被迫撤离战火中的香港

1941年12月8日，日本轰炸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轰炸威克岛、关岛、马尼拉、新加坡、香港等地英美军。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是日早晨8点，数架日军飞机空袭了香港、九龙。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之下，香港到处烈火熊熊，火光冲天。

早在日军空袭香港的几天以前，宋庆龄就已经收到各方劝告，请她离开香港，其中也包括她的保镖马坤以及远在美国华盛顿的弟弟宋子文。但是宋庆龄没有同意，她要留下来帮助受战争之苦无家可归的难民。12月6日晚上，宋庆龄还与大姐宋蔼龄一起参加了在半岛酒店举行的赈灾筹款舞会。12月8日凌晨日军空袭时，宋庆龄与女佣躲到了隔壁邻居家的地下室。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曾将那天宋庆龄与他电话联系的谈话内容整理后发表在次日的《南华早报》上，宋庆龄向港人描述了来自空中的灾难，号召全港人民在共同的危险面前团结起来，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将中国的斗争同英国、俄国以及美国人民的努力联系起来，建立全世界的民主战线，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粉碎世界各地的法西斯主义。当天晚上，宋庆龄在中



1941年12月日
军轰炸下的香港



1941年12月25日英
军投降，日军进入香港

央银行广州分行经理钟秉铎的帮助下，趁灯火管制期间从九龙逃到了港岛。12月9日上午，宋庆龄主持召开“保盟”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研究决定各种应变措施。宋庆龄仍然坚持要留在香港，与大家共患难，但是大家都不同意她留下。为了更好地开展以后的工作，宋庆龄只得同意离开香港去重庆。12月10日凌晨5时，宋庆龄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前往重庆。第二天凌晨，启德机场就沦入日军手中。

宋庆龄离开香港以后，我父亲与其他留在香港的“保盟”成员根据会议决定着手处理诸如疏散隐蔽人员，销毁相关文件、资料等各项事宜。12月25日，香港完全沦陷。日本人一入港，就大肆搜捕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我父亲因支持抗日，也受到日军和汉奸的威胁。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共南方局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开展对在港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的营救工作，分批将他们转移到东江抗日游击区等地。我的父亲便是那时候由廖承志派人掩护第三批离开香港的，同时离港的还有茅盾、邹韬奋等。不久，邓氏全家也由专人护送到达东江纵队的游击区，与父亲会合。

父亲再次见到宋庆龄是 1943 年在重庆。宋庆龄当时住在重庆两路口新村 3 号，继续进行着保卫中国同盟的活动，她的寓所也是“保盟”重建后的办事处。廖梦醒也在重庆，协助宋庆龄恢复“保盟”的工作，依然担任“保盟”的秘书兼办公室主任。父亲在重庆的时候就住在廖梦醒家，离两路口宋庆龄的寓所很近。正是在这里，我父亲又见到了宋庆龄。宋庆龄设宴招待了我父亲。父亲还见到了从香港日军集中营逃出来的老朋友爱泼斯坦夫妇。爱泼斯坦夫妇从香港到重庆后，有段时间在廖梦醒家里“搭伙”。老友相见，分外高兴，大家相谈甚欢。也是在这个时候，经廖梦醒介绍，父亲第一次见到了中共高层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他们向父亲了解何香凝的情况。当时，何香凝为了营救在粤北被国民党逮捕的廖承志，四处想办法，始终不遂，滞留在桂林，正在想方设法前往重庆。父亲向周恩来汇报了他在韶关和桂林与何香凝见面，商量营救廖承志的情况。那时，我们一家还住在韶关，父亲返回韶关时，周恩来还让他带了一笔钱给东江纵队。

此后，父亲带着全家辗转于桂林、梧州、罗定、澳门，直到抗战结束才返回香港，因而他没有直接参加这一时期“保盟”在重庆的工作，但是他与宋庆龄的友谊却一如往昔。

5. 《华商报》——1940年代香港上空的一盏明灯

太平洋战争以前，武汉、广州等地相继失陷，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加之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当局加紧迫害大后方的进步文化人士，众多不满国民党反共分裂政策的文化人士如夏衍、邹韬奋、范长江和梁漱溟等，纷纷从内地来到香港。与此同时，国民党加紧在海外进行反共宣传，在香港出版针对共产党的刊物。香港的中文报纸也受到国民党和港英当局控制，香港同胞和广大华侨看不到进步刊物。于是，1941年2月，廖承志向周恩来请示在香港办一份报纸，发表中共的重要文件，但不要太露锋芒。周恩来接受这一建议，指示廖承志团结在香港的文化人和报人，创办一份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报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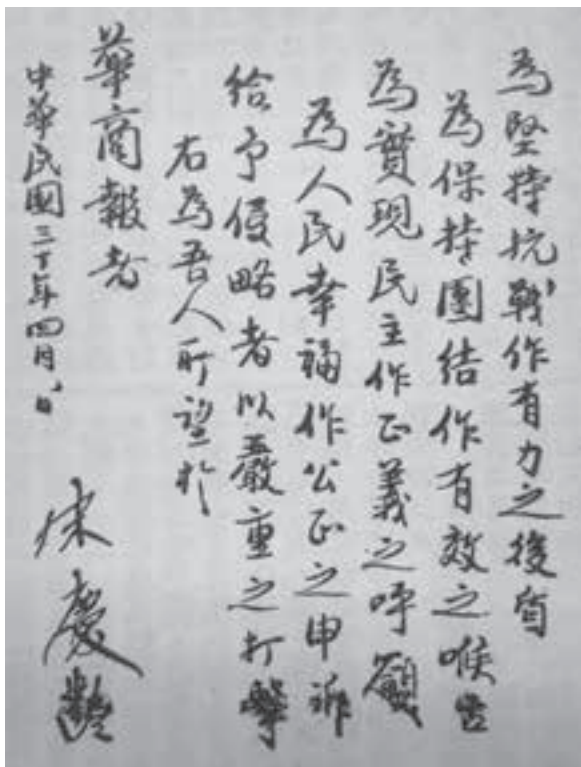
这一设想也得到了宋庆龄的赞同和支持。宋庆龄联系她的助手金仲华，将在香港的一批文化人和报界人士如邹韬奋、茅盾、夏衍、范长江、张友渔、韩幽桐、胡仲持、乔冠华、陈翰笙等召集起来讨论办报事宜。经商讨决定由“保盟”拨款，“保盟”的三位执行委员金仲华、邹韬奋以及我父亲，与夏衍、范长江、杨潮（笔名羊枣）、胡乔木一起筹办并组成编委会。报纸定名《华商报》，意为华侨商人办的报，基调是主张团结、民主、抗战，也体现统一战线性质，而且作为商业性的报纸，不带政治色彩，也容易在香港立足。大家商讨后决定从孙中山的墨宝中选出“华商报”三个字作为报头。

办报主力以及报名商定后，还需要一位在香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作为“法人”向港英政府申请注册，并付几千元的保证金。这一重任落在了我父亲的肩上，因为我父亲具有爱国热情，有社会地位，有资产，也愿意为中共承担风险。我父亲还说服了其兄长邓文田参加这一工作。于是，我二伯邓文田出面担任“督印人”兼总经理，我父亲、范长江为副总经理，由范长江任社长，胡仲持为总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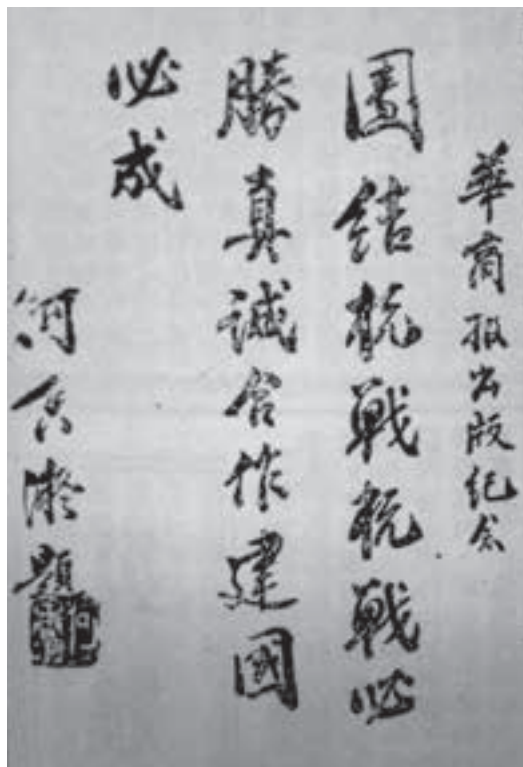
1941年4月8日，《华商报》正式创刊。宋庆龄为创刊号



《华商报》报头



《华商报》创刊号宋庆龄题词



《华商报》创刊号何香凝题词



《华商报》创刊号何东爵士题词

题词“为坚持抗战作有力之后盾；为保持团结作有效之喉舌；为实现民主作正义之呼吁；为人民幸福作公正之申诉；给予侵略者以严重之打击”。何香凝为创刊号的题词是“团结抗战，抗战必胜；真诚合作，建国必成”。创刊号头版的醒目位置，刊登的则是香港富商何东爵士的题词“唤起侨胞”。这些题词增加了报纸的工商业色彩，激发了侨胞的爱国之心，增强了华侨、工商及社会各界对该报纸的感情，具有很强的号召力。

《华商报》创刊后，开辟了很多栏目，名人荟萃，内容翔实，立场鲜明，分析透彻，文笔生动，见解独到，吸引了海内外众多读者，各领域的文化精英也纷纷为之撰稿。报纸还以各种形式，向广大华侨宣传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也报道宋庆龄、何香凝对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张以及相关的活动。自1941年7月，《华商报》连续报道了宋庆龄发起



1941年7月7日《华商报》刊登的宋庆龄文章《七七四周年》

的“一碗饭运动”的盛况。7月7日，刊登了宋庆龄撰写的题为《七七四周年》的纪念文章，号召全民族团结抗日。该文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抗战到底，而唯一使我们继续抵抗的条件也就是使抗战得以开始的同一条件，这就是：全民族的抗日团结。”文章还严厉批评了皖南事变的制造者干出这一“破坏内部团结主张妥协或投降”的勾当。8月1日刊登了宋庆龄为“一碗饭运动”的题词“日寇所至，骨肉流离。凡我同胞，其速互助”。11月12日报道了“保盟”与“工合”联合举行的嘉年华会。11月28日刊登了宋庆龄为纪念邓演达被国民党杀害十周年所写的文章《纪念邓演达》。

《华商报》在广大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中产生了广泛的、深远的影响，曾经有新闻历史学家评价《华商报》“是40年代高挂在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上空的一盏明灯”。

《华商报》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离不开廖承志的领导、中共的支持和广大进步报人的努力。我的父亲也为办《华商报》承担了大量具体的工作，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华商报》开办之初，我父亲与我的伯父邓文田各



1941年11月28日《華商報》刊登的宋慶齡文章《紀念鄧演達》

出资 2 万元，帮助报社购买了一间印刷厂（香港科学印务公司），后又与华侨陈嘉庚合作，由陈嘉庚出资 3 万，我父亲出资 2 万，扩充机构和设备，解决了印刷及经济亏空的问题。不仅如此，父亲还与邓文田在廖承志的领导下，利用银行家与地产商的合法地位，为报纸的顺利出版四处联络。《华商报》能够顺利出版，也离不开宋庆龄的支持。由于报纸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在华侨中引起很大反响，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和破坏，他们采取各种方法打压《华商报》。香港警察总监俞永时访问重庆时，戴笠要求他取缔《华商报》。俞永时返回香港后，宋庆龄出面宴请他，廖承志、邹韬奋以及我父亲作陪，与俞永时联络感情，也做解释工作，成功将此事化解，报纸得以继续维持。遗憾的是，《华商报》只存在了八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报纸被迫停刊。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华比银行恢复业务，我父亲仍担任华比银行华人副经理。令父亲非常欣慰的是，他又可以为革命做事了。他经常利用自己上层社会的特殊身份为中共华南的共产党人交接银钱、安排会面等。邓家位于坚尼地道的“红屋”又成为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会面的地方。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占领香港这块宣传阵地，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区党委派员到香港，组建新的宣传据点。广东地区党委派宣传部长饶彰风找到我父亲，请他帮忙恢复《华商报》。

然而，在过去被日本占领的几年中，香港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邓家的产业也在战争中受到损害，经济能力大不如前，且一时也难以恢复。我父亲拿不出大量现款，于是将邓家位于荷里活道 204 号的房屋提供给《华商报》作办公地点。父亲利用在香港上层社会的地位，联络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支持《华商报》。在他的努力下，1946 年 1 月 4 日，《华商报》正式复刊。复刊后的《华商报》依然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腐败。1946 年 1 月 16 日，《华商报》刊登了宋庆龄 14 日在中国福利基金会（时称“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复刊后的《华商报》，总经理和督印人由我父亲担任，因而筹款维持运营的重任又落在了我父亲肩上。为了《华商报》的正常运营，父亲可谓绞尽脑汁，不仅通过种种办法筹集资金，也曾经请求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支持。宋庆龄对此非常重视，提请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委员们在 1946 年 5 月 14 日的会议上讨论并解决。当时，宋庆龄身体不适，没能亲自出席会议，她给委员们写了一封信，将资助《华商报》的问题列入了会议的议题。宋庆龄特别在信中提到《华商报》是支持由三百人组成的东江游击队的，因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救济援助的对象也包括东江纵队活动区，因此，她提请委员们讨论对于资助该报有没有意见，以及如何筹款，是否需要特别补助。

到 1947 年，《华商报》成为中共在解放区以外唯一的宣传喉舌，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揭露国民党制造内战、倒行逆施，动员爱国民众和海外华侨支持解放区的舆论阵地。国民党视《华商报》为眼中钉、肉中刺，采取各种方法破坏。自 1947 年起，港英政府与国民党勾结，对进步势力



复刊后的《华商报》，督印人兼总经理为邓文钊

施加压力，《华商报》遭遇空前的困难，经常受到反动势力的破坏，门市被捣毁，派送报纸的报童被殴打，新印的报纸被烧毁，经济陷入困境。

在威胁和困难面前，我父亲没有退却，而是积极想办法解决。他又在 1947 年 2 月 15 日致宋庆龄的信中向她求助。他说：“我现在的经济负担相当沉重，已经不堪重负。濒临停刊之际，‘工合’曾经资助了一些钱款，我希望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也能匀出一部分款项，帮助我们维持运营。我们现在每天维持得都十分艰难。”

《华商报》一直坚持到 1949 年 10 月 15 日广州解放翌日才自动停刊，与广州《南方日报》合并。我父亲为《华商报》所做的工作，得到了中共的赞扬。廖承志曾经说过：《华商报》在经济上靠邓文钊维持，他是一个“桥头堡”。周恩来也曾给我父亲等人写信，称他们的工作“成就甚大”。

父亲在困难的时候，想到向宋庆龄求助，也是他们之间友谊的体现。虽然父亲与宋庆龄不在同一个阵地，但是父亲与宋庆龄一样，满怀爱国热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能够早日脱离战争的苦难，建立真正人民民主的政权。

6. 筹建中国福利基金会华南分会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宋庆龄于1945年底将保卫中国同盟迁往上海，并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从事救济及福利工作，其宗旨由支持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改为支持战后的进步文化活动，救济孤儿及支持解放区，包括东江纵队活动地区和游击区。我父亲则带着全家回到香港，仍担任华比银行华人副经理。宋庆龄与父亲的友情依旧，也有书信联系。

1946年1月14日，中国福利基金会（时称“中国福利基金会委员会”）正式成立，宋庆龄在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国际人士支持中国福利基金会，给中国人民更多的援助。宋庆龄在讲话中说：“广大中国人民的福利，需要全世界的友人和同情者宽仁善意的帮助。中国现万分需要精神、物质和技术的支援，以渡过战后这一段困苦的时间。遭遇着许多政治和军事问题，中国政府无法应付目前的情势。国际上各救济机关，虽则曾作过种种可敬和最大的努力，但还是不够。中国还需要外国友人进一步的援助。中国所受到的创伤，还要一段长的时间才能痊愈……”这篇讲话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1946年1月16日《华商报》关于宋庆龄创办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报道

中国福利基金会正式成立的当天，宋庆龄给香港汇丰银行行长去信，要求归还“保盟”战前存在该行的一笔8394.2港元的存款。宋庆龄是从我父亲那里得知还有这样一笔款项的。我父亲曾担任“保盟”在香港时期的司库，处理财务方面的问题，因而对“保盟”账目十分清楚。战争结束后，新成立的中国福利基金会要开展各项工作，帮助中国人民进行善后和恢复正常生活，非常需要资金。于是，宋庆龄以中国福利基金会主席的身份，向香港汇丰银行行长呼吁归还该笔款项。

中国福利基金会成立以后，利用对外宣传，从国外的援华机构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为解放区的民众争取援助，通过各种渠道，突破国民党的封锁，向解放区运送了大量的医药物资和医疗器材设备，对解放区救济总会的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中国福利基金会还从事了大量的社会救济工作，赈济难民和孤儿，救助贫困的文化界人士。这些工作，我父亲没有直接参与。

但是宋庆龄从没忘记我父亲这位与她共同战斗过的老朋友，曾经筹建中国福利基金会华南分会，并希望我父亲再度成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成员。当时的香港，虽然集中了许多爱国人士，但“保盟”机构已经不复存在。于是住在香港的何香凝于1946年底致函宋庆龄，建议在香港设立中国福利基金会华南分会。宋庆龄于1947年1月2日回信给何香凝说：“中国福利基金会如在华南设立分会，由夫人等号召主持，必能扩大工作，庆龄自极赞同，敝会在港原有会员邓文钊君等希共策进行。”

关于此事，我父亲也非常赞同。他在1947年2月15日致宋庆龄的信中说：“醒姐来信告知您赞成在香港设立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分会。这个想法极好，因为该分会可以接收来自世界各地以及英联邦的华人的捐款。香港货币稳定，是进行这项工作最理想的地方。如果我们请他们将钱款汇到香港的分会，而不是汇到上海，我们可以有很大成效。”

此后，宋庆龄多次致信何香凝和我父亲，讨论建立该分会的一些细节，还曾经派中国福利基金会执行委员金仲华到香港，与何香凝和我父亲等商讨该分会该如何运作。宋庆龄还建议我父亲安排以香港中国福利基金会分会司库的名义开立一个独立的账户，并授权我父亲对该账户承担责任。但是后来这一设想不知为何没有付诸实行。尽管如此，父亲对中国福利基金会支持的东江纵队也是很支持的，念念不忘为东江纵队筹款。他曾经写信给爱泼斯坦，希望他争取美国援华会给东江纵队经济上的支援。他还通过爱泼斯坦动员著名作家斯诺以及其他友好人士支持解放区。

7. 宋庆龄称我父亲为“BB”

新中国成立后，港英当局视之为敌，周恩来担心我父亲在香港受到迫害，便叫他到广州居住。1950年，父亲回到广州，被任命为广东省商业厅副厅长。不久，他协助何香凝、廖承志发动华侨支持社会主义建设，联合众多好友和爱国人士如香港工商俱乐部的积极分子陈祖沛、王宽诚，澳门的何贤、马万祺，泰国的蚁美厚，美洲的司徒美堂等，促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公私合营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并被选为董事长。父亲运用自己的经济才能，使华企发展良好，为抗美援朝、打破英美禁运、稳定物价做了很大贡献。他还在廖承志的指导下，鼓励华侨和港澳同胞集资兴建了北京第一家合资饭店——新侨饭店。该饭店也成了父亲每次去北京的落脚点，每次他去北京，都请廖家的人去新侨饭店吃西餐。

1952年6月25日，父亲作为工商界的代表之一，跟随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乘飞机赴莫斯科转往德国柏林，参加了自7月1日起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三次会议。1955年，父亲经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推荐，被任命为广东省副省长，分管华侨事务、投资业务、港澳联络以及经济发展工作。他还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商业厅副厅长，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广东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华侨联谊会副主任委员。

除了为国家建设出力以外，父亲一直以来都是以廖承志、何香凝、宋庆龄等革命前辈的事情为己任的，抗战期间多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解放后，他主要为他们解决日常生活用品的问题。利用往来于广州和香港的便利条件，父亲常年为他们提供国内购买不到的物品。

父亲一生喜欢结交朋友，许多团结在宋庆龄、廖承志身边的国际友人，如爱泼斯坦、路易·艾黎、马海德以

及曾先后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工作过的谭宁邦（Gerald Tannebaum）等，都是父亲的朋友。那些年，只要有朋友去北京，父亲便会托他们带东西给宋庆龄和廖承志。宋庆龄所需的进口用品，如打字带等，都是父亲买了交谭宁邦转交给宋庆龄的。曾任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的何贤与马万祺两位爱国人士也是廖家以及邓家的好友，他们可以享受出入境免检的待遇，父亲也经常通过他们带日用品和药品给廖承志、宋庆龄。宋庆龄对于父亲为她所做的一切非常感谢，视父亲如同子侄，亲切地叫他“BB”，父亲则称宋庆龄为“Aunty”。

然而，在那些年里，父亲的日子却不是那么好过。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父亲因仗义执言，为受到冲击的时任广东省工商联副主委的好友陈祖沛说话，险些被打成右派分子，被撤去广东省副省长和广东省工商联主委的职务，不久又目睹陈祖沛被打成右派后跳楼自杀的惨状，精神受到很大刺激。他在少年的时候，因为祖母曾灶娇被半夜入室的贼人杀害，精神受过刺激，此次又亲眼目睹好友跳楼后血淋淋的场面，再次受到刺激，以致长期失眠，进而发展成精神分裂症，不得不住进医院养病。父亲一病八个月，当时廖承志非常关心他，1957年秋天写信开导他，还亲自到中山大学附属医院的病房探望。父亲病情稳定出院后，廖承志安排他去北戴河疗养，又去东北参观。1959年又随同一个华侨工商界代表团前往苏联、东欧参观访问，为期两个月。回到广州以后，父亲一扫在反右斗争中产生的颓丧，精神焕然一新。1961年底，父亲恢复了副省长职务，积极投入家乡建设，并按廖承志的指示，利用副省长的职务做一些统战工作。

尽管处境艰难，父亲还是很挂念宋庆龄，除了为她提供生活用品，还多次去看望过她。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上海，致力于中国福利会妇女儿童福利事业，需要出席北京方面国务活动时便到北京去，用她自己的话说去北京是去“上班”。父亲曾经于1958年与担任



我的父亲邓文钊



1960年代于北京。左起：廖梦醒、邓文钊、宋庆龄、沈粹缜

中国福利会总干事的谭宁邦一起去上海看望宋庆龄。每次父亲去北京开会，也会去看望宋庆龄。至今，廖梦醒家还保存着1960年代初廖梦醒、我父亲、宋庆龄、沈粹缜在北京的合影。

关于这些年父亲与宋庆龄的交往，我没能找到更多的资料，但是，我能够十分肯定的是，父亲非常敬仰和崇拜宋庆龄，珍惜与宋庆龄的友谊。至今，我的家中还保存着宋庆龄赠送给我父亲的一张照片，那是她1950年代视察东北时的留影。照片中的宋庆龄穿着军装，非常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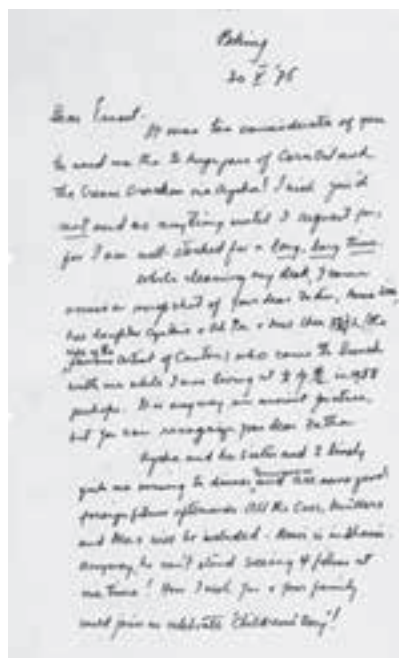
宋庆龄也从来没有忘记我父亲这个老朋友，始终保存着她与我父亲以及廖家人的合影照片。多年后，她在1975年5月30日给我的来信中说：“我在清理桌子的时候看到了一张你亲爱的父亲、廖夫人、她女儿梦醒、阿普



宋庆龄赠送给邓文钊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她视察东北时的照片

以及陈树人夫人（广东著名艺术家的妻子）的一张合影，可能是1958年我住在方巾巷时他们来我家吃饭。这是张老照片，不过你能认得出你亲爱的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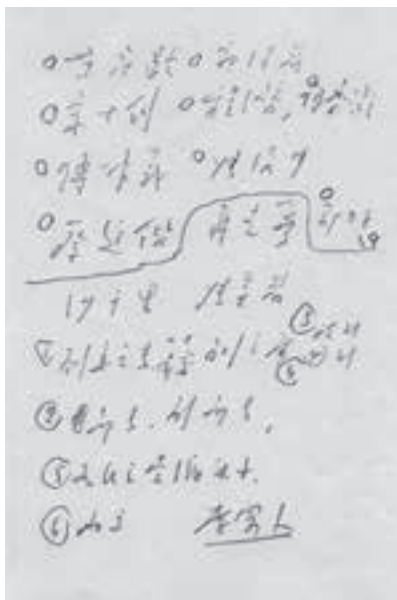
我父亲在宋庆龄的心目中是一位非常值得信任的朋友和战友。宋庆龄在1978年6月5日的来信中说：“14号是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40年前我是保卫中国同盟的发起者，你亲爱的父亲当时是我们在香港的司库。有关于‘保盟’时期和其他时期都有很多丰富的记忆。我在这项工作上投入了所有精力。当时觉得未来是难以想象的。现在，一切都如闪电般飞逝而过，我并不觉得那么遥远！这还是一段很漫长的日子——包括了很多挫折、崎岖。现在我们要继续下去——无论如何，直到2000年，争取巨大的进步！”



1975年5月30日宋庆龄来信第一页



1975年宋庆龄寄给我的在北京方巾巷寓所合影的老照片。左起：陈树人夫人、经普椿、何香凝、宋庆龄、邓文钊、廖梦醒



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开列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宋庆龄名列第一

8. 仅存的宋庆龄致我父亲的最后四封信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宋庆龄也受到冲击，周恩来总理亲自拟定了一批应受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宋庆龄，此外还有郭沫若、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李宗仁、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等人。随着“文革”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展开，很多老同志受到冲击，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野心家、牛鬼蛇神，让宋庆龄很不理解。虽然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保护，但自1966年底出席了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的活动之后直至1972年，宋庆龄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很少露面，也没有公开发表过讲话。

与宋庆龄相比，父亲的处境则艰难得多。那时父亲刚刚摆脱反右斗争的噩梦，踌躇满志地积极投入工作不久。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展开，父亲很快成了广东省对资产阶级展开斗争的重点对象之一。红卫兵要求他接受劳动改造，命令他打扫院子，而且每天要将家中客厅大大小小的沙发搬到阁楼，第二天再搬下来。他不仅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在这样的折磨下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在这期间，他受到猛烈批判，被要求交代一切问题，写各种各样的检讨，将自己骂得狗血喷头，将一生做过的事批得一钱不值。而能够证明他情况的廖承志也于1967年被隔离审查。父亲一生中从未像此时这般感到度日如年。直到1969年秋天，父亲才获得“解放”。

父亲与宋庆龄之间虽有书信往来，但是在那些年，通信无法正常进行。现今，我家中保存着的只有1970年10月到12月间宋庆龄给他的四封信，其中一封是写在贺年卡上的。想来，可能是因为“文革”期间通信较少，或者是都销毁了。“文革”期间，我们家前前后后被抄了37次。第一次来抄家的是广州华南师范学院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因为父亲不收藏字画、古董，所以没抄出任何“四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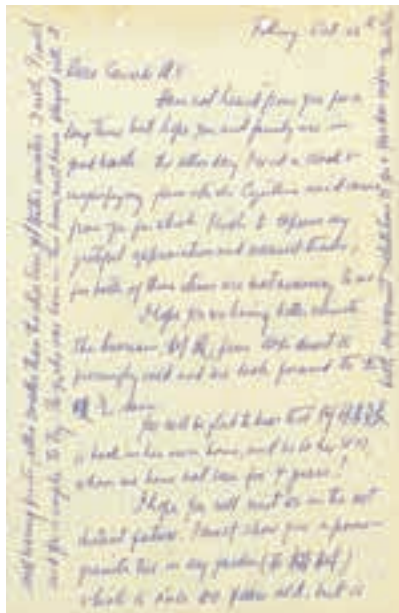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左一）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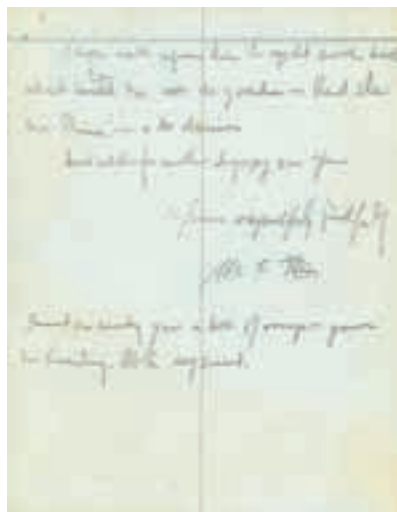
1970年10月1日，新中国迎来了第21个国庆。父亲在新闻中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阅兵。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和夫人洛伊斯·斯诺（Lois Snow）受中国政府邀请，以美国友好人士的身份，作为贵宾登上天安门城楼。

父亲看到了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交谈，看到宋庆龄精神和健康状况都不错，非常激动，于是托人给宋庆龄带去一个时钟和放大镜。10月28日，宋庆龄给我父亲写信表示感谢，并对我们全家表示慰问。信中宋庆龄也谈及了何香凝以及廖承志的近况，并向我们全家致以美好的祝愿。

一个月后，即11月28日，宋庆龄又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并送了六斤蜜枣和六斤核桃给他和家人。这是宋庆龄特别的心意，因为这些东西是北方特产，广州买不到。信中，宋庆龄还说斯诺夫妇参观了在广州举办的第28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很快要动身去欧洲和美国。



1970年10月28日宋庆龄致邓文钊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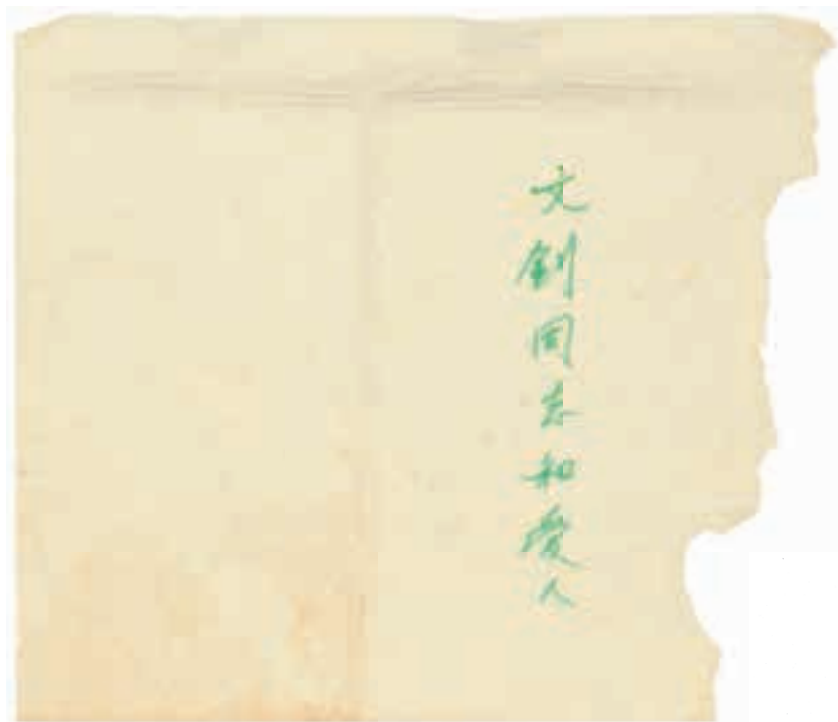
1970年12月邓文钊致宋庆龄的最后一封信

时隔四年再次收到宋庆龄的来信，父亲的激动心情可想而知，1970年12月，他给宋庆龄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还给宋庆龄送去了一盒蜜橘。在信中，父亲告诉宋庆龄他在国庆新闻影片中看到她的激动心情，以及在广交会上见到斯诺的情况。其实，父亲在广交会上有缘见到了斯诺，但没有交谈。10月15日他和斯诺都出席了广交会的开幕宴会，但是当时斯诺坐在主席台中间，与他周旋的是军代表及香港的费彝民等人，我父亲则坐在主席台最末一个座位。他很自卑，没有上前去打招呼。

遗憾的是，这封信成为了父亲写给宋庆龄的最后一封信。12月25日是圣诞节，我们全家相聚在一起吃饭。父亲当时血压高，身体虚弱，第二天在家中突然中风，就此昏迷不醒。12月29日，宋庆龄给我父亲写了封信并送了一些上海特产，有五香豆、松子糖，还在信中谈了一些斯诺的情况。因为父亲有高血压，五香豆对高血压有好处，所以宋庆龄特地在信中写了五香豆的吃法。可惜父亲再也吃不到了。宋庆龄在同一时期寄来的那封祝贺新年的卡片他也没能看到。在卡片上，宋庆龄说：“时间过得真快呀！上次我在广州是欢迎爱德华医生和他的印度援华医疗队，而你那时还在香港协助‘保盟’的工作。尽管这么多年过

Happy New Year to you and family!
 Dear Mr. Deng,
 How sweet and kind of you
 and your wife to send me the personal
 贺卡 which I am enjoying very much.
 Thank you so very much! I am very glad
 that a parcel from Shanghai has just
 arrived. I am glad you are still
 with me. The 2 photos contain the 2
 and the 1940s they contain the parcel
 包裹 which was officially parcelled
 and is very heavy. But you need not check
 the 2 at once. First, leave it in the
 month until it gets settled, then throw
 out the skin and eat the liver. It is
 very good for high blood pressure and
 for those people who want to live.
 It must have cost all about
 1000 Yuan and the high honour he
 is receiving. He will write another

as a follow-up of his letter 信, which
 he wrote 30 years ago after his trip to
 Yunnan and became famous in the literary
 world. He wife had left for 100 to read
 "this daughter" I am glad after the "New
 Year" He himself will be leaving
 for London and also he has built an
 interest in burglars, the entrance of
 which he copied from London was a
 case entrance. He wife had been with
 you him during the previous interview
 he had been with our children together
 wife Ngan who was with him here
 before was divorced and he, later
 famous Shanghai actress called Lu
Yeh-shen. He will take her small letter
 "The Shanghai" or Ngan Shanghai was
 very literary. With affectionate greetings
 to you and your dear wife.



1970年12月29日宋庆龄致邓文钊信及宋庆龄亲笔写的中文信封

去了，我们各自都经历了各种坎坷和曲折，这些记忆却仍然那么清晰。致以诚挚的问候，对你的善意友好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昏迷了半个月后，父亲于1971年1月8日去世，终年62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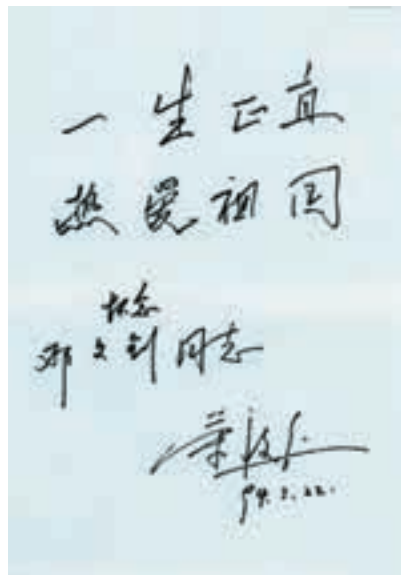
父亲一生跟着共产党走，为了何香凝、廖承志、宋庆龄等革命前辈，可以说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去世，许多人都感到悲痛与惋惜。但是在那个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不可能为他举行悼念活动。1980年，廖承志



1970年12月宋庆龄致邓文钊贺卡

去美国做心脏搭桥手术，路过香港时，亲自去我家探望我母亲，告诉她中央已决定为我父亲平反，开追悼会。1980年7月10日，中共广东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联合为我父亲举行追悼大会，上千人参加。宋庆龄与叶剑英、赵紫阳、廖承志、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习仲勋、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共广东省委、省人大、省人民政府、省政协、广州部队、省军区和广州市等各党政机关及领导同志都献送了花圈。尹林平、叶选平、马万祺等父亲生前好友出席。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杨尚昆主持追悼会，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尹林平致悼词。悼词中列举了我父亲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中的重要事迹，肯定了他为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很多有益的贡献。悼词中不是称他“先生”，而是称他为“同志”，说“邓文钊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朋友”。

1995年，父亲的墓由广州迁葬至深圳大鹏湾华侨永远墓园。荣毅仁题写了墓志铭：“一生正直，热爱祖国。”胡绳题词曰：“疾风知劲草——邓文钊三十年代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是很有成就的银行家，他毕生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愈是困难的时候愈是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抗日战争时期，他支持共产党在香港办《华商报》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荣毅仁为邓文钊墓题写的墓志铭

9. 父亲对我人生的影响

父亲的一生，深受廖承志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他的革命工作中，也体现在他对我的教育上。而这些影响对我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父亲一生都以廖家的事、宋庆龄的事为己任，这种观念在我的成长经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因而父亲去世以后，我才会议不容辞接替父亲，为廖家、为宋庆龄做一切力所能及之事。

我是1929年在伦敦西北部汉普斯特区出生的，六岁以前一直跟随父母住在伦敦。父亲对我的教育非常开明。在我五岁那年，父亲将我送进了一家工党办的寄宿学校——比得莱斯学校（Bedales School）学习。该校实行男女同校教育，思想开明，学生不穿制服，不学绅士派头。这座学校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英国享有盛名。

我在比得莱斯学校学习了一年。1935年，父亲在英国完成学业，我们举家返回香港。那时我还未满七岁，对香港完全陌生，一句中文也不会讲。父亲先安排我进意大



1930年时我（前中）
与父母等在英国伦敦

利婴堂（Italian Convent School）学习，后来就读于耶稣会办的华仁书院（Wah Yan College）。记得幼年时，我家时常有客人来，尤其是那些气宇轩昂的绅士、优雅高贵的女士，我懵懵懂懂地知道，那是我向往的一个世界。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很快沦陷。我们一家先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护送下离开香港。在战争岁月中，我们全家跟随父亲辗转于惠州、韶关、桂林、梧州、西江、罗定、澳门。一路上，我跟着父亲认识了乔冠华、柳亚子、柳无垢、爱泼斯坦、叶挺夫人等仁人志士。记得在韶关时，我常跟随父亲徒步从韶关南郊跑到北郊的互励社见何香凝。互励社是一间国民党的高级招待所，何香凝一家初到韶关时就住在那里。那时候，廖承志被叛徒出卖，在粤北被国民党抓住，辗转江西，后被带到重庆，由军统看管，一直囚禁在白公馆直至抗战结束。因为我们是亲戚，出入互励社比较方便，所以廖承志在粤北被捕的消息，也是连贯告诉我父亲，父亲带着我去通知何香凝的。廖承志一生数次进监狱，何香凝为了营救他想尽了办法。那时，父亲经常带着我去互励社，与何香凝商量营救廖承志的事。我们住的地方离互励社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每次都只能步行前往，非常辛苦。这段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父亲带着母亲和姐姐第一批回到香港，而我则遵照父亲的意思，由澳门直接前往广州岭南大学附中就读，因为那是父亲所崇拜的廖承志的母校。

我在中学毕业以后选择去北京读书，也是受父亲的影响。1950年的时候，我本已考上了伦敦大学，但是在父亲多年潜移默化的教育下，我的爱国热情高涨，决定放弃去伦敦，改去北京读书，以便接近廖承志，得到他的教育。因为数学成绩差，我未能按照廖承志的安排进入清华大学。我也未能如父亲所愿进入南开大学，而是选择了北京外国语学校，立志从事外交工作。1953年，我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从事外宾接待和翻译工作，直到1958年。



我幼年时与何香凝的合影



1951 年在北京王大人胡同 2 号何香凝家。前排左起：廖兼、经普椿（怀抱平平、丁丁）、廖茗、廖晖、廖承慧；二排左起：何香凝、廖承志、廖梦醒、邓广殷；后排左起：李涓、叶剑梅

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小时候在伦敦之外，我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并不多。父亲很疼爱我，听说我小时候，连尿布都是他亲自给我换。他回到香港后，因为社会活动多，早出晚归，我们父子俩很少见面。抗战时期，父亲又奔波于韶关、桂林、东江等地，很少管我。战后我到广州读书，只有寒暑假回家。父亲也不问我的学业，听任我自由发展。我在北京的八年里，节假日不是在廖承志家，就是在廖梦醒家，和他们相处的时间，比和自己父母还要多。与父亲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只有在父亲每年到北京开人大会议或工商联会议时，我们才能相聚。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无话不谈，我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父子，不如说更像兄弟。

在北京的八年，也是我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外国语学校学习期间，在“忠诚老实教育”运动中，我们被要求交代历史问题，每个人都要写详细的交代材料，交代家庭中每一位直系和旁系亲属的政治面貌和解放前的活动，有什么社会关系和海外关系，任何细节都不能遗漏。因此，我将家里的情况事无巨细都向组织汇报。工作以后，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我也以较“左”的面目出现，

帮助父亲改造。父亲一生遇到大的问题和困难的时候都是听廖承志的，我受父亲影响，遇到问题，也去问廖承志。

“反右”时，父亲有什么问题想不通，我便请示廖承志，按廖承志的吩咐去说服父亲。但父亲并未对此有何反感，相反，他一直认为自己从旧社会来，带着许多剥削阶级思想，应该清理改造。虽然每次运动都受到一点冲击，但父亲从未动摇过跟随共产党走的信心。

记得我第一次见宋庆龄也是在这期间。大约是1951年，我暑假回广州，特地到上海看望她。关于我到宋庆龄上海寓所看望她的一些情形，因为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我实在已经记不清了。之后，我与宋庆龄很多年都没有见过面。宋庆龄自己也不记得了，所以她一直以为第一次见我是在1971年。

1958年，由于父亲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了极大的刺激，长期失眠，以致发展成精神分裂症。那时，在广州新建成



1950年代我（左）与父母在北京颐和园留影



1958年的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

了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廖承志便设法让我和夫人孙君莲调回广州，在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工作，方便照顾父亲。

1960年，我所在的工作单位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要调我去广东省外贸学院教书，因为我从小有哮喘病，不能教书，父亲爱子心切，于是亲自写信给廖承志，以香港家产有落入他人手中的危险为由，希望准许我回港处理，获得廖承志的批准。我和夫人到了香港之后，每半个月到广州探望父亲一次，与他长谈。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取代父亲充当“运输大队长”，为在北京的廖承志夫妇、何香凝、宋庆龄等人提供他们所需的物品。那时候，为廖承志夫妇运送生活用品是主要任务，给宋庆龄是附带的任务，我每个月都要送两到三次东西去广州。

父亲的人生观、世界观、财富观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他曾经让我在香港买了十七八辆大中型二手车辆赠给广州市，支援“大跃进”；也曾让我在香港买两辆载重汽车和一些化肥送给家乡五华县，支援家乡建设；还曾捐款给中小学校改善教学条件。以在香港的资产帮助祖国经济建设始终是父亲的愿望，只不过这一愿望受到了客观条件的限制，因为邓家早已不复往日之辉煌。

旧家族由于因循保守的经营模式，不能适应香港的新形势，纷纷家道中落。邓家产业从一个多世纪前发迹至今，只剩下了轩尼诗道的昌业大厦。我父亲本是一个经济专家，很有经营与理财能力，但他从来没有运用这方面的能力来发展自己的产业。然而他对家道中落并不介意，反而常说经历如此多的变乱，祖宗留下的物业能保存到这个地方已属不易，好似白捡回来一样，该感到满足了。

父亲去世后，为了纪念他，我从邓氏家族手中购下了中环伊利近街55号，成立邓崇光置业有限公司（邓崇光是父亲别名），算是完成父亲未竟之业。与此同时，我也如父亲那样，继续为宋庆龄提供生活用品，而我与宋庆龄的真正友谊，也从那时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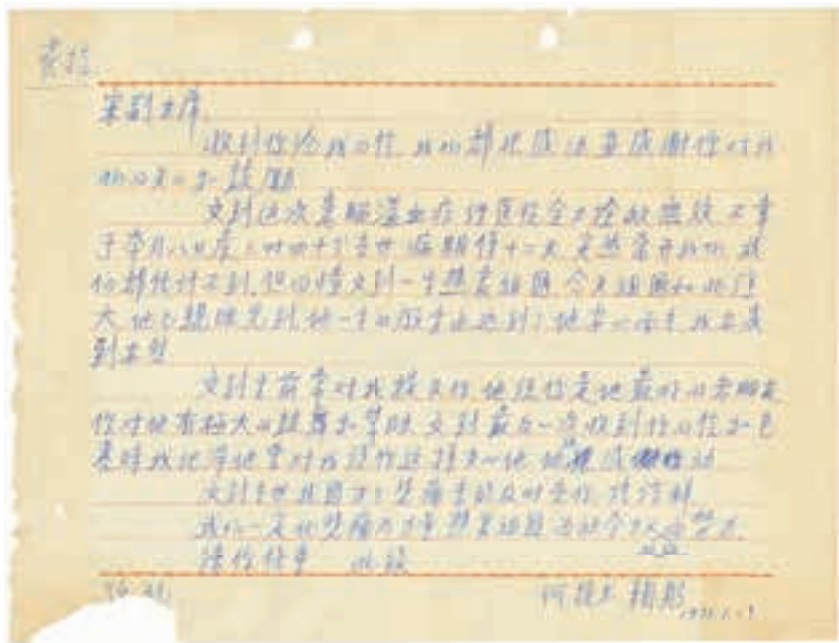


1950年代我与父母的合影。前排：母亲何捷书、父亲邓文钊；后排：我和夫人孙君莲

10. 我与宋庆龄开始通信与往来

我的父亲是1971年去世的。我依然清楚地记得父亲突然中风是在1970年12月26日，就此昏迷不醒。1971年1月8日，父亲因脑溢血在广州逝世。当时宋庆龄并不知道这一情况，给父亲写信，还寄来贺卡问候我们全家。我的母亲何捷书写信将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宋庆龄，之后给宋庆龄的回信是我写的，从此我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通信往来。

与我开始通信时，宋庆龄已经78岁。年纪大了，行动不便，写信便成了她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宋庆龄与我父亲是多年的老朋友，因此，她对我也非常信任。在1971年9月20日的信中，她写道：“虽然我还没有见过你，但你亲爱的父亲经常提到你为我们大家做这做那，让我觉得很久以前就认识你了……”其实我与她早在1951年就见过面，那时候我到过她在上海的寓所，可能



1971年1月19日何捷书致宋庆龄信底稿

老人家年纪大了，记不清楚了。我和夫人第一次在北京见到宋庆龄是 1971 年的 10 月，适逢新中国成立 22 周年。当时我们是因为我父亲的遗产问题去北京见廖承志。在北京期间，我们夫妇去看望了宋庆龄。

宋庆龄在北京的寓所位于后海北沿 46 号，原是清朝末代皇帝的生父醇亲王载沣的花园，里面有一座新建造的二层小楼，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的。楼前的草坪上有一棵槐树，宋庆龄觉得它非常像一只展翅回眸的凤凰，就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凤凰国槐”。这个院落古树成荫、鲜花繁茂，楼阁亭廊点缀其间，环境非常幽静。

那一年，宋庆龄行动还很自如，可以自己走路，不需要搀扶。她带我们夫妇去她的花园，看那些上百年的石榴树。她还特地带我们去看了一棵树，以前她给我父亲的信里面也提到过这棵树，说当年在那里出生的溥仪，一定在那棵树下玩耍过。我们还看了溥仪生活过的房子。

临别的时候，宋庆龄从花园里挑了一盆很漂亮的花送给我们夫妇作纪念。谁知返回香港时，我们夫妇在深圳边防被扣留了下来，在广州时统战部开出的那厚厚一叠介绍信竟然完全不起作用。深圳边防的人将我们所有的行李开箱检查，翻了个乱七八糟，弄得座位上到处都是，那盆花也被没收了。后来我打电话给廖承志，他请乔冠华出面通



宋庆龄北京后海寓所



“凤凰国槐”

过外交部给深圳边防打电话，让他们放人。

我们至今也不知道在深圳被扣留检查究竟是什么原因，想来可能是因为刚刚发生林彪坠机事件吧。早在9月20日，宋庆龄在给我的信中就隐约写到了此事：

“今年我们不会像往年一样庆祝国庆。其中原因你很容易从新闻媒体上猜到，但是我不能在信上写明……我们都很想在这里见到乙明叔叔和你，但是目前我们都不确定现在是否合适……由于我们各种敌人制造的紧张气氛，今年的庆祝方式跟以前非常不一样，没有游行等活动，因为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请保密，信看完销毁。”

对于“九一三事件”，外界有诸多揣测。但是那个时候，“四人帮”依然横行，宋庆龄在“文革”最初的几年间很少公开露面，言辞也很谨慎，她曾经在给斯诺的信中说在了解内情的情况下不做任何评论是明智之举。因此，她在当时给我的信中没有多谈。

我回到香港之后将深圳边防被扣留的经历写信告诉宋庆龄，她非常生气，还让她的秘书杜述周通知公安部门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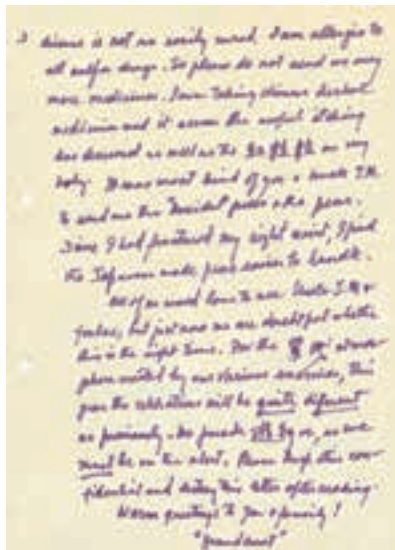
在宋庆龄生命的最后十年，我几乎每年都会去北京看望她。只要身体状况允许，她也都会见我们，还会邀请很多老朋友一起来聚会。

宋庆龄视我如同家人。十年中，她给我和家人写了约200封信，信中很少谈公事，内容多是与朋友及生活有关，事无巨细，有她对人和事的看法，有她对病痛折磨的无奈，有她对友情的珍惜，有她对朋友的关怀，有她对后辈的关爱，有她对上海寓所的眷恋。她对我非常信任，因而信中所写的都是她最真实的感受。在1975年7月23日的信中她写道：“事实上，我将你的家视作我唯一的、一直对我如此之好、帮助如此之大的家。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么多年来你们对我的好。”

宋庆龄给我写信，间隔有长有短。每次收到我托人带过去的包裹，宋庆龄都会写信表示感谢。她有时嘱咐我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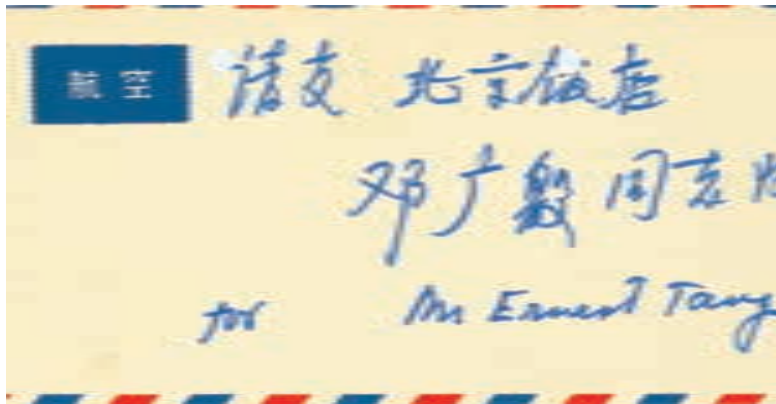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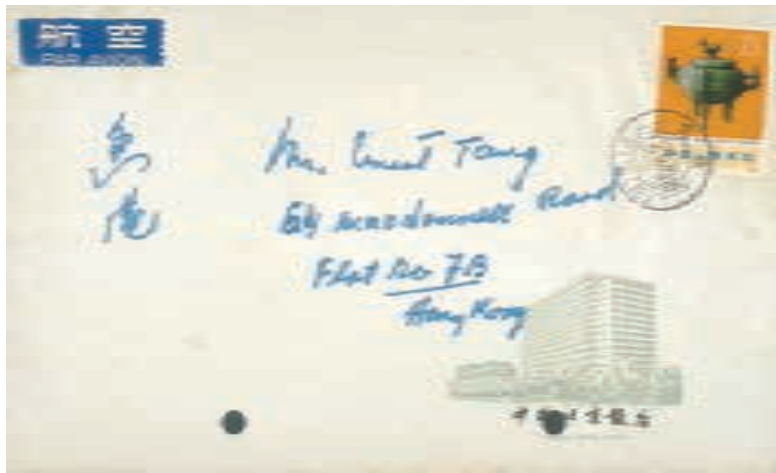


9 people, once fooled by them will not again
buy from them. In the long run,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This year we are not celebrating the
National Anniversary in the past. For
reasons for my safety given from the
news media, but which I cannot put down
in a letter. However, taking account to be the
Commander of the world, with so many
foreigners staying all the time, my feet
life seem to impinge on me for all the
old friends are with affection
to come to give them some, but my
distress (of my life) or have given
an exact trouble. All the conditions,
foreign & Chinese, have been tried but
no national power effective. I am



10 There is not an enemy mind. I am willing to
do self-defense. So please do not send me any
more medicine. I am taking Chinese diet
medicine and it seems the useful thing
has done as well as the 30 pills on my
body. I am most kind of you & thank you
to send me the "Journal" paper of the year.
Since I had finished my eight week, I find
the Japanese made great success to handle.
All of us would love to see Uncle Sam &
friends, but just now we are doubtful whether
there is the right time. For the 80 year
given invited by our various societies, this
year the celebration will be quite different
as previously. We should get by us, we must
be on the alert. Please keep the con-
fidential and delay the letter after reading
before putting to you & family!
"Grandma"

1971年9月20日宋庆龄来信第二、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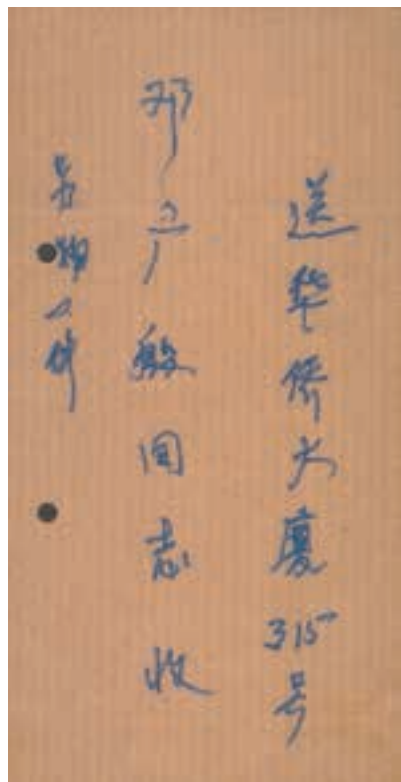


宋庆龄给我信的各种信封

信人用“林泰”，这是她的化名，她与国外朋友联系时经常用这个名字。宋庆龄还要求我不要 在收信人后面加“先生”或“女士”，这样别人就不知道“林泰”是男还是女，避免了不必要的延误和麻烦。而她的来信落款常常都不一样，有“Lin Tai”、“Aunty 林泰”、“马旦”（即 Madam 的谐音），还有“伯婆”、“Grand Aunty”、“Aunty SCL”等等。既有“Aunty”，又有“Grand Aunty”、“伯婆”，这似乎有点乱套。宋庆龄的年纪介于何香凝和廖梦醒之间，但是由于孙中山与廖仲恺是同辈，因而宋庆龄与何香凝同辈，廖梦醒、廖承志称她为“Aunty”，我的父亲也称宋庆龄为“Aunty”。如此算来，我实际上已是孙辈，应该称她为“Grand Aunty”才对。但是，宋庆龄似乎并不讲究辈分，她更愿意我们都叫她“Aunty”。廖梦醒的女儿李涓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据李涓回忆，1930年代第一次见宋庆龄的时候，她才三岁，宋庆龄四十出头，廖梦醒让她叫宋庆龄“婆婆”，宋庆龄反应很大，不让叫“婆婆”，让她叫“Aunty”，以至后来李涓的女儿晓燕也应宋庆龄的要求叫宋庆龄为“Aunty”。

宋庆龄晚年常受病痛之苦，有时候不能立刻给我回信，但她时刻都将回信的事情记在心上，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了，便会尽快写回信给我。有很多信都是她患病卧床期间在病榻上写的，所以有些字写得不是那么工整。有些信她嘱咐我阅后毁掉，想必是不希望信的内容外泄。由于曾有过信件收不到的情况，所以，有时候她给我的信件收信人写的是我的夫人孙君莲的名字，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一直珍藏着这些信，也保守着秘密，30多年没有对人提起过信里的内容。

正是通过与宋庆龄的这些书信往来，我更深入地了解了宋庆龄作为一位女性平凡的生活点滴；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点滴，又折射出宋庆龄不平凡的伟大，她的很多高贵的品格令我十分敬佩；也正是受到她的影响和熏陶，使得我始终支持并关注着她所热爱的事业。



宋庆龄给我信的信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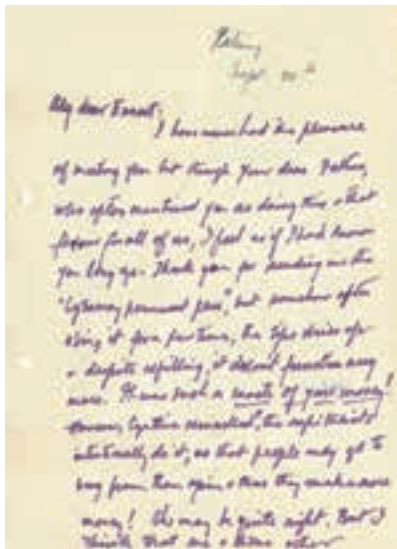
11. 宋庆龄称我为“圣诞老人”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常年为宋庆龄、何香凝、廖承志提供生活用品，父亲去世以后，这个任务自然落在了我的肩上。十年中，我和家人从香港为宋庆龄提供的物品种类各异，有钢笔、笔芯、食品、水果、衣料、杂志、收音机，还有闹钟、放大镜、药品等等，大部分都是内地很难买到的东西。

在那个交通与邮政服务都不甚发达的1970年代，要将给宋庆龄的药品、食品和外文期刊带到北京不是一件易事，我通过各种途径，想了很多办法。有朋友去北京的时候，我便托他们带包裹过去，有些是带到廖家，再由他们转交给宋庆龄。宋庆龄的很多外国朋友到中国内地，都要先到香港中转，不少都是我接待的。他们中很多人都曾帮我带包裹给宋庆龄。可以说，我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便利条件。我的朋友、来自非洲的专家阿霞（Aysha）和她的外国朋友，父亲的好友、澳门的何贤与马万祺两位世伯，都帮过很多忙。因为他们过境可以享受免检的待遇，所以他们常常帮我带东西给宋庆龄、何香凝、廖承志等。

长期与宋庆龄通信的朋友都知道，宋庆龄写信喜欢用粗头的笔，而且颜色各异，有红色、绿色、蓝色、棕色等等，形成了她独特的书写风格。但人们有所不知，在我与宋庆龄通信的十年中，宋庆龄写信用的笔几乎都是我提供的，既有派克钢笔及笔芯，也有水笔和其他笔。

由于宋庆龄的手腕骨折过，她喜欢用手感较轻的笔。有一次，我给她买的一种轻质笔的质量出现了问题，用了几次就干掉了，重新装上墨水也无法使用。宋庆龄特地来信提醒我在买笔的时候不要受骗上当，她说：“这真是浪费你的钱啊。不过，梦醒说：‘这是资本家故意的，这样一来人们就要再买他们的东西，他们可以赚更多的钱！’她可能说得很对，不过我认为我们和其他被他们骗过一次的人都不会再买他们的东西了。”宋庆龄还在给廖梦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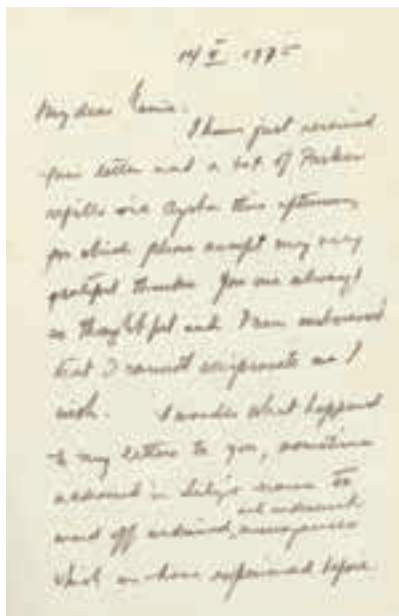
1971年9月20日宋庆龄来信第一页

信里提到了这件事情，让她也提醒我别再上当。

每次收到笔，宋庆龄均会在信中表示感谢。她在1972年5月26日给我和夫人的信中写道：“你们细心挑选并送来的钢笔是我用过的最好用的钢笔。你们真是太好了。笔很轻，毡毛笔尖很宽。”1972年7月28日她在信中写道：“真不知道如何表达我对你深深的感激之情，你对我太好了，想得如此周到，给我多备一支毡头笔和替芯。现在这些笔我可以用好多年啦！”1972年12月1日她在信中说：“谢谢你询问你送的派克笔替芯的事情。你送来的我还没用完，需要的时候会告诉你的。广殷，你想得总是那么周到！”1970年代中期，我给宋庆龄的笔有不少都是托非洲的专家朋友阿霞给宋庆龄送去的。宋庆龄在1975年2月14日信中写道：“今天下午收到了你通过阿霞送来的信和一盒派克笔芯，请接受我最衷心的感谢。你总是想得那么周到，不能如愿报答你让我觉得很难为情。”后来那段时间，宋庆龄在信中几次提到我送去的笔已经足够使用，不需要再给她，同时一再表示感谢。她特别喜欢一种大红色的粗头笔，可惜后来这种笔买不到了。

1970年代，信息还不甚发达，再加上“文革”的关系，阅读材料很少，人们了解信息的渠道相对比较封闭。宋庆龄有时从一些外国朋友那里获得一些剪报，但是可能只涉及某些主题，不够全面。于是我从香港买了《新闻周刊》、《时代》、《国家地理》、《生活》等杂志，托外国友人柯弗兰（Frank Coe）或是他的夫人柯如思（Ruth Coe）转交给宋庆龄。宋庆龄曾在信中说，因为这些定期收到的杂志，她得以跟上世界的形势。

宋庆龄晚年生活中除了写信以外，阅读杂志也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带给她很多快乐。她非常喜欢我给她买的几种杂志，尤其喜欢《国家地理》，多次在信中提到。她在1974年3月20日信中说：“我非常喜欢地理杂志和其他阅读材料，非常好，谢谢你，你真是太好了。”1974年12月4日的信中写道：“广殷，真不知道如何告诉你我



1975年2月14日宋庆龄来信第一页



我为宋庆龄提供的《国家地理》杂志

是多么喜欢这些杂志啊，尤其是《国家地理》杂志，向我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非常感谢你！”1974年12月16日的信中说：“我非常喜欢看《国家地理》杂志，它们向我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你总是那么慷慨，想得那么周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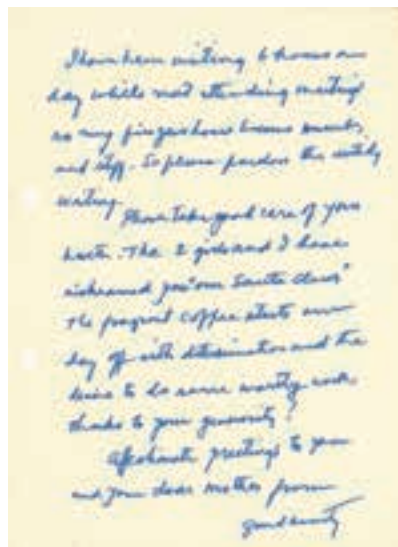
考虑到宋庆龄年纪大了，为了方便她阅读，我还为她提供过放大镜，这对她非常有帮助。宋庆龄也会给我寄一些杂志或资料，如她写的文章。她曾经给我寄过一本杂志，里面有关于大寨的文章，她还在信中说：“我很遗憾自己不能跑那么远去亲眼看看男人和女人们在那里创造的奇迹，不能参与其中。”

宋庆龄喜欢吃芒果，所以，我在包裹中常常会准备芒果或芒果干托人带去。可能由于国外生活及留学的经历，宋庆龄喜欢吃巧克力，吉百利巧克力、瑞士巧克力，特别是带点苦味的巧克力她都喜欢。还有一种荷兰的“Hopjes”糖，这种糖现在还在生产。那些年，我买过很多巧克力托人带过去。我的长女邓勤在瑞士读书，知道宋庆龄喜欢吃瑞士的巧克力，也给宋庆龄买过。每次收到巧克力，宋庆龄都会分送一些给她的朋友。因为她知道，在那个物资不甚充裕的年代，她的朋友们很少能得到这类东西。这也是

宋庆龄让我十分钦佩的地方，她一贯的为人便是如此，总是很关心她的朋友。

宋庆龄非常感谢我和家人为她所做的一切。她不止一次地在信中称我为“圣诞老人”，仅以1978年9月22日的来信为例，她说：“请照顾好你的身体。两个女孩和我戏称你为‘我们的圣诞老人’。早上一杯芳香四溢的咖啡开始了我们满怀决心的一天，让我们有欲望去做一些有价值的工作，感谢你的慷慨！”此外还有“你简直就是‘圣诞老人’”、“你真是我们的圣诞老人啊”等等诸如此类的话。

有时候，宋庆龄的朋友要去看望她，也会向我询问带什么礼物给她比较合适，我都会热心地给出我的建议。英国友好人士、英中贸易协会副主席、香港怡和洋行的董事长约翰·凯瑟克（John Keswick）爵士，曾经长期住在中国。他和夫人克莱尔·凯瑟克（Clare Keswick）是宋庆龄的老朋友。我与凯瑟克爵士的相识，也是宋庆龄介绍的。凯瑟克爵士每年都要去中国，每次去北京前都会问我，他和夫人给宋庆龄带什么礼物最好？他们到宋庆龄家中做客，宋庆龄总是热情招待他们。宋庆龄在1977年5月30日的来信中说：“我在上海的时候，凯瑟克夫妇来看我，因为我的身体不适，只用了很短的下午茶。他们带来了柚子和巧克力，当我看到她手里拿的柚子时，我马上对自己说：这是广殷告诉他们的。因为只有你知道我爱吃柚子，你不仅自己做圣诞老人，还会让别人做。”能为宋庆龄做点事情，我感到非常开心。



1978年9月22日宋庆龄在来信中称我为“圣诞老人”

12. 宋庆龄晚年的病痛

年纪大了，一些老年人的病痛诸如风湿性关节炎、坐骨神经痛等问题在所难免，而最让宋庆龄烦恼的是她的皮肤病。由于家族遗传的关系，宋庆龄患有严重的荨麻疹，属于神经性疾病，遇到焦虑、压力等精神刺激就会发作，发作时全身发红疹，奇痒难忍。为了治疗这个毛病，宋庆龄试过各种方法，吃过各种药，国内的、国外的、口服的、外用的，似乎收效都不怎么好。

由于宋庆龄的这个皮肤病让她十分痛苦，因而关心她的朋友经常会留意一些这方面的药物。记得我和陈乙明在香港找到一种治疗荨麻疹的抗组胺药甲苄咪啉片，还有一种外用止痒的“无比膏”，通常是托人带到廖家，由廖梦醒或经普椿转交给宋庆龄。这个“无比膏”对治疗皮肤瘙痒有一些效果，宋庆龄曾在给廖梦醒的信中说“这是唯一能止痒的良药”，因此我和陈乙明给她送去不少，但是这个药也只是缓解症状，并不能根治。后来，宋庆龄来信说内地的医生也可以生产类似的药膏，不需要再送过去了。

由于药物和药膏都不能彻底治疗宋庆龄的皮肤病，宋庆龄尝试吃中药，并按照医生的要求严格控制饮食。荨麻疹能得到缓解，但是始终不能彻底根治。宋庆龄身边的很多朋友都知道，曾经有一位医生的失误给宋庆龄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事情是这样的：宋庆龄对磺胺类药物过敏，1971年1月6日，她的一位医生让她两天内服用了24片土霉素退高烧，由此引发她皮肤瘙痒，间歇性一天发作两次，不得不全身涂药膏来止痒，头发也大把地掉。这次的药物作用，使得她差不多有三年时间饱受皮肤瘙痒的折磨。

由于北京气候干燥，风沙大，对皮肤非常不利，1972年11月，宋庆龄接受医生的建议，回到上海接受注射治疗。这是一个比较激烈的疗法，采用注射的方式，将药物直接输入静脉，排除侵入血管的土霉素。每次注射需要两个半小时，一个疗程为十天，共需要三个疗程。整个过程必须

躺着，纹丝不动，十分痛苦，也非常疲劳。周恩来特地派了两位专家从北京到上海，与上海的两位医生共同会诊。这些都是宋庆龄在来信中告诉我的。看到她所经受的这些痛苦，我内心十分难过。不过宋庆龄在信中也常常写到她受到国家的关心，受到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觉得很幸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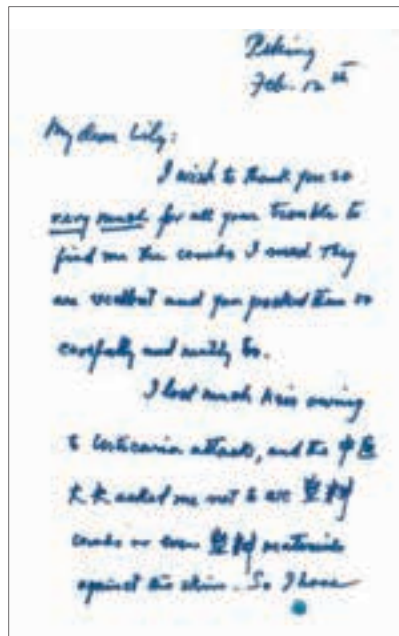
宋庆龄还请了一位 86 岁的非常有经验的退休中医皮肤科专家给她开药方，喝汤药。虽然治疗的过程很慢，但是宋庆龄还是坚持治疗。在治疗期间，宋庆龄还要严格控制饮食，完全不吃海鲜和肉类，只用菜油，每天要喝两次汤药，用草药水洗澡，并在身上涂黑色的药膏。

在上海住了半年，由于上海接近雨季，不适合神经性皮炎的恢复，医生建议宋庆龄离开上海，于是她又回到了北京，继续接受治疗，之后病情有所缓解。尽管如此，她的皮肤问题始终困扰着她，令她痛苦不堪。1975 年 10 月 24 日的信中，她说：“也许我永远也治不好了，或许能发现某种特效药把我从这种讨厌的毛病中解脱出来。”

对于宋庆龄的皮肤顽症，我们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建议给她，只能帮她留意一些有可能对症的药物。她的皮肤非常敏感，而且因为荨麻疹掉了许多头发。所以医生嘱咐她不能用塑料的梳子，也不能让任何塑料材质的东西接触皮肤。我的夫人孙君莲在香港帮她买到她所要的那种梳子，宋庆龄特地写信给我夫人表示感谢。

宋庆龄曾于 1972 年 2 月 1 日在给廖梦醒的信中说我的夫人孙君莲是“现在唯一可以写信去托她在香港办事的人”。

除了皮肤病荨麻疹的困扰，宋庆龄也经常因摔跤引发各种疼痛。由于年纪大了，行动不是很灵活，所以宋庆龄经常在家中摔倒。1973 年 9 月 3 日，刚刚暂时摆脱了日夜折磨近三年的荨麻疹，宋庆龄在浴室滑倒，撞到了一个闹钟的背面，上面发条的部件和其他小零件扎到了腰里，伤及肌肉和韧带。那天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这次的不幸遭遇，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收到。其间，因宋庆龄卧床一个多月，腿部肌肉萎缩，影响正常行走。她 10 月



1972 年 2 月 12 日宋庆龄致孙君莲信第一页

14日情况稍微有点好转，能在护士的搀扶下走几步，就又给我写信了。因为大拇指在摔跤时受了伤，没有完全复原，所以她很抱歉字迹写得潦草。1975年4月，宋庆龄又一次在楼梯上滑倒，致使左脚踝严重受伤。这是她在两年中第四次摔跤了。宋庆龄在信中开玩笑说她的脚“包着层层纱布，就像患痛风的老头子一样”。1977年9月，宋庆龄又在浴室滑倒，撞到盥洗池上，不得不接受各个部位的X光检查，也不得不因此卧床。疾病和疼痛使得她痛苦不堪，情绪也难免受到影响，不过，她依然很乐观。1977年10月29日的信中，她写道：“我现在一天被允许坐起来两次，除了为背部的疼痛按摩外，我也做电疗。所以请放心，我现在正在康复中。谢谢你安慰的话，这对我帮助很大。当一个人陷入低谷时，好朋友是如此珍贵。”

由于身体健康状况欠佳，宋庆龄晚年从事国务活动是相当吃力的。其实，宋庆龄早在1971年2月11日给廖梦醒的信中就曾写道：“很快人大就要开会了。我衷心希望当局不要再委派我什么职务，因为现在我已无法担任了。我连站起来都困难，后背和膝关节疼得要命……”尽管如此，宋庆龄依然尽自己所能坚持工作。然而，繁忙的国务活动，对于一位已经80多岁的老人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数千位代表出席。宋庆龄出席了13日的会议，由于会议礼堂集中了数千名代表，温度高，空气不流通，因而出了很多汗。会议结束时已近午夜，礼堂外面很冷。当时的宋庆龄已经82岁了，经这样一冷一热的刺激，当夜就头疼发起了高烧。第二天便卧床不起。因此，1月14日的会议宋庆龄便不能参加了。在那次会议上，宋庆龄被大会推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恩来在得知宋庆龄因病未能参加会议后，几次让秘书打电话询问病情。我是从宋庆龄1975年2月3日的来信中了解这一情况的。看得出，她还是很乐观的，对于受到医

1975年1月宋庆龄（二排左三）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生护士的精心治疗，她很感谢。在信中她写道：

“我这段时间没写信，是因为得了急性支气管炎，发烧，两个星期来身体状况都不好……所以被‘关’在房间两个星期，一个女医生和一个护士日夜守在我隔壁房间，中医西医每天来给我做检查，给我打针，吃各种药片，喝很苦的中草药。经过这么好的照顾，我最终能坐起来了。”

每每在来信中看到宋庆龄所受的这些苦痛，我的心中都十分难过，同时她顽强的毅力、同疾病斗争的乐观态度也让我非常佩服。

宋庆龄晚年由于病痛的原因，再加上特殊的身份，错过了很多与老朋友的会见，有些令她非常遗憾。

1973年初，香港富绅何东爵士的女儿何艾龄（Irene Ho Tung）写信给宋庆龄，希望能与她见面。何艾龄又名何奇姿，抗战时期在香港从事妇女及儿童工作，与宋庆龄相识，关系也较亲密，称宋庆龄为“Aunt”。1968年，何艾龄旅居美国，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可惜何艾龄来的时候，宋庆龄正在接受针对荨麻疹的密集治疗，不能见客。何艾龄参观了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和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身为教育家，她对这两个机构印象非常深刻，离开的时候，她捐赠了一笔钱给少年宫的孩子。

不久，香港怡和洋行的凯瑟克爵士一家想去看望宋

庆龄，他们也是宋庆龄的老朋友了。当时，作为中英贸易协会主席、英国工业技术展览会主席的凯瑟克参加完3月26日在北京开幕的英国工业技术展览会后，离开北京赴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参观。在上海参观期间，凯瑟克希望能看望宋庆龄，但是因为宋庆龄的身体不适合会见而一再延后。

差不多同时期，曾经在孙中山伦敦蒙难时营救过他的詹姆士·康德黎（James Cantlie）爵士的儿子肯尼斯·康德黎（Kenneth Cantlie）上校前来看望宋庆龄，而她那时由于静脉注射治疗引起的连锁反应，受到神经性皮炎的困扰，神经异常敏感，按医生要求必须避免一切刺激，因而也没能与康德黎上校见面。

宋庆龄原打算安排和很多老朋友在北京见面，但也由于她在上海养病而未能如愿。这些朋友中有《个人的历史》的作者文森特·希恩（Vincent Sheean）及其夫人黛安娜·福布斯-罗伯逊（Diana Forbes-Robertson）、史迪威将军的女儿艾莉森（Alison）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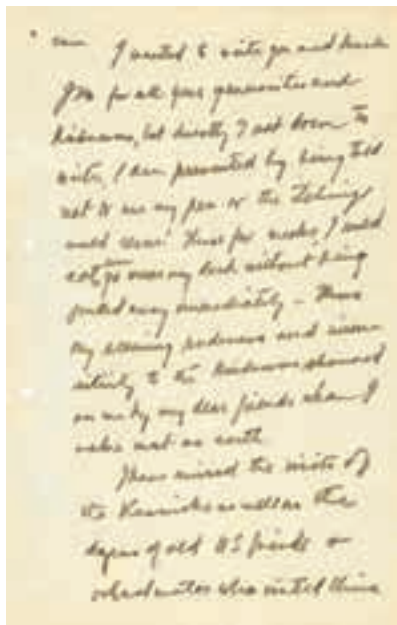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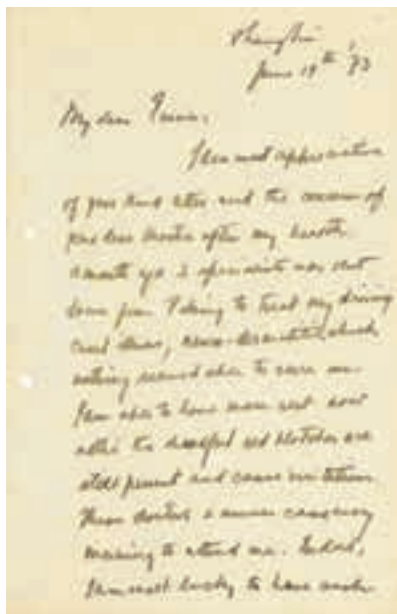
1973年秋天，两位孙氏家族的后人前往北京探望宋庆龄，那时她正卧病在床，因此没能接见他们。

对于这些错过的会见，宋庆龄很遗憾。她在1973年6月19日给我的信中写道：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和你母亲对我健康的关心。一个月前北京派了三位专家来治疗我难忍的顽固性疾病，神经性皮炎，似乎什么都治不好。虽然那些讨厌的红斑还在，让人很恼火，不过我可以更多地休息了。这些医生和护士每天早上来护理我。事实上受到这样的照料我真的是很幸运。

“对于你和乙明叔叔的慷慨和好意，我想写信表示感谢，但是我刚一坐下来写信，就被告知不能用钢笔，否则瘙痒会复发！有好几个星期我还没走近我的办公桌就立刻被拉走了。对于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视的朋友们对我的善意，我似乎是既无礼又不真诚。

“我没能见到凯瑟克夫妇和一些美国老朋友以及年初



1973年6月19日宋庆龄来信第一、二页

四个月中访问中国的校友。”

自我与宋庆龄开始通信以后，我几乎每年都带着家人去看望宋庆龄。但是如果遇到她皮肤病正在发作或有其他疾病，就可能无法见面。按照规定，连女秘书也不允许进入她的房间，所以我的夫人孙君莲和女儿邓勤也不能去她房间看望。她在1975年7月20日给我的信中说：

“……我的医生命令我不能走楼梯，因此还不能见你和家人，让我很困扰。现在你们住在有空调的房间里，我希望你们不会很快离开这个酷热的城市……希望命运能对我更好一点，这样我就不会错过见你们的少有的机会了。”

不能见我们和其他一些老朋友，宋庆龄很难过。在她孤寂的晚年生活中，能与老朋友见面叙谈是异常开心的事情。可惜由于身体或其他原因，无法达成愿望，可以想象她是多么无奈和遗憾。

Dear Irving,
Just read your note via
John Kende Ted, who tells me you are
also sick. I am very much distressed
that my swollen face has not yet
healed as I am using 玉容散
I am so distressed that I can't
see you & the family yet, as my
doctor & surgeon advise me not to
try walking the stairs yet. So I
hope you will not mind too soon
from this blistering city how that
you are in an air-conditioned
room. I shall send you some of
my pie to see you when you
return

because my affectionate
wishes to you & your family, as
well as greetings to Mr. Frankson
and Dr. Kende. Hope you
will be kinder to me so I
may not miss the rare oppor-
tunity of seeing you.
In haste,
Grandmama.
20 July '75

1975年7月20日宋庆龄来信

13. 宋庆龄的生活喜好

在我与宋庆龄交往的十年中，通过日常的来往信件和在北京的数次会见，我对她晚年生活的一些喜好也有所了解。她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高高在上的国家领导人形象，而是像普通慈祥的老人一样，有着普通人的生活情趣和爱好。

由于早年在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国家生活的经历，宋庆龄在饮食方面有一些偏好，保有一些西式的饮食习惯，例如她喜欢早餐的时候喝咖啡，吃面包和果酱，尤其喜欢一种英国青梅果酱，所以我和陈乙明都送过各种各样的果酱给她。

宋庆龄也很喜欢自己下厨烧菜，经常出其不意地为好朋友做几道拿手好菜。1974年我即将去北京之前，她来信请我带几罐嫩玉米、几罐柚子、几罐英式乡村猪肉肠以及几罐意大利西红柿酱，还说：“你们来的时候，我想用嫩玉米为你们做一道法式素菜，将是难以抗拒的！”想来宋庆龄对自己的厨艺还是很自信的。

除了有时候自己下厨以外，对于宴请朋友时的菜式，宋庆龄也常常亲自过问。据我所知，1975年5月31日，为了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宋庆龄要在北京寓所宴请很多好朋友，有柯弗兰一家、米勒（Hans Muller）一家、马海德（George Hatem）一家、阿霞一家等约20余人。在5月30日给我的信中，宋庆龄说：“我得走了，要跟厨子谈谈明天他的重任。我上海的家里送了很多新鲜蔬菜过来。”

宋庆龄早年与孙中山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日本，“渍物”也就是腌菜、咸菜、酱菜，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每餐都会有，所以，宋庆龄也很喜欢吃日本的酱菜。有一次廖承志送了一盒日本糟萝卜给她，初次闻到那种气味的人会觉得很难闻，以至于大家经过放那盒萝卜的房间时都捏着鼻子。但是宋庆龄觉得非常好吃，还在信中说想让我也尝一尝。宋庆龄还曾经让我帮她买几罐“福神渍”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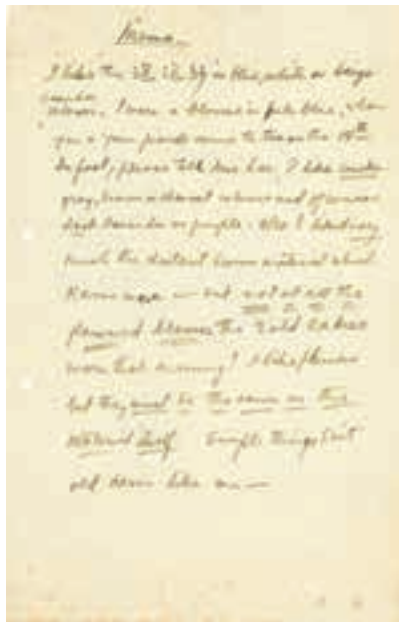
1978年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左起：爱泼斯坦、李伯悌、宋庆龄、罗叔章



日本的腌芜箐，想来，宋庆龄当年与孙中山在日本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她却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宋庆龄喜欢吃芒果，也会用芒果招待客人。1978年适逢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宋庆龄要在北京寓所举办一个小型招待会，招待为中国福利会做出贡献的老朋友和《中国建设》杂志的一些骨干。她6月5日的来信中托我买一些芒果干，以备招待客人时用。她说：“可否请你给我寄一打菲律宾岛产的，用小塑料袋包装的干芒果，寄航空件好吗？客人们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因为他们都爱吃这个水果，每个客人都能尝几片就最好了……”6月14日晚上的自助餐晚宴很成功，宋庆龄后来在信中写道：“多希望你也在这儿啊！每个人都享受这个精心准备的夜晚。”

除了饮食方面的偏好以外，宋庆龄在衣着服饰上也有她独特的品味。蓝色、白色、栗棕色和紫色是她偏爱的颜色，而且她不喜欢花俏，喜欢简单素雅的风格。记得我曾经给宋庆龄买过《时尚》杂志，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女性穿衣风尚的。宋庆龄不赶时髦，因此特地写信告诉我不要再浪费钱为她买这本杂志。1972年4月3日，宋庆龄来信请我帮她买一条深蓝雪纺或乔其纱围巾，她在信中说：“深蓝雪纺的围巾如果买不到，就帮我买1.5米雪纺或乔其纱



1975年2月18日宋庆龄来信中的备忘录



1975年3月11日宋庆龄来信第一页

布料，素色或极小的不显眼的白花，因为我不能穿太花俏的图案。我这里寄了一块样子给你（我自己手工缝。要保证布料是手工制的）。”宋庆龄曾经在给我的一份备忘录中列举了她喜欢的颜色，并请我帮她在香港找一种淡紫色布料，就是最普通的那种英国亚麻布，可惜我没有买到她想要的那种布料。

宋庆龄特别喜欢蓝白的组合，我的母亲曾经送过一个蓝白的电子钟给她，她非常喜欢，一直放在寓所的书桌上。她在几年后给我的信中还说到最喜欢这个钟：“跟其他我见过的钟相比，我更喜欢这一个。每次我读书或写字的时候，抬头就能看到它，就会想到她、你还有君莲。它就像一个鸵鸟蛋，蓝黑的底，白色的阿拉伯数字。”

宋庆龄喜欢蓝白组合还体现在她收藏的青花瓷上。老朋友路易·艾黎知道她喜欢蓝白的组合，曾经为她写了一首诗，以精致典雅的青花瓷来比喻宋庆龄的品格。在上海宋庆龄的寓所中，至今还保存着艾黎送给她的青花瓷器，陈列在客厅中。

众所周知，宋庆龄抽烟，她一生也留下了不少手里拿着香烟的照片，包括当年在邓家游泳棚的那张留影。而据我所知，宋庆龄的酒量也很好，这一点连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都十分佩服。宋庆龄也有一些藏酒，她曾告诉我以前她的父亲家中有一个酒窖，留了一些好酒给她。她也曾将父亲留下的好酒赠送给我和其他一些友人。每当与朋友聚会开心之时，宋庆龄都会拿出珍藏的好酒，与朋友分享。1973年给艾黎庆祝生日的时候，宋庆龄拿出了100年陈酿的白兰地。在她与众多友人几十年的友好交往中，留下了不少举杯祝酒的珍贵瞬间。



宋庆龄上海故居客厅内的青花瓷

14. 宋庆龄抱病送别何香凝

我们邓家能与宋庆龄结缘，是因为与何香凝的亲戚关系。而邓家与宋庆龄这份绵延了几十年的友谊，也始终是与何香凝、与廖家的每一个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我对宋庆龄与廖家的友情也有一些了解。在早年共同的革命生涯中，宋庆龄与廖家便已结下深厚的情谊，关系非常亲密。宋庆龄与何香凝是半个世纪的战友和朋友，两人长期并肩战斗。何香凝一直是宋庆龄所敬重的“廖夫人”。孙中山临终前曾经拜托何香凝照顾宋庆龄。孙中山去世后，何香凝一直陪伴在宋庆龄的身边，是宋庆龄志同道合的支持者，她也一直尊称宋庆龄为“孙夫人”。

1970年代初我与宋庆龄开始通信的时候，何香凝身



1925年3月宋庆龄与何香凝（左）在北京碧云寺

体状况已经不是很好，几次因为肺炎住院。宋庆龄对何香凝的身体非常牵挂，经常从廖梦醒那里了解何香凝的情况，每每得知何香凝病情有所缓和，她都非常欣慰，也会在信中告诉我。1971年11月2日，宋庆龄在来信中说何香凝“经过抗生素治疗后好多了，现在能吃半个蛋，喝少量牛奶。她头脑很清醒，能认出家里所有人”。

不久，从宋庆龄1971年11月20日的来信中，我得知何香凝胃里长了个肿瘤，宋庆龄非常难过，也很担心。1972年6月13日宋庆龄在信中写道：“梦醒来信说她母亲可能等不到97岁生日了，因为她现在只能靠腿部注射延续生命。非常难过，但这是生命的法则。”7月4日，宋庆龄去廖梦醒的住处看望她，随后去北京医院探望了在那里住院的何香凝。她在7月17日的来信中写道：“肥仔的母亲安然度过了97岁生日。我去看望她，看到她生气勃勃，精神愉悦，激动得像个小孩子，要护士打开所有的包裹给她看。她甚至想让我抽根烟，不过我没抽，她自己抽了。或许在医院的精心照料下，她能活到100岁。”其实，当时何香凝是93岁，而不是宋庆龄信中写的97岁，这可能是宋庆龄年纪大了，记不清楚了。

1972年9月1日凌晨，何香凝以93岁高龄在北京医院逝世，宋庆龄失去了她最亲密的战友和朋友。宋庆龄天刚亮就赶到了北京医院，是第一个向何香凝遗体告别的人。凌晨7点，宋庆龄回到家之后立即给我写信，将这个噩耗告诉了我。很快，廖承志通知我和夫人去北京参加何香凝的追悼会。

9月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何香凝追悼会非常隆重，天安门下半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主持，国家副主席宋庆龄致悼词，周恩来、董必武、陈云、叶剑英、郭沫若、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代表500多人出席了追悼会。宋庆龄在追悼会上宣读了悼词。在宣读悼词的时候，宋庆龄眼里满是泪水，语音也有些不太正常。当时她的荨麻疹发得厉害，身上奇痒难忍，而且膝关节炎



1972年9月5日宋庆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何香凝追悼会上致悼词

也很严重，站着超过10分钟都困难，但是为了念何香凝的悼词，她尽最大努力站着，同时忍受着失去挚友和同志的悲痛，以及荨麻疹发作的不适。

追悼会后，根据何香凝临终前的遗愿，她的遗体被送往南京与廖仲恺合葬。宋庆龄多么希望能够送老战友最后一程，但是膝关节炎和荨麻疹使她无法同行。她曾在给廖梦醒的信中写道：“在追悼会上，我分辨不清那些家属，我的两眼已是热泪盈眶。虽然你母亲寿终天年，她的离去仍使我深感悲痛。如果我两膝能够支撑住，我是一定要给她送行的。”

何香凝去世以后，宋庆龄写了一篇回忆和纪念何香凝的文章，题为《何香凝——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她在1972年10月16日的来信中说：“我正在写一篇关于你姑婆的文章，她的儿子和女儿也在写。肥仔是给画报写，他姐姐给日本杂志写。希望我们不要互相矛盾才好，否则就太糟糕了，但是我们没时间互相商量。只要我们坚持事实不杜撰，结果应该很有意思。所以我想做些研究工作，而不全依赖记忆，因为这将是一篇历史性的文章。将发表在《中国建设》1月刊上，我一定会寄给你和君莲，当然还有乙明叔叔。”这封信不仅让我看到了宋庆龄对何香凝的敬重与怀念，也看到了宋庆龄在写作方面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

15. 宋庆龄晚年与廖梦醒

宋庆龄晚年给我的信中也常常提到廖梦醒。廖梦醒很小的时候便认识了宋庆龄，与宋庆龄很熟。她第一次见到宋庆龄，是1915年在日本。那时的廖梦醒只有11岁，与弟弟廖承志一起，在父母的带领下前往孙中山家恭贺孙中山与宋庆龄的新婚之喜。此后，宋庆龄一直待廖梦醒姐弟很好。宋庆龄的年纪介于何香凝和廖梦醒之间，廖梦醒一直尊称她为“Aunty”。抗战时期，廖梦醒长期协助宋庆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与廖梦醒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虽然见面次数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但是她们有大量书信来往。

上海解放以后，中共中央期待宋庆龄能够参加新中国中央政府的筹建工作，派廖梦醒陪同邓颖超前往上海，向宋庆龄转达中央的邀请，与宋庆龄进行深入的交谈。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等人的陪同下抵



宋庆龄题赠廖梦醒的照片。左四宋庆龄，左三何香凝，左二廖梦醒，左一廖承志

达北平，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从此，宋庆龄以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的身份，在新中国建设的事业之中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宋庆龄父母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墓地被红卫兵砸毁，宋庆龄非常难过。她让人将墓地被毁的情况拍成照片，请廖梦醒将照片交给周恩来。廖梦醒那时也受到“文革”的冲击，成为审查的对象，但她还是想办法很快将照片转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派人将墓地修好之后，也是廖梦醒将邓颖超的复信和修好之后的照片转交给宋庆龄的。这件事情也体现了宋庆龄对廖梦醒的信任。但是，在那些年，宋庆龄与廖梦醒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见面，只能通过信件交流。

1972年何香凝去世以后，宋庆龄给廖梦醒写信的频率更高了。据廖梦醒的女儿李涓整理，宋庆龄在1970年代给廖梦醒的信有160封之多。廖梦醒家三天两头便能收到落款为“林斌”或没有落款的牛皮纸信封，那便是宋庆龄的信。在信中，谈论的话题也多是与生活有关，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或是有什么烦恼，对过去生活以及老朋友的回忆，或者是对一些人的看法等。以至于廖承志开玩笑说宋庆龄打个喷嚏都要告诉廖梦醒。宋庆龄所知道的关于廖家的事，也都是从廖梦醒那里知悉的，有些宋庆龄也会在来信中告诉我。

鉴于我与廖家的亲戚关系以及对我的信任，宋庆龄在来信中自然都会提到一些与廖梦醒有关的话题，不过多是家常的事情。1971年，廖梦醒搬家，从内务部街搬到西便门，条件比原来好很多。宋庆龄在1971年11月2日的来信中写道：“我听说梦醒已经搬到一个更好的房子去了，有她所需要的所有现代化设施，如暖气、煤气炉和木地板。她现在还有电话了，因此非常满意。”1980年，廖梦醒要访问日本，宋庆龄很为她高兴，在给她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件事情。不过，宋庆龄对廖梦醒的身体状况又有点担忧，因为廖梦醒不久前刚刚因为摔跤做完手术，臀部打了一根钢



宋庆龄给廖梦醒的贺卡

钉，所以宋庆龄觉得“她是不能到处跑的”。

宋庆龄与廖梦醒晚年除了频繁的书信往来，她们的友情还体现在生活中的相互关心。每年孙中山诞辰和逝世纪念日，廖梦醒都会送鲜花给宋庆龄，从不遗漏。宋庆龄也经常将朋友送来的东西分送给廖梦醒等。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初，廖梦醒家不时收到宋庆龄派人送过来的牛皮纸信封，里面常有五香豆、熏鱼、点心、芒果等。1972年初，我托人给宋庆龄带去一些巧克力，宋庆龄立刻派人送了六包给廖家，其中四包给何香凝，两包给廖梦醒。廖家人虽然都很喜欢吃芒果，但是有人送来芒果，也必然会分送一些给宋庆龄。廖梦醒与宋庆龄一样，经常摔跤，非常容易骨折，因而宋庆龄屡次在给她的信中嘱咐她走路要小心。

宋庆龄晚年有很多朋友来访，有些是当年保卫中国同盟一起共事过的，宋庆龄宴请这些朋友的时候，常会让廖梦醒一起出席。很多宋庆龄与朋友欢聚的历史瞬间，都能找到廖梦醒的身影。

宋庆龄1981年去世前夕，廖梦醒和女儿李湄在香港，回到北京时宋庆龄已经去世。那时廖梦醒虽然站立困难，却依然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守灵仪式，还与其他亲友一起，护送宋庆龄的骨灰前往上海安葬。在廖梦醒撰写的《我所知道的宋庆龄》一文中，她深情追忆了与宋庆龄多年的友情。

16. 宋庆龄信中的“肥仔廖”

与廖梦醒一样，廖承志的名字也常常出现在宋庆龄的来信中。廖承志幼年便与宋庆龄相识，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工作中与宋庆龄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称宋庆龄为“Aunty”（叔婆）。

廖承志一生为革命数次坐牢，最令他难忘的是1933年3月28日，他在上海公共租界五福弄8号被国民党非法逮捕，宋庆龄挺身而出，积极参加营救。得知廖承志被捕的消息后，宋庆龄第二天便前往何香凝的寓所表示慰问，并与何香凝长谈。3月30日上午，宋庆龄主持召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执行委员会议，与蔡元培等人商量，委托上海著名律师吴凯声等担任同被国民党逮捕的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人的辩护律师。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此还特别发表宣言，唤起国人支持。宣言严正指出，国民党当局对廖承志等人的逮捕实属非法，在国难当头之际，不应对致力于反帝御侮之士愈加压迫，应立即予以释放。在何香凝、宋庆龄、柳亚子等人的积极营救之下，廖承志终于获释。

在抗战中的香港，宋庆龄和廖承志在工作中互相支持，



抗战初期的廖承志



1933年3月30日《申报》关于廖承志在租界被捕的报道

紧密配合，共同为了争取国际援助，宣传和支持抗战而不懈努力，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与廖家的亲密关系一如从前。廖承志有机会便会去看望宋庆龄。宋庆龄在北京寓所宴请客人，常让廖承志、廖梦醒一起陪同。出于工作和治疗的原因，宋庆龄需要往返于京沪两地，廖承志常携夫人经普椿到机场送行或迎接。“文革”中，廖承志被隔离，宋庆龄非常关心，经常派秘书打听他的情况。宋庆龄遇到困难，也会请廖承志帮忙想办法。廖承志一生幽默风趣，大多数时候都是嘻嘻哈哈，喜欢开玩笑。但他一生对“Aunty”宋庆龄特别敬重。

宋庆龄来信提到廖承志，通常叫他“Ted”或“Fatty”，“Ted”是廖承志的英文名字，“Fatty”是廖承志的绰号“肥仔”。其实廖承志小时候也不胖，年轻时大家都叫他“小廖”，1930年代发福以后得了个“肥仔”的称号。他饭量极大，食欲旺盛，但是因为有心脏病，所以舅妈经普椿总是管着他。不过廖承志一点也不以为意，还常常自嘲。廖承志曾在给我们的一封信中以他那特有的幽默说：“头上的紧箍咒（不准偷食、不准贪食、不准馋吃）动弹



1966年4月宋庆龄在北京寓所会见廖承志

不得，半夜饿得好凄凉。”（廖承志 1972 年 4 月 22 日信）但是一出国，舅妈不在身边，廖承志就放开肚皮吃，因此也常常会引起一些身体不适。宋庆龄 1974 年 3 月 1 日的来信中就提到了这样的情况：“上星期我听说你肥仔舅舅参加了总理的一次宴会，瘦子没能跟他一起去，所以肥仔把所有的肉都吃了，觉得不舒服了。他被送到了北京医院，目前正从轻微的心脏问题中恢复过来。我听说他又要回家了，所以别紧张！”信中的“瘦子”是舅妈经普椿的外号，与廖承志的大腹便便正相反，经普椿人很瘦，廖承志曾开玩笑说她“瘦得像马骝（广东方言，猴子），泡在猪油里也胖不起来”。

宋庆龄也很关心廖承志的健康。1975 年 9 月 5 日，宋庆龄在来信中说：“你肥仔舅舅吃了太多的安眠药，从床上掉下来了，还好没有骨折，他现在没事——骨头没断。不过从北戴河回来以后他总觉得饿，在那里他能吃掉所有的螃蟹。”外人有所不知，廖承志吃的安眠药都是我提供的。在我常年给廖家提供的生活用品中，给廖承志的安眠药和心脏药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廖承志戏称这些安眠药为“红红绿绿的药”。当时这些药很难买到，需要医生的处方，我是通过朋友李稚麟医生开的处方才弄到的。不过，后来，从宋庆龄的来信中我得知，廖承志和经普椿好几次都因为服用安眠药过量从床上摔下来，有一次经普椿还磕破了下巴，半夜到医院去缝针，所以宋庆龄在 1980 年 2 月 1 日的来信中说：“你去看望你舅舅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瘦子总是服用过量的安眠药，如果她死了，人们会责怪你的，所以不要再给她安眠药了！”鉴于这种情况，后来我也就不敢再提供安眠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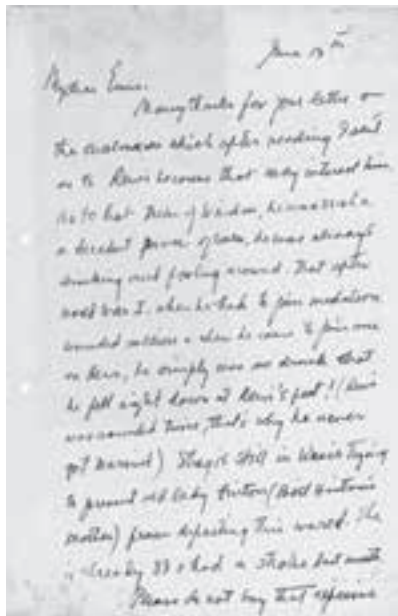
宋庆龄去世以后，廖承志的一首饱含感情的诗“童年初睹丰姿美，六十五年事尚新；痛惜伟人今谢去，深宵泪湿满衣襟。”淋漓尽致地反映了他们姐弟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征程中与宋庆龄建立的革命情谊，凡读过这首诗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17. 宋庆龄与路易·艾黎

在宋庆龄给我的信中，路易·艾黎的名字出现的频率很高。路易·艾黎早在1930年代就与宋庆龄相识，此后与宋庆龄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37年上海沦陷的危急关头，艾黎冒着生命危险，护送宋庆龄离开上海。“文革”期间，很多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的国际友人被打成“特务”、“间谍”，被批斗，被送进“牛棚”。宋庆龄尽管自己也受到冲击，处境艰难，但依然挺身而出，亲笔为艾黎写下一封证明信，称颂艾黎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列宁的信徒”，并宣布“我极端相信他”。为了保护艾黎，宋庆龄尽了一个同志和战友的崇高责任。艾黎曾经说过，宋庆龄的证明信使他免遭怀疑和迫害，成了少数几个当时没有身陷囹圄的国际友人之一。

宋庆龄与艾黎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友谊非常深厚。宋庆龄给艾黎写信的时候，喜欢叫他“比尔”，这是朋友们给他的昵称，因为很多人都不能正确地发“Roobie”的音，而是念成“Re-wee”。宋庆龄非常关心艾黎，给我的来信中几乎每封都会提到艾黎，例如身体状况、在做些什么事情、近期去了哪里，等等。

艾黎为人风趣，常给宋庆龄讲一些有趣的事情，惹得宋庆龄开怀大笑。宋庆龄在1972年6月13日的信中就说了一件艾黎讲过的趣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西兰作为英联邦国家参战，年轻的艾黎应征入伍。他在西线战场上浴血奋战，曾在战壕里蹲了整整一个月，中弹致残，为此获得勋章。给他授勋的是英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不爱江山爱美人”，后被封为温莎公爵的王储爱德华。爱德华以嗜杯中物著称，授勋时，他竟在为艾黎扣勋章的当儿醉倒在地。而爱德华为之放弃王位的美国离婚妇人辛普森夫人，宋庆龄早年在上海曾经见过。宋庆龄在1975年3月21日的信中讲了另外一件趣事。宋庆龄与艾黎有一位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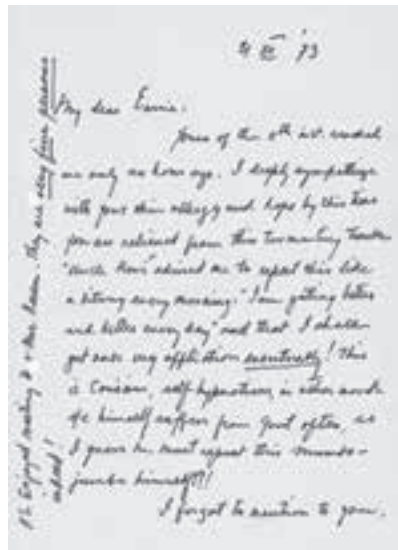
1972年6月13日宋庆龄来信第一页

同的朋友伯纳德·巴克曼（Bernard Buckman）先生，是英国实业家，1950年代与南汉宸、冀朝鼎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以后，一直从事促进中英贸易的工作，与我也相熟。巴克曼先生知道艾黎喜欢吃奶酪，从香港托运了一批食品给艾黎，其中有他精心挑选的10种奶酪。可是“经过12小时之后它们就像发了瘟疫的羊一样散发着异味”，不得不连同奶酪一起全部丢弃了。艾黎将这件事情讲给宋庆龄听，惹得宋庆龄哈哈大笑。宋庆龄知道艾黎喜欢奶酪，为了让他开心，还特地给他做了个苹果派。

艾黎也是个乐观的人，宋庆龄晚年受病痛折磨，艾黎建议她每天“自我催眠”缓解病痛。宋庆龄在1973年12月21日的信中是这样写的：“‘路易大叔’建议我每天早上重复下面的祈祷：‘我每天都在好转’，以后我的要求最终就能实现！换句话说，这是自我催眠。他自己经常受痛风的困扰，所以我猜想他一定每天都念念有词！！”

1974年1月，艾黎因为腹痛住院手术，其间宋庆龄每次来信都会告诉我艾黎病情的进展情况，关切之情溢于言表。艾黎住院期间，马海德经常去看望他，然后再将他的情况告诉宋庆龄。宋庆龄有时来信时便将马海德关于艾黎近况的信一并寄给我，好让我和陈乙明等朋友放心。因为艾黎住的医院饮食单调，宋庆龄便将我送给她的青梅果酱分送给他，换换口味。

据我所知，每逢外国朋友过生日，宋庆龄总会在家中设宴为他们庆祝，每次都要提前安排，并将众好友请来，大家共叙友情。北京寓所那张长长的餐桌，见证了他们每次聚会的欢乐。好朋友艾黎的生日自然也不例外，通常，宋庆龄都会记得很清楚，而且很早就开始准备。1973年11月2日，离艾黎的生日还有一个月，宋庆龄就给我写信说：“希望到12月2号我能完全恢复，好庆祝好朋友艾黎的生日。如果你和君莲能来参加我们的私人聚会就太好了。到时候会有一个小型的宴会，参加者是他的仰慕者和朋友。”11月底，宋庆龄收到了我给她的食品，她特地将



1973年12月21日宋庆龄来信第一页

艾黎喜欢吃的东西放在冰箱里，等艾黎来的时候一起分享。12月2日晚上，宋庆龄的一些老朋友在她家里聚会，为艾黎庆祝生日。从宋庆龄几天后的来信中看得出她非常开心。艾黎的生日庆祝办得很成功。宋庆龄为他准备了一个大蛋糕，他们喝了100年陈酿的白兰地，马海德夫妇、米勒夫妇、柯弗兰夫妇等都出席了庆祝会。那天晚上还放了几场电影，包括禁放的《红楼梦》等，一直待到凌晨1点半。虽然每个人都哈欠连天，但是大家都很开心。

1980年12月2日，艾黎的83岁生日也是在宋庆龄的北京寓所庆祝的。宋庆龄之前曾希望我和我的医生李稚麟去北京一起参加，可惜我们因故不能前去。那天很多宋庆龄的老朋友都出席了宴会，有格兰尼奇(Granich)夫妇、马海德夫妇、米勒夫妇、爱泼斯坦夫妇、陈志昆和夫人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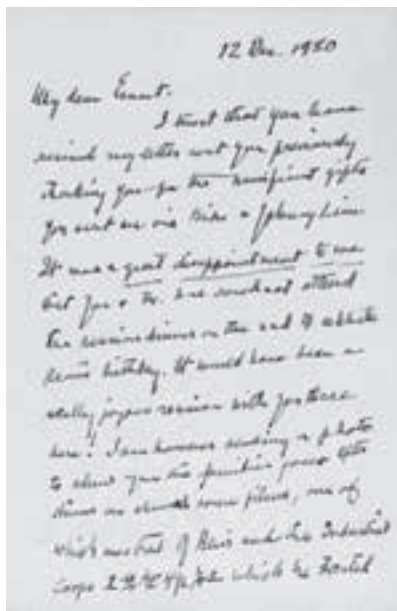


1980年12月宋庆龄设家宴为艾黎祝寿

寿珍以及他们的女儿陈燕、杨孟东夫妇、沈粹缜等。那天，宋庆龄非常高兴，宴会后，还同客人们一起照了相。

宋庆龄在12月12日给我的信中说：“你和李医生不能来参加2号为艾黎庆祝生日举行的聚会，真是太遗憾了。你们三个都在的话会是一个快乐的聚会！不过，我给你寄了一张照片，让你看看熟悉的面孔。餐后，我们看了几部电影，其中一部是关于艾黎和工业合作社的，是他在埃德加·斯诺和佩格·斯诺等人的帮助下开展起来的。”宋庆龄在信中说我们不能去对她而言是“a great disappointment”，并在下面划线以示强调。

宋庆龄晚年在家中举行的朋友聚会，总会有艾黎的身影。无疑，艾黎是团结在宋庆龄身边的众多国际友人中非常重要的一位，给宋庆龄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1980年12月12日宋庆龄来信第一页



1980年12月宋庆龄在寓所为艾黎祝寿，宴会后与客人们一起合影留念

18. 宋庆龄与邻居马海德

在宋庆龄晚年给我的信中，马海德的的名字通常是与艾黎一起出现的。宋庆龄与马海德的友情也很深厚，1934年便与他相识。此后，经由宋庆龄介绍，马海德与埃德加·斯诺并肩走进延安。可以说是宋庆龄为马海德打开了通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门，使得他能够以满腔的热情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做贡献，也成就了他与宋庆龄绵延半个世纪的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自1950年起直到1988年去世一直住在后海北河沿24号院，与1963年4月起常住在后海北河沿46号的宋庆龄是邻居。马海德夫妇经常到46号的宋庆龄家串门。有时候我给宋庆龄的信也是寄到马海德家的地址，然后由他转交的。记得1972年4月，宋庆龄托我帮忙给隋永清买手表，并嘱咐我将告知价格的信封在一个信封里，装到给马海德的信封里，寄到后海北河沿24号马海德的家。如此转弯抹角，实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那个年代，宋庆龄时常会遭遇信件收不到、不能按时到达，或者已经被拆开之类的事情，所以宋庆龄就采用了迂回的办法。她给我的这封信也是寄给陈乙明，再由陈乙明转交给我的。不仅是信件，有时候我给宋庆龄的包裹，也是马海德转交的。由此也可以看得出宋庆龄对马海德非常信任。

因为是邻居，马海德有了什么关于朋友们的情况，总是会第一时间告诉宋庆龄。宋庆龄生病卧床期间，马海德时常写信告诉她外面有什么新闻。艾黎住院手术的时候，也是马海德经常去看望他，再将他的情况告诉宋庆龄。

宋庆龄在给我的信件中常常都会提到马海德，亲切地叫他“Shag”，除了谈及他近期做了什么以外，有很多谈及健康状况，例如：

“马海德最近也因为胃部的一些问题住院了。”（1976年3月27日）

“听说马海德会在下个礼拜出院，做手术时他的胃上被插了三根管子，又得用尿布了！”（1976年5月4日）

1977年10月，得知马海德因患“胰腺癌”住院手术，宋庆龄非常难过，但是她自己年纪也大了，又因摔跤卧床很久，加上腰背疼，左右无人搀扶不能走路，因此也不能去看望马海德，只能靠电话和书信了解他的情况。

1978年4月，住院半年之久的马海德出院了，宋庆龄在16日给我的信中说：“马海德已经回家了，计划着25号和他的妻子一起去巴黎和纽约——他们将和萨缪尔·罗森医生及夫人一起在那里。马海德要离开两个月。我希望在这长途旅行期间会有一个称职的医生照看他。马海德非常爱吃烤羊肉，可我不敢给他送去。作为他的邻居，我想给他吃些对他没有任何坏处的柠檬和苹果馅饼。毫无疑问，吃了六个月医院的饭菜，他需要换换口味。今天是星期天，我要给他做芥末酱沙丁鱼鸡蛋。幸运的是，我昨天得到了一些柠檬，正好和鸡蛋配着吃。艾黎21号回来，到时候马海德就可以听到只有艾黎才会讲的有趣的故事了。”

1978年5月，宋庆龄在寓所接见来华访问的“二战”时期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迪克西使团”，他们中的一位卡斯伯格（Casberg）医生带来一个关于马海德的好消息，即马海德患的可能不是癌症，而是某种可以治愈的类似癌症的病。因为卡斯伯格医生来中国前在美国华盛顿机场遇到了去美国参观演讲的马海德，并给他做了全面的检查。宋庆龄非常希望真能如卡斯伯格医生说的那样，马海德的病不是癌症。她在1978年6月23日给我的信中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好的消息了！等他回来，我希望你过来和我们庆祝一下！”正如宋庆龄希望的那样，马海德患的确实不是癌症。1979年3月，马海德再次接受手术，顺利成功，手术结果证明他患的是胆结石和胰腺炎，想必宋庆龄知道后一定非常欣慰。

1979年9月26日，宋庆龄在家中设宴为马海德庆祝生日。因为正好是国庆30周年，宋庆龄邀请我去北京参



1979年9月宋庆龄设家宴为马海德（左一）祝寿。右为马海德夫人苏菲以及格兰尼奇

加庆典。可是我的行程延期，马海德的生日宴会我没有参加。那天，宋庆龄邀请了很多老朋友，有罗森（Samuel Rosen）夫妇、格兰尼奇夫妇、路易·艾黎、耿丽淑（Talitha Gerlach）等。宋庆龄拿出了她珍藏40多年的法国白兰地，那张著名的宋庆龄与马海德喝交杯酒的照片，便是在那次聚会上的珍贵留影。

19. 宋庆龄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

在宋庆龄的晚年生活中，与各方朋友的友好往来是她生活中很重要的内容，也带给她许多快乐。在这些朋友当中，有些是她与我父亲共同的朋友，因而与我也相识；有些是我在与她的交往中所结识的，例如一些在国内定居的外国友人；还有一些原是我的朋友，我将他们介绍给宋庆龄，从而他们与宋庆龄也成了朋友。

我比较熟的一位朋友爱泼斯坦是宋庆龄非常信任的朋友之一。宋庆龄与爱泼斯坦的友谊同样始于1930年代。关于他与宋庆龄在多年的革命工作和新中国的建设中建立的信任和友情，已经广为人知。在数十年的风雨岁月中，他是宋庆龄开展对外宣传和架设中外友谊桥梁的得力助手，也是宋庆龄唯一信任的为她写传记的人。宋庆龄生前写给他的信件有200多封。他为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投入了大量精力和心血。宋庆龄所撰写的重要文稿，有很多都是请他帮助提供资料，征求意见，修改润色的。宋庆龄于1966年2月在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大会上发表的著名演讲稿《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就请爱泼斯坦提供过修改意见。“文革”开始后，爱泼斯坦与夫人邱茉莉（Elsie Fairfax-Cholmeley），还有《中国建设》杂志社的一些工作人员被逮捕，投入监狱，一度与宋庆龄失去了联系。

1973年爱泼斯坦和妻子获释，宋庆龄非常高兴，他们又恢复了往日的联系和书信往来，不仅是工作上的，还有生活中的。宋庆龄家中的友人聚会，爱泼斯坦和夫人常在受邀请之列。宋庆龄去世以后，爱泼斯坦没有辜负宋庆龄的信任和重托，花了十年时间，完成了《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这本书。由于他与宋庆龄共事多年，能够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并结合历史背景，因而，他的这本书得到公众认可，并且被公认是目前最好的关于宋庆龄的传记。



1980年宋庆龄会见
爱泼斯坦和邱茉莉

爱泼斯坦当年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与我父亲共事过，因而对我也很亲切，我们自然成为朋友。他每次到香港，我都与他见面。记得有一次，我带他坐游艇去看当年他逃出香港的地方。正值冬季，当日风很大，因此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我所熟悉的另外一位朋友陈乙明也是宋庆龄的老朋友了，他是当年宋庆龄在香港领导保卫中国同盟时经何香凝介绍与宋庆龄相识的。作为香港著名的执业会计师，陈乙明替“保盟”义务审核了三年账目。我父亲经手的“保盟”账目，经陈乙明审核，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而通过与“保盟”的合作，陈乙明与宋庆龄、廖梦醒及我父亲亦结下了终身的友谊。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陈乙明作为特邀嘉宾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他也是当选的第一届政协委员中唯一的一位港澳人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设计新中国国旗的特别委员会成员之一。每次陈乙明去北京看望宋庆龄，宋庆龄都很开心。

美国进步学者柯弗兰一家也是宋庆龄宴会上的常客，我与他们也有过一些接触。柯弗兰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罗斯福执政时期，政策比较开明，柯弗兰在美国政

府和国际货币机构中担任过高级职务。他曾秘密加入美国共产党，在麦卡锡时期逃离美国。1958年，柯弗兰来到中国定居和工作，担任过经济研究所和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特约顾问，参与过《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校订工作，曾经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柯弗兰一家经常帮我转交外国杂志和阅读材料给宋庆龄，特别是柯弗兰的夫人柯如思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凯蒂（Katy）和玲玲（Ling-ling）。凯蒂和玲玲常跟着父母到宋庆龄家做客，也为宋庆龄传递阅读材料。那些年，有很长一段时间看外国报刊是不能公开的，宋庆龄曾对我说，柯弗兰一家经常带报刊和杂志给她看，使她能保持对外界的了解。不仅是报刊杂志，他们一家也经常帮我带包裹给宋庆龄。

宋庆龄的老朋友中，德国医生汉斯·米勒早已为大家熟知，他们一家与宋庆龄也很熟悉。米勒大夫1939年9月经廖承志介绍，通过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从香港辗转到达延安，又在同年冬天，与包括柯棣华在内的印度援华医疗队一起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到达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他与“保盟”中央委员詹姆斯·贝特兰一起，不畏艰险，为“保盟”护送过12辆卡车和600箱医药用品到西北国际和平医院。他和出生于日本的妻子中村京子



1980年4月12日宋庆龄在家中宴请抗战时期积极支持“保盟”工作的老朋友，左为艾黎，右为米勒

是在八路军中相识的，那时，中村京子是护士。他们一起在中国抗日和解放的战场上救死扶伤，做出了很多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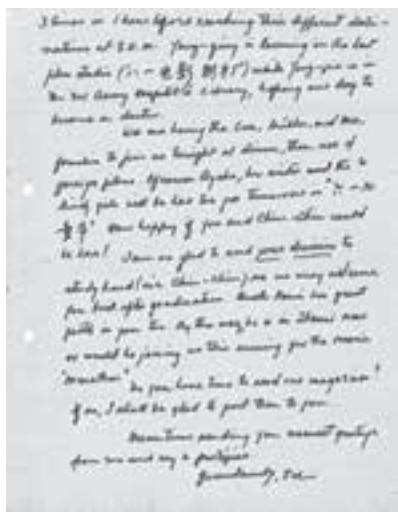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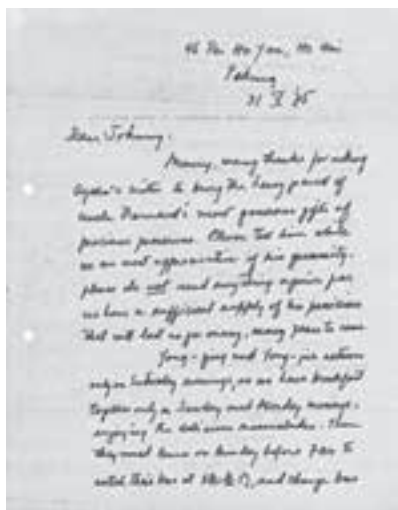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后米勒大夫入了中国籍，后来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国内多家医院的院长，为新中国的卫生事业不遗余力。其中最具影响的是1975年北京医学院肝病研究所在他的指导下，首先在中国研制出乙型肝炎疫苗。

1970年代初，米勒一家在北京定居。米勒为人诚实热情，乐于助人，他们一家与宋庆龄关系密切，宋庆龄常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宋庆龄在寓所宴请好朋友，米勒一家也常在受邀之列。有时米勒大夫去国外路过香港，宋庆龄会请他帮忙将我给她的包裹带回北京。

宋庆龄非常喜欢米勒的女儿米蜜（Mimi）以及儿子德华（Teh-hua），经常让他们到家里玩，与他们也都有书信往来。宋庆龄在给我女儿的信中，除了不时提到永清、永洁、凯蒂和玲玲之外，提得较多的就是米蜜和德华姐弟。每次说到米蜜与德华要到家里吃饭，宋庆龄都很高兴。我从宋庆龄的来信中得知，米蜜和德华都非常优秀，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米蜜后来随丈夫去了瑞士。在那里，她工作非常努力，与宋庆龄也有书信往来，宋庆龄很是惦念她。

在北京读大学的马来西亚华侨青年林忠世（Johnny Lin），与廖承志的关系亲如父子，经常到廖承志家做客，因而与我也相熟。廖承志写信给他都以“肥父”自称，跟我们提起林忠世时则称他为“小洋鬼”，说他心肠很好。林忠世的父亲到坦桑尼亚做工程师，认识一些非洲外交官。他们路经香港时，林忠世将他们介绍给我，我在招待他们后即将给宋庆龄的物品托付给他们带到北京。记得1974年12月，林忠世给宋庆龄带去了我、陈乙明以及李稚麟医生给宋庆龄的东西，宋庆龄请他到家里吃饭。12月底，林忠世离开北京，宋庆龄托他带了八包蜜饯给我和陈乙明。

还有一次，林忠世甚至设法将整套大英百科全书扛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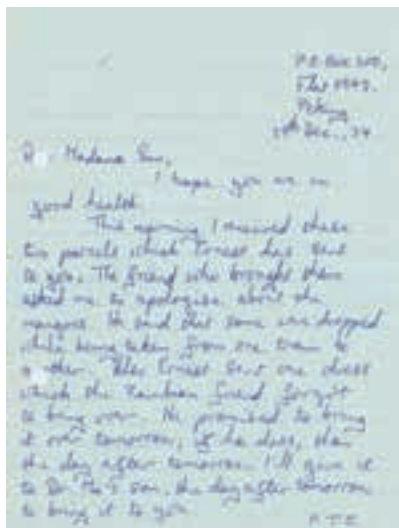
1975年5月31日宋庆龄致林忠世信

了北京，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林忠世的一位非洲朋友阿霞，是外文出版社的斯瓦西利语专家，也是我的朋友，是我将她介绍给宋庆龄的。1970年代，阿霞也是宋庆龄家的常客。阿霞认识很多非洲的外交官，他们出入境可以享受免检的待遇，因而，阿霞和她的很多非洲朋友都成了我的“运输大队”，我在香港接待他们以后，他们帮我将一箱一箱的物品带进北京，交给廖承志夫妇和宋庆龄。宋庆龄与外国友人聚会的时候，也常常会邀请阿霞和她的女儿们一起来。有时候宋庆龄要给我一些重要的阅读材料，也是通过阿霞转交给我。

宋庆龄经常将这些中外的老朋友邀请过来，欢聚一堂。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次聚会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宋庆龄称之为“大家宴”。那是1974年，我带着女儿邓勤去北京看望宋庆龄。差不多同时期，陈乙明带着他的家人和朋友也来到北京。宋庆龄安排我们于7月11日到她的寓所赴宴。晚上6点，我们如约来到宋庆龄的家中。那天真是一个大的聚会啊，除了陈乙明夫妇、他们的丹麦儿媳和五个孙子，以及与陈乙明一家同来的黄雯医生的夫人容玉枝、我和女儿邓勤，宋庆龄抚养照顾的两个女孩子永清和永洁以外，宋庆龄还邀请了阿霞和她的三个女儿、马海德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幼马、路易·艾黎、柯弗兰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凯蒂及玲玲、爱泼斯坦的夫人邱茉莉、廖承志夫妇，还有廖梦醒。大家欢聚一堂，气氛十分愉悦。宋庆龄戏称7月11日就好像是“儿童节”——小孩比大人多。

宴会以后，大家提议拍照留念。后来，所有参加聚会的人，都围在宋庆龄身边，又拍了一张大合影。照片中人，既有耄耋老人，又有黄发小儿，可谓不同年纪；既有黄皮肤、白皮肤，又有黑皮肤，可谓不同种族；既有中国人，又有外国人，可谓不同国籍，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被宋庆龄的精神品质和高贵人格所吸引而紧密团结在她身边的。多年后看这张照片，依然能想起当年大家欢聚一堂的愉快情景。



1974年12月29日阿霞致宋庆龄信



1974年7月11日宋庆龄设家宴款待我们大家。左为陈乙明，右为邓广殷



1974年7月11日在宋庆龄北京寓所。前排左起：邓勤、邓广殷、陈乙明儿媳；
后排左起：黄雯夫人容玉枝、陈乙明夫人黄炜贤、马海德、宋庆龄、路易·艾黎、
陈乙明、经普椿、廖承志、马海德夫人苏菲、廖梦醒、爱泼斯坦夫人邱茉莉



1974年7月11日在宋庆龄寓所的大合影

除了在北京的相聚以外，我在香港也接待过不少宋庆龄的朋友。那时候，中国和西方很多国家之间没有直接通航。在中国的外国朋友如果要回国探亲或办事，都须经过香港。鉴于我家与宋庆龄的友情以及我家在香港的便利条件，每次有人路过香港，宋庆龄都让我负责接待。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对宋庆龄、廖承志交办的事情向来是不遗余力的。他去世以后，我继承他的遗志，将他们的事情看成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在香港招待他们的这些朋友总是尽心尽力。

现在当我回忆起这些朋友的时候，他们中许多人都已作古。他们的后人，有些与我还保持联系，有些已不知去向。但每逢回忆起宋庆龄，我总不由自主地想起他们。



宋庆龄寄给我和家人的 1975 年新年贺卡

20. 安多利恒花背后的故事



宋庆龄亲自制作的安多利恒花绣品，现仍悬挂在宋庆龄北京寓所的卧室里

在北京宋庆龄故居她的卧室里，悬挂着一幅宋庆龄亲自制作的绣品，黄色绸布上三朵火红的心形花朵，在两片叶子的映衬下显得美丽卓绝。这是宋庆龄最喜欢的安多利恒花，即我们现在熟知的红掌，其外形酷似鹅掌，原产自美国夏威夷，代表吉祥如意，是宋庆龄的一位美籍日本友人有吉幸治（Koji Ariyoshi）赠送的。花总有凋谢之时，为了留住它们的美丽，宋庆龄将它们绣出来，让它们永远绽放。而宋庆龄与有吉幸治的友情，也像这幅绣品一样被永久地珍藏。

有吉幸治是一位美籍日本进步人士，1940年代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来华，并在当时的中、印、缅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麾下服役，任新闻室记者。在重庆期间，经廖梦醒介绍，有吉幸治认识了宋庆龄、廖承志以及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吉幸治被派到延安，以美军人员身份协助做日军战俘工作。当时有吉幸治写给美国的一些报告被认为是过分亲共，因此被遣返回了美国。回到美国后，有吉幸治创办了一份左翼报纸《火奴鲁鲁纪事报》，在舆论上支援中国共产党。他还在夏威夷组织了夏威夷—中国友好协会，并任会长，致力于美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

1951年，有吉幸治受麦卡锡主义迫害，被抓入狱。宋庆龄得知后，为了帮助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托人将她结婚时父母送的一套绣服带到美国，交给有吉幸治的家人，希望他们将绣服变卖，用于支付聘请律师的费用。有吉幸治的妻子感激宋庆龄的情谊，没有将绣服变卖，而是一直珍藏在家中。有吉幸治出狱后在夏威夷开了一家小店铺，售卖食品、鲜花和书报，其中也卖中国书刊。

1971年底，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有吉幸治即将到中国进行访问，这是他在阔别中国20年后的首次访华。宋庆龄于12月19日写信给我，让我帮她买一



有吉幸治与妻子在自己的花店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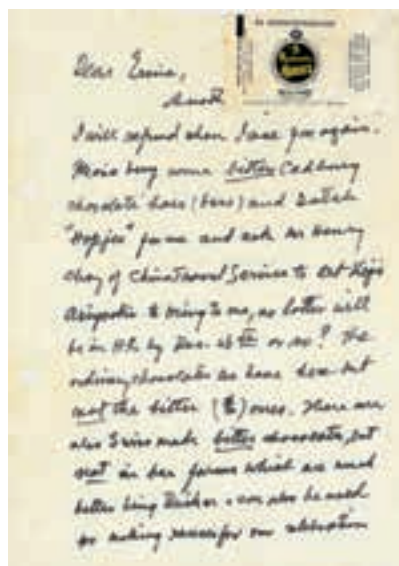
些巧克力和糖果，请香港中国旅行社的副总经理蔡福就先生交给有吉幸治带到北京。有吉幸治 1971 年底路过香港时，住在九龙柯士甸道的金门饭店（许多朋友都在那里住过，中旅社的黎汝湛、宋霭澄两位经常负责招待）。当时孙中山的亲戚陈志昆一家也在香港，我请他们一同吃饭。有吉幸治与陈志昆都是夏威夷居民，本就相识，20 多年没有见面。这次聚会，大家异常高兴，我与有吉幸治也因此相识。

1972 年 1 月 2 日，宋庆龄在北京寓所设宴款待有吉幸治，马海德、廖梦醒、廖承志都参与了会见。有吉幸治给宋庆龄带了两打产自夏威夷的安多利恒花，宋庆龄非常喜欢，认为这是友谊的象征，立即将花分送给了周恩来等友人。据我所知，宋庆龄还曾请新华社摄影部的工作人员到她的寓所拍摄安多利恒花，可见她对此花的喜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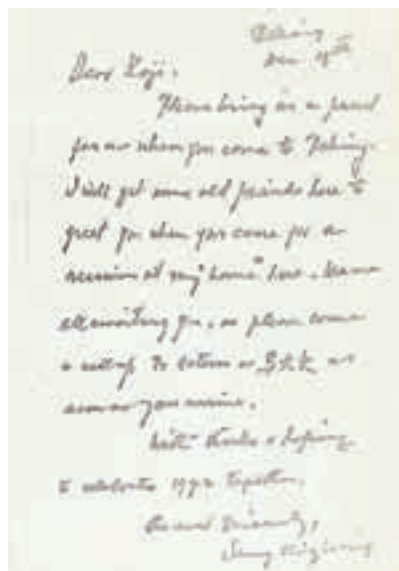
1975 年，我去夏威夷旅行，顺便去看望了有吉幸治。此时，他已身患癌症，但仍热心地带我游览檀岛，并托我带了两盒夏威夷安多利恒花去北京，一盒给宋庆龄，一盒



有吉幸治于 1972 年



1971 年 12 月 19 日宋庆龄来信第一页



1971 年 12 月 19 日宋庆龄致有吉幸治信



1979年6月19日，宋庆龄会见小有吉幸治率领的美国夏威夷访华团



宋庆龄画的安多利恒花

给廖梦醒。

有吉幸治一直致力于美中友好交往，曾计划于1976年10月再次访问中国，宋庆龄曾在1976年6月写信给廖梦醒，希望她能够请廖承志呼吁中国政府在有吉幸治访华时给他一些资助，并称他为“一位真正的朋友和战士”。可惜，10月的时候，有吉幸治已经病重，不能来中国了。不久就传来有吉幸治去世的噩耗，大家都十分悲痛。宋庆龄在给我的信中说：

“你知道檀香山的有吉幸治在几周前手术后去世了吗？他是一个勇敢的演说家，为中国不懈工作了30多年。美中友协通过他得以建立，并在国外（美国）广泛发展。这对我们帮助很大，他也是我个人的朋友。现在我希望他唯一的儿子，罗杰（Roger），能够继续从事他的工作。”

诚如宋庆龄所愿，有吉幸治的儿子小有吉幸治在父亲去世以后，积极致力于美中两国的友好交往。他每年都给宋庆龄寄去她喜欢的安多利恒花。1979年6月，小有吉幸治率领美国夏威夷访华团到北京看望宋庆龄，受到宋庆龄的亲切接见。1981年宋庆龄去世后，小有吉幸治受母亲的嘱托，于同年10月带着当年宋庆龄赠送给他们家的那套珍贵的绣服来到中国，找到了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提出了让它回到中国的愿望。廖承志接过这套绣服，感觉意义重大，便决定将它送到北京宋庆龄故居展出，让世人了解它所承载的宋庆龄对友人的亲切关怀，以及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

如今，这种原产自夏威夷的花早已经引进中国，而我对这种火红的花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不管在哪里看到这种花，我都会想到宋庆龄，想到她与有吉幸治之间的深厚友情。

21. 宋庆龄与斯诺一家的友情

在宋庆龄的众多外国友人中，埃德加·斯诺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他与宋庆龄的友谊亦始于1930年代。众所周知，1936年，斯诺就是经宋庆龄介绍，前往延安采访的。采访之后，斯诺写成了震惊世界的《西行漫记》，使世人第一次了解了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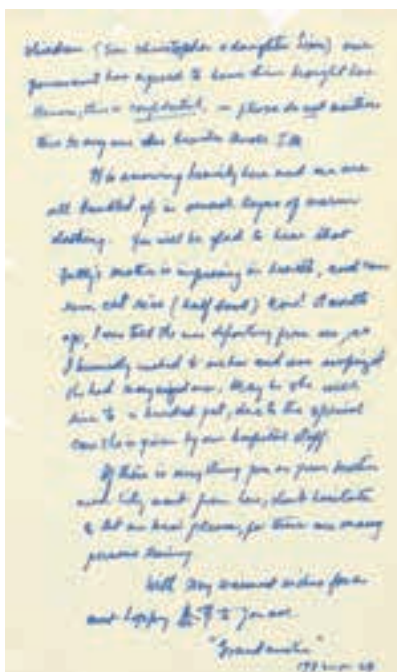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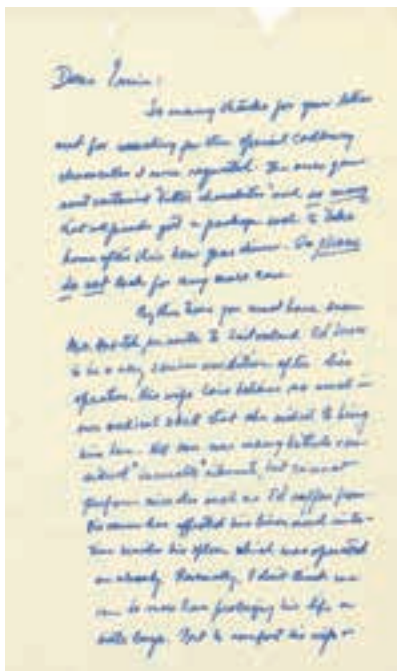
抗战中，宋庆龄与斯诺也有密切的联系，斯诺与艾黎倡导的“工合”运动得到宋庆龄的关心以及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大力支持。斯诺去香港时，也积极协助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后来斯诺因报道皖南事变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被迫于1941年离开中国。在麦卡锡主义时期，斯诺被迫迁居瑞士。这期间，斯诺与宋庆龄有书信往来。

直到1964年12月，斯诺重访中国，他与宋庆龄才得以再次会面。此时距他们当年在香港一别已经有23个年头。宋庆龄在北京寓所与斯诺亲切交谈，廖承志、爱泼斯坦作陪。1970年斯诺再次访华，不忘去看望宋庆龄。

宋庆龄在1970年给我父亲的信中提到，斯诺来华是



1964年12月宋庆龄在北京寓所会见埃德加·斯诺。左起：廖承志、邝莱莉、宋庆龄、爱泼斯坦、埃德加·斯诺



1972年1月29日宋庆龄来信

要重访34年前在她的帮助下进入的红区，为他的新书《漫长的革命》搜集资料。之后，斯诺回到日内瓦的家中整理采访笔记，投入新书的撰写工作。我有幸在香港与斯诺有了一次会面。那时斯诺路过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设宴招待他，也邀请我一起参加。席间提及我的父亲，斯诺说他完全不知道在广交会开幕宴会上他的老朋友邓文钊所经历的思想斗争。斯诺送了一本他的《西行漫记》给我们。我打开扉页，不禁吃了一惊，扉页上赫然留着斯诺的亲笔题字：“毛万岁！邓氏家族万岁！”

1972年，斯诺患胰腺癌，病情十分严重，不得不接受手术。中国政府派马海德带领医疗小组去瑞士探望他。得知斯诺病重的消息，宋庆龄非常担心，亲自发电报去慰问。

那段时间，宋庆龄在给她的信中，多次提到斯诺。她在1972年1月29日的信中写道：

“到这个时候你一定已经见过马海德，他正在去瑞士的途中。埃德加·斯诺手术后的情况很严重，他的妻子洛伊斯非常相信这里的医疗技术，希望带他来这里。我们能够治愈很多迄今认为是无法治愈的疾病，但对于埃德这样的病却无法创造奇迹。除了已经接受手术的脾脏以外，他的癌已经转移到了肝脏和肠。我个人认为除了延长他的生命以外我们已经做不了什么。但是为了安慰他的妻子和孩子[儿子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和女儿西安(Sian)]，我们的政府同意把他接过来。不过这只是私下里说说，请不要对除了乙明叔叔以外的人提及。”

半个月后的信中，宋庆龄说：“埃德加·斯诺情况非常严重，不能来了，医学也无法挽救他的生命。这太可怕了。马海德还和他在一起，还有我们政府派去帮助他的两个护士。所以我们的这位好朋友永远离开我们只是时间问题。事实上生命是很脆弱的。”（1972年2月12日）

1972年2月15日凌晨，斯诺在日内瓦病逝。得知斯诺去世的消息，宋庆龄非常难过，为斯诺逝世拟唁电稿直至深夜，并在2月16日给斯诺夫人发去了唁电。她在3

月6日给我的信中说：

“可怜的埃德去世了，他一生40年追随中国事业，写下了无数文章和十几本关于中国的书。所以我们对他的心存感激，他妻子告诉我们他的病情时我们尽一切可能减轻他的痛苦。埃德的几个在其他国家的朋友去日内瓦参加他的悼念仪式。

……

我在写一份关于埃德加·斯诺的简短材料，他是一个少有的高尚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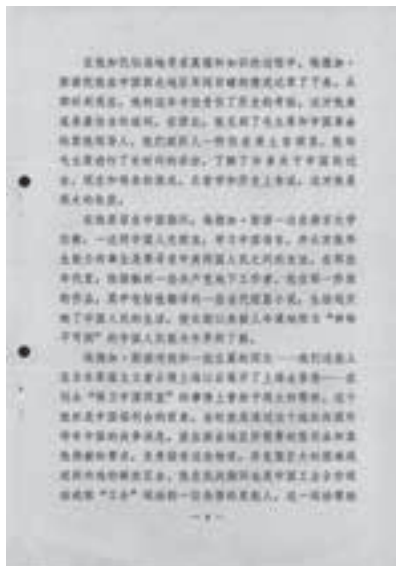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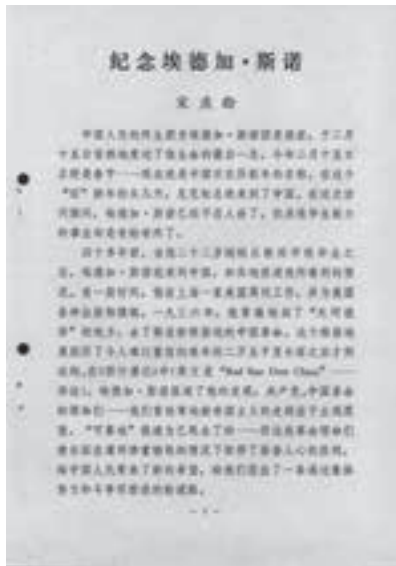
宋庆龄开始以为斯诺的骨灰会安葬在八宝山，实际上后来按照斯诺的要求，一部分葬在了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另外一部分安葬在美国赫德森河畔一位朋友家的花园中。

斯诺追悼会以后，斯诺夫人洛伊斯经常给宋庆龄写信。1972年3月26日，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斯诺夫人洛伊斯、她的妹妹卡欣·惠勒（Kashin Wheeler），以及儿子克里斯托弗·斯诺，在马海德的陪同下，到中国访问。考虑到斯诺夫人刚经历丧夫之痛，再加上长途旅行的疲劳，宋庆龄安排在4月1日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她在给我的信中说：

“斯诺夫人、她的妹妹卡欣和她儿子克里斯托弗在这里，但是经过来北京的30个小时的长途旅行之后非常疲劳。特别是洛伊斯·斯诺身心俱疲。所以我会让他们休息几天之后再请他们来谈谈，因为洛伊斯想去美国出版斯诺的新书和她自己的那本描述中国芭蕾和京剧的《中国的舞台艺术》。虽然她曾经是百老汇的舞者，她也能写很好的文章。她曾给法国的《世界报》（*Le Monde*）以及《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国家》（*The Nation*）以及《时尚》（*Vogue*）（一本女性杂志）等杂志撰文。”

4月1日，宋庆龄在家中设宴款待斯诺夫人一行，艾黎与马海德都应邀出席。

斯诺夫人于5月底离开中国，离开北京之前，开了一个盛大的答谢酒会，有关方面领导人以及外国友人都参加



宋庆龄寄给我的文章《纪念埃德加·斯诺》第一、二页



斯诺位于瑞士 Eysins 的家

了。宋庆龄在给我们夫妇的信中也提到了这次酒会，并说：“斯诺夫人来到中国后感觉好多了，这对她很有益处，让她知道她的丈夫是多么受人尊敬和爱戴。”5月20日，宋庆龄还特地在北京寓所设宴为斯诺夫人饯行。此后不久，宋庆龄发表了《纪念埃德加·斯诺》的悼念文章，深切怀念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宋庆龄还将登载这篇纪念文章的杂志寄给了我，可见她对于斯诺友情的珍视。

斯诺夫人路易斯一行访华后离开广州回国之前经过香港，宋庆龄让我接待他们。我带着他们到澳门游览。此后，斯诺夫人一家与我也成为了朋友。后来我的女儿邓勤在瑞士读书，与斯诺夫人一家也有来往。她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及女儿西安与邓勤是朋友。我去瑞士旅行以及去那里看望邓勤的时候，去过斯诺夫人的家里看望她。



1977年斯诺夫人路易斯在北京

那段时间，宋庆龄来信中常提到斯诺夫人的近况，而我也会将将在瑞士拜访斯诺夫人的情况告诉宋庆龄。1974年底，我和邓勤去斯诺夫人的家里看望她。斯诺夫人的农场景色很美，我向来喜欢拍照，便拍了一些农场的风景，也为邓勤以及斯诺夫人拍了很多照片。这些照片后来托人带到北京给宋庆龄，其中有一张斯诺夫人抱着小猫的照片，宋庆龄非常喜欢。宋庆龄1975年给我女儿写信的时候，还提到她经常将这些照片拿出来给朋友们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斯诺夫人多次受中国方面邀请访华。

22. 外国友人纷纷来访

1970年代，随着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北京似乎成了世界的交叉路口，很多曾经在中国工作或生活过的外国人都想回到中国看一看，因此，要求来中国访问的外国友人很多，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宋庆龄的老朋友。还有一些朋友写信给宋庆龄，请她帮忙加快来访的进程。宋庆龄在来信中说：“我过去的生活似乎又回来了，所有的老朋友都要来……”她在来信中经常告诉我近期接待了哪个朋友，有些什么趣事。在这些朋友中，有一些我有过接触，例如宋庆龄的老朋友格兰尼奇，有些则是我从宋庆龄的来信中所了解的，例如美国杰出的耳外科医生罗森、美籍华人杨孟东等。

格兰尼奇夫妇是宋庆龄的老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科德角。早在1930年代，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时刻，马克斯·格兰尼奇（Max Granich）与夫人格雷斯·格兰尼奇（Grace Granich）来到中国，在上海创办了英文杂志《中国呼声》（*The Voice of China*），并担



《中国呼声》杂志



1939年宋庆龄与《中国呼声》的编辑格雷斯·格兰尼奇（右）在香港

任编辑。《中国呼声》杂志团结了一些外国进步人士，揭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罪行，揭露旧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呼吁并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救国。当时，他们夫妇与宋庆龄、路易·艾黎等关系非常密切。格兰尼奇曾介绍不少青年学生去延安，斯诺、马海德去延安也都是受到他的支持和鼓励。日军侵略中国时，他们被迫离开中国去了美国。

1970年代，中美关系有所缓和以后，格兰尼奇夫妇多次访问中国。1971年秋天，格兰尼奇夫妇应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访华，宋庆龄在家中宴请他们。回国之后，他们多次作了关于新中国的演讲，告诉美国人民他们在阔别30多年的中国的所见所闻。

格兰尼奇夫妇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宋庆龄给我的信中是1972年3月，他们在演讲后回家的路上，遭遇了一场严重的事故。他们的车撞上了一辆卡车，格雷斯当场身亡，马克斯受了伤，正在医院治疗。宋庆龄称他们是“中国人民非常忠诚的朋友”（1972年3月29日）。由于他们是美国共产党员，所以宋庆龄怀疑这场车祸是故意制造的。不久，宋庆龄写了一篇题为《哀悼中国的又一位朋友》的文章，发表在《中国建设》杂志上，讲述格兰尼奇夫妇对中国人民正义事业的支持以及他们与中国人民的感情，深切怀念格雷斯·格兰尼奇。

格雷斯去世后，格兰尼奇和续弦伯莎（Bertha）几次访问中国，宋庆龄在给我的信中都有所提及。1975年4月，格兰尼奇与伯莎随一个医疗代表团到中国，宋庆龄在家中接待他们，路易·艾黎和马海德夫妇出席作陪。他们在一起共叙友情，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后还非常愉快地看了好几部电影。1979年9月，82岁的格兰尼奇率领美国友好访华团再次访问中国，宋庆龄在家中设宴款待他，并热情地称赞他是“中国人民忠诚的好朋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1月，格兰尼奇的85岁寿辰是在北京度过的。可惜宋庆龄荨麻疹发作，无法参加格兰尼奇的生日庆祝会，她特别委托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会会长



1979年9月宋庆龄
在寓所会见格兰尼奇
(右一)和夫人伯莎

王炳南代她主持生日宴会。宋庆龄虽然不能亲自参加，但她精心准备了一份热情洋溢的书面贺词，请王炳南在宴会上宣读。贺词称格兰尼奇为她的“挚友”，可见宋庆龄与格兰尼奇的深厚友情。

宋庆龄与美国杰出的耳外科医生萨缪尔·罗森和他的夫人海伦的联系，是在尼克松访华以后多起来的。罗森夫妇都是美国进步人士，他们与宋庆龄曾经并肩战斗过。在抗战期间，罗森夫妇曾响应宋庆龄的号召援助过中国人民。他们从白求恩大夫那里了解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缺医少药的艰难情况后，便四处募集医疗用品，由罗森夫人带到加拿大，再寄往香港，然后通过宋庆龄在香港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运往中国抗战前线，也因此与宋庆龄结下了长久的友谊。他们与宋庆龄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公正、和平、充满爱心的人类社会，争取世界和平，反对战争，与宋庆龄志同道合。然而在战争年代，他们无缘与宋庆龄见面，都是书信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更加向往中国，希

望亲眼看看这片神奇的土地。

直到 1970 年代初，中美关系有所缓和，罗森夫妇多年的夙愿才得以实现。1971 年 9 月，在儿童神经性耳聋方面颇有建树的罗森，与美国心脏病学家保罗·怀特（Paul Dudley White）、心脏病学家格雷·戴蒙德（E. Grey Dimond）以及各自的夫人应中华医学会邀请前来中国访问。罗森夫妇第一次踏上了中国这个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国度，由马海德、路易·艾黎陪同，到宋庆龄家里做客。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宋庆龄，夫妇二人欣喜不已。他们共同回忆往事，畅谈未来。此后，罗森夫妇多次访华，都去看望宋庆龄。不忘记老朋友给予的帮助是宋庆龄一贯的为人，因此，只要身体状况允许，宋庆龄总会邀请众好友，在家中设宴款待他们。老友重逢，格外亲切。

1973 年 12 月 12 日宋庆龄在北京寓所宴请罗森夫妇，路易·艾黎、马海德、米勒等出席作陪。宋庆龄在 1974 年 1 月 17 日的来信中说：“我非常喜欢罗森一家，希望他们能常来。”

罗森夫妇共九次访华，回美国后，到处奔波做访华报告，接待中国访美的代表团，组织美国医生和朋友访华，不遗余力地从事各种促进中美友好的活动。1978 年 12 月



1978 年宋庆龄会见罗森夫妇

16日，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告，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宋庆龄第二天晚上就发电报给罗森和夫人，向他们和美中友协表示热烈祝贺，他们30年的共同努力终于成为现实。

在罗森夫妇心目中，宋庆龄胸怀宽阔，学识渊博，对世界形势有着深刻了解，对美国人民也怀有极深的感情。他们敬佩宋庆龄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伟大精神。1981年宋庆龄逝世的消息传到纽约以后，罗森夫妇立即到花店去买了一盆百合花送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表达对这位伟大女性的深切怀念。

除此之外，曾在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任职的陆慕德（Maud Russell）和曾在宋庆龄领导的工合国际委员会任秘书的普艾达（Ida Pruitt）以及在中国担任过女校校长的韦尔西·费希尔（Welthy Fisher）夫人等几位美国友好人士纷纷前往中国访问。虽然宋庆龄晚年身体状况欠佳，但是她还是尽可能安排与老友会见，宋庆龄将1972年10月22日与陆慕德和普艾达的会面称为“老兵”聚会，称陆慕德和普艾达为两个“老中国通”。自然，在北京的老朋友路易·艾黎、马海德等都应邀出席。与老友的欢聚给宋庆龄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



1972年10月16日宋庆龄来信第三页



1972年10月22日宋庆龄会见并宴请陆慕德和普艾达，耿丽淑、路易·艾黎、马海德等出席作陪

23. 宋庆龄的未了心愿

在宋庆龄漫长的一生中，唯一受到她的信任，在她去世后为她写传记的人是爱泼斯坦，他为宋庆龄写的传记比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宋庆龄的生平。还有不少作家、新闻记者，包括宋庆龄的一些老朋友，在他们的书中也会有很多有关宋庆龄的描写，有些被宋庆龄所认可，有些则令宋庆龄十分不满并强烈反对。宋庆龄在晚年给我的信中，多次提到对有些著作中关于她的描述不甚满意。她在1972年8月9日的信中写道：

“索尔兹伯里的文章让我很烦恼，不喜欢他对我年龄的猜测。一个朋友指出他的错误的时候，他拒绝道歉，并归咎于他的秘书，说是秘书从经常忽略纠正事实的美国 Marquis ‘Who's who and why’ 名人录上了解的信息。时不时会有一些作家发表一些关于我的轰动新闻。最近，写过史迪威将军的芭芭拉·塔克曼写到蒋介石曾经‘通过中间人’向我求婚，但是被拒绝了。我们从没有这种事，更不要说我们政治上是对立的了，却还是有这样荒谬的说法！塔克曼访问过我，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看过她的书，不然一定让她立刻删除那些无理的不真实的言论。我不知



1972年7月宋庆龄在北京寓所会见美国女作家芭芭拉·塔克曼和她的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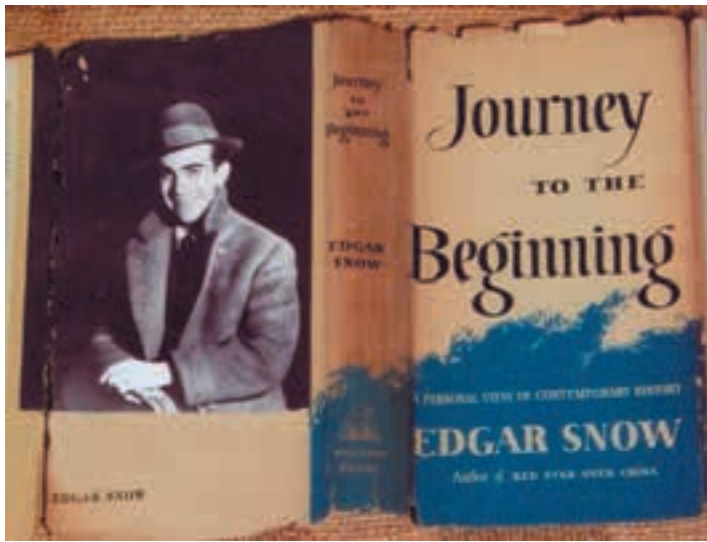
道你是否要在香港见她，如果见她，请提一下我读了那几个特别的段落后感到的很震惊，要求她立刻改正。因为她在旅行，我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联系到她。”

信中所提到的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vans Salisbury）是美国《纽约时报》的副主编，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以后，宋庆龄曾经在北京寓所设宴招待他和他的夫人，廖承志夫妇作陪。此后几次来华，索尔兹伯里和妻子夏洛特都是宋庆龄的座上客。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Tuchman）是美国著名女作家、历史学家，曾经以《八月炮火》与《史迪威在中国》两度获普利策奖。宋庆龄于1972年7月28日下午在北京寓所会见过芭芭拉·塔克曼和她的女儿阿尔玛·塔克曼（Alma Tuchman），并与她们友好谈话。但是当时，宋庆龄还没有看过塔克曼书中写的关于蒋介石曾经“通过中间人”向她求婚但被拒绝的内容，没能够当场提出来，因此在给我的信中提到此事。

关于蒋介石曾经“通过中间人”向宋庆龄求婚的说法，在很多外国作家的书中都能看到。施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所著的《宋家王朝》（*The Soong Dynasty*）第214页是这样写的：“孙中山逝世后，蒋迫不及待地想以某种方式同圣洁的孙博士以及同宋家的威望和财力建立关系”，“蒋派了一个中国传统媒人——显然是张静江——向失去丈夫的宋庆龄提出了一个求婚的建议”，

“宋庆龄在同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追述了蒋的求婚建议。斯诺简要地记述如下：‘在孙博士1925年去世后，蒋通过一个中国媒人向她求婚。她认为这是政治，不是爱情，于是断然拒绝。’”显然，关于蒋介石向宋庆龄求婚这一说来源于斯诺的作品，不过我当时并不知道，还是后来从宋庆龄的来信中，才知道是出自斯诺写的《复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斯诺的这本《复始之旅》最早由美国兰登出版公司于1958年出版，主要讲述的是斯诺的记者生涯，其中详细记述了他与宋庆龄、甘地和罗斯福等人的交往，并穿插了



埃德加·斯诺著《复始之旅》(1958年版)

一些回忆和思考。这本书出版以后反响很大，为斯诺赢得了很多的赞誉，以及“报道一贯准确的名声”。然而，宋庆龄在1959年读过此书以后，对书中关于她的一些描述非常不满，书中不仅有关于蒋介石向宋庆龄求婚的误述，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宋庆龄以及宋氏家庭的不切实际的描写。为此，宋庆龄在1959年给斯诺的前妻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老朋友詹姆斯·贝特兰、文森特·希恩的夫人黛安娜·福布斯-罗伯逊以及王安娜[Anneliese Martens(Anna Wang)]的信中都提出了对斯诺书中这些描写的质疑。斯诺曾于1960年8月写了一封信给宋庆龄，表明未经过宋庆龄的同意，是不应该发表这样的论述的。对于给宋庆龄造成的所有不愉快和不方便，斯诺表示了深深的歉意，并且希望能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弥补。



《复始之旅》(1972年版)

1970年，宋庆龄与斯诺夫妇久别重逢，这也是斯诺夫妇最后一次访华，宋庆龄几次邀请斯诺夫妇到家里喝茶或吃饭，艾黎、马海德应邀作陪。宋庆龄曾当面指出过《复始之旅》中的一些事实错误和一些她不能同意的看法。然而，直到1972年斯诺去世，这本书中关于宋庆龄的错误描写都还没有纠正过来。

斯诺去世以后，我和在瑞士读书的女儿邓勤与斯诺的

夫人洛伊斯·斯诺有一些往来，宋庆龄曾经希望我帮忙，与洛伊斯·斯诺联系，纠正书中的这些错误。1975年，宋庆龄连续数封信中都提到了这件事。在1975年2月18日的来信中，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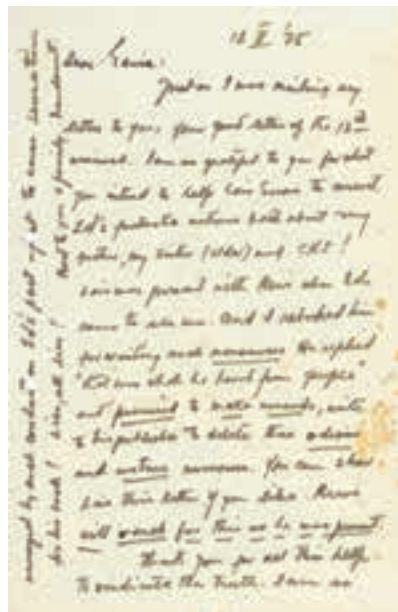
“你打算帮助洛伊斯·斯诺纠正斯诺书中关于我父亲、我姐姐以及蒋介石的荒唐说法，我非常感激！”

“斯诺来看我的时候洛伊斯跟艾黎都在场，我批评他乱写了。他回答说‘那是他从民众那里听来的’，并且承诺要做修改，并说要写信给出版商删除那些不实而可憎的谣言。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给洛伊斯看这封信。艾黎可以作证，因为他当时在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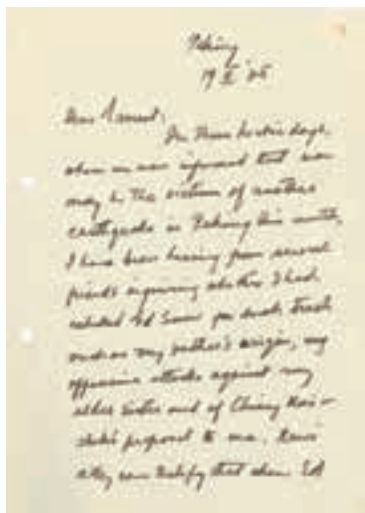
“非常感谢你帮助我维护事实。斯诺这么做就是为了给他的书制造轰动效应，这让我很恼火。谎言，都是谎言！”

第二天，宋庆龄又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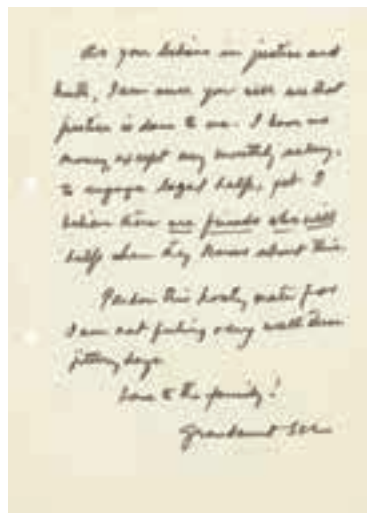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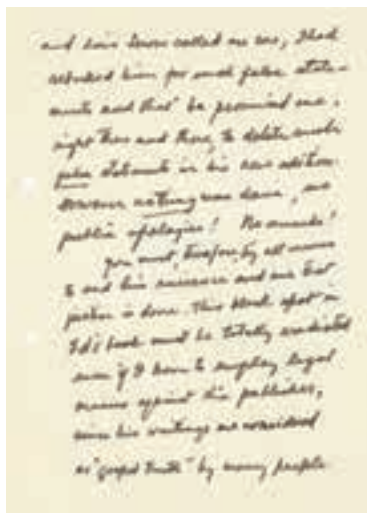
“我很多的朋友都来信询问我有没有谴责埃德加·斯诺关于我父亲的出身、我对我大姐的不敬之辞以及蒋介石向我求婚等这些无稽之谈。路易·艾黎可以证明，斯诺和夫人洛伊斯·斯诺来看望我的时候，我谴责过他的这些不实之辞，他当时在那里向我承诺在新版本中删除这些不实



1975年2月18日宋庆龄来信



1975年2月19日宋庆龄来信



之辞。但是他什么都没做！没有公开的道歉！没有改动！

“因此，你必须尽一切努力停止这些侵害，维护正义。斯诺书中的这个黑点必须彻底清除，即使是要对出版商采取法律手段也在所不惜，因为他写的东西被很多人奉为‘事实真理’。

“由于你相信公平和事实，我相信你会为我维护正义。除了每月的工资以外，我没有钱去寻求法律的帮助，但是我相信我的朋友们知道此事以后会帮我的。”

在之后的信中，宋庆龄提醒我在与洛伊斯·斯诺联系的时候要小心谨慎，太过高调处理只会让这本书更加得到宣传。宋庆龄还曾经通过廖承志，请外交部新闻司处理这件事情，要求将书中的这些内容删掉并写信给出版商澄清事实。她在7月30日和8月13日的信中将她认为书中本应该早已纠正过的一些错误描述一一记录下来，作为我与洛伊斯·斯诺联系纠正的依据。

1975年10月，我去夏威夷旅行回来，到北京去看望宋庆龄，适逢洛伊斯·斯诺到中国访问。宋庆龄身体不好，不能亲自与洛伊斯·斯诺见面，就请我做她的代表，并让艾黎和马海德协助我，证明当年斯诺亲口答应纠正这些错误。

然而，经与斯诺夫人多次接洽，斯诺夫人亲口告诉我她没有权利对这些内容做出修改，因为版权属于出版社。所以，直至宋庆龄去世，《复始之旅》中的那些令她不满的误述也没有被纠正过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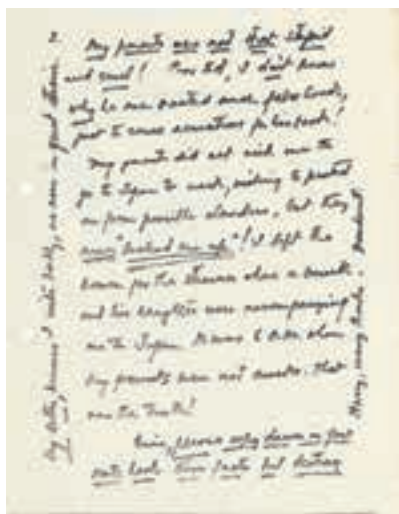
24. 为宋庆龄澄清历史事实

自《复始之旅》1958年问世以来，已经过了半个世纪，然而书中有关宋庆龄的错误描写，依然被很多作者在书中引用。宋庆龄一生坚持实事求是的写作原则，生前明确表示不希望这些内容以讹传讹地作为历史流传后世。而今，在她去世30年之后，我将她信中告诉我的这些误述以及她的反驳一一整理出来并公之于众，也算是完成她的心愿，还历史以真实的面目。主要有下面几点：

前文已经提到斯诺写蒋介石在孙中山去世以后通过一个中间人来向宋庆龄求婚：“她认为这是政治，不是爱情，拒绝了。”宋庆龄对这样的说法非常不满，事实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认为斯诺这么写的主要目的就是激起人们对这本书的兴趣。她说：“好像如果是‘爱情’的话，我就会接受他的求婚一样！这是对我多么卑鄙的论断啊！”从宋庆龄对蒋介石一贯的态度来看，宋庆龄的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是：“即使他是因为爱情而向我求婚，我也不会接受。”宋庆龄曾说过，自从认识孙博士的第一天起，她就一直忠实于他，在孙中山去世之后，依然忠实于他。而从宋庆龄关于芭芭拉·塔克曼的那封来信可知，从来没有蒋介石向她求婚这样的事。宋庆龄一生严谨，这样严重的错误，怎能被作为历史代代相传呢？

有关宋庆龄当年是如何离开家赴日本与孙中山结婚的问题，斯诺在书中是这样写的：“宋庆龄说：‘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我去日本，想把我锁在屋子里。我在女佣的帮助下从窗户里逃了出来。’”关于这一点，宋庆龄反驳说：

“这又是他自己虚构的想象！我的父亲是最早的同盟会成员之一，在我们家建了一个印刷厂印刷革命小册子，同时印基督教作品做掩护。我的父母也不是那么愚昧、残酷！可怜的斯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制造这样的谎言，就为了给他的书制造轰动效应。我的父母不希望我去日本工作，是怕我可能会受到流言的伤害。但是他们从没有‘把我锁



1975年8月13日宋庆龄来信第三页

起来’！我离开家乘轮船，在一个同志和他女儿的陪同下
去日本。那时是早晨6点我父母还没醒。那才是事实！”

众所周知，这里陪同宋庆龄去日本的是孙中山的秘书朱卓文和他的女儿，英文名字叫“慕菲雅”。后来，在很多关于宋庆龄的书籍上，都能看到的关于宋庆龄如何被父母锁起来，如何从家中爬窗出逃，赴日本与孙中山完婚的戏剧化过程，包括爱泼斯坦著、沈苏儒译的《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也有“卧室的门被反锁”这样的描述，大多来源于斯诺的这本书。这个说法已经成为关于宋庆龄的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如果不加以纠正，则依然会作为历史、作为宋庆龄的一个浪漫爱情故事中的情节代代相传，这当然是宋庆龄所不愿意看到的。

关于宋庆龄父亲的出身问题，斯诺在书中写宋庆龄说：“我的祖先是很穷的。我的亲戚从不说起，但是，我们的祖先是海南岛的客家人。几代以前，他们当中有些人移居大陆，来时身无分文只好当苦力。”而关于父亲宋耀如，宋庆龄自己的说法是：“祖先的老家是海南岛，那里的天气很温暖，还有一个长长的海滩，父亲的父母在海南岛文昌县五指山靠酿酒为生，祖上好几代都是酿酒的。”

据考证，宋庆龄祖先姓韩，海南文昌韩世家族据谱系记载是1197年从原住地河南安阳因避战乱南迁。宋庆龄知道自己的祖籍是海南文昌，但是祖上究竟是何方人氏，以何为生，也许宋庆龄本人也知之甚少。她的这个“祖先几代酿酒为生”的说法，可能是父亲告诉她的，也可能是她自己这么认为的，因为她的父亲留给她一些好酒，以前父亲在家里有一个酒窖。她还曾经将父亲留给她的一些酒送给包括我在内的友人。

关于孙中山是否希望举行基督教仪式的葬礼问题，斯诺在书中以对话形式写宋庆龄说“举行基督教葬礼是孙中山的愿望”。对于这一点，宋庆龄反驳说：“这不是事实。他在宗教信仰方面是比较淡漠的。其实是孔祥熙坚持这一点，因为他是葬礼的‘主持人’。他还跟我商量过孙博士

Dr. John Brown's memorandum in hi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840"

1. On page 47 John writes that though
his debt after Dr. Smith's judgment to me
though a middleman - "he thought it was
justice, not love, and declined" - ... the
of "some love", I'd have accepted him! What
a distinctly honest speech was! And
John was supposed to be writing that stuff!
(If you are from my friends! I mean
the one of my enemies!) John's own
paper was the one up instead of the
book!

2. Page 48 John declared that he
had done a similar deed. It is not
true. It was sufficient to ask from John
if it was who insisted upon this to be one
"matter of business" for the deed. Or

3. I am convinced in all that I have said, & my
old paper is true!

4. I am convinced in all that I have said, & my
old paper is true!

5. I am convinced in all that I have said, & my
old paper is true!

4. I am convinced in all that I have said, & my
old paper is true!

5. I am convinced in all that I have said, & my
old paper is true!

4. I am convinced in all that I have said, & my
old paper is true!

5. I am convinced in all that I have said, & my
old paper is true!

4. I am convinced in all that I have said, & my
old paper is true!

5. I am convinced in all that I have said, & my
old paper is true!

1975年7月30日宋庆龄来信中记录的《复始之旅》中的不当之处

喜欢什么样的圣歌，尽管这不是我的意思。”

就孙中山的宗教信仰和葬礼问题，宋庆龄在 1966 年 4 月 13 日致爱泼斯坦的一封信中也说孙中山“从来不信什么上帝，他也不相信传教士（他们不是‘伪善者’就是‘受了误导’）”，“曾经有过一种谣传，说孙中山在弥留时要求把他葬在一处基督教公墓并由基督教会主持葬礼。这完全是假的。孔祥熙和孙科听了许多朋友的话，曾坚持要在协和医院小教堂举行一次基督教追思礼拜，藉以证明孙中山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另据宋庆龄 1976 年 4 月给爱泼斯坦的一封短笺：“由于家庭中成员的坚持，确实在医院教堂里举行了一次礼拜，但其他的更大范围的悼念都是非宗教性的。”可见，斯诺书中所谓宋庆龄说孙中山要举行宗教葬礼的叙述不符合事实。

关于宋子文是否为宋庆龄筹划一小笔年金的问题，斯诺在书中写“蒋介石和共产党破裂后，宋子文动摇了，尔后支持了蒋介石，但他依然是宋庆龄在宋家的一位忠实的朋友。他为她策划了一小笔年金，偶尔也在政治上帮助她。”这一点宋庆龄也不同意。她在信中告诉我的是：“斯诺自己认为宋子文设法给了我一小笔钱作为生活之用。事实是孙博士死后，国民党知道他分文未留，送了 10000 元（广东币）给我做生活之用，后来还给了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同样多一笔钱。子文从来没有提出要给我钱，因为他知道我不会收他的或是我家任何一个成员的钱。我弟弟尊重我，尊重我的意愿，我动身去欧洲的时候，孙科给我一张支票，因为他说我来自国民党的收入不够我在国外生活，我立刻把支票还给了他，说：‘我过着跟那里所有的学生一样的生活（我在柏林图书馆读书）。’我住的是从房东那里租的有家具的房间，每天只花 50 芬尼（50 分）在一家中餐馆吃一餐，所有的食物也就是面包、茶和果酱，跟那里大多数的学生一样。”

斯诺在书中还写宋庆龄用极轻蔑但又钦佩的口吻对他讲了宋蔼龄在金钱交易上的手腕，是这么描述的：“蔼

龄聪明极了，她从不冒险，只有当她预先从财政部的同伙那里得到政府财政政策变动的情报后，她才决定买进或卖出。”宋庆龄对于斯诺这样的说法也很有意见，认为斯诺想象的东西太多了。她在给我的信中是这样驳斥这一点的：“关于所谓的我对我大姐的冒犯之辞，是斯诺自己告诉我说她是怎么利用内幕消息知悉何时买入，何时卖出股票，获得金融交易信息，通过投机生意赚钱的！我完全不懂金融方面的事！都是斯诺自己告诉我的！我到现在也不懂金融交易，我一直讨厌数学。我也从没有像斯诺说的那样叫我大姐的名字。‘姐姐’是我从儿时起到现在叫她的唯一称谓。斯诺做了太多的假想！”

此外，斯诺在书中所写的孙中山建议列强占领中国的说法，也是宋庆龄所不能同意的。斯诺写孙中山“建议英、法、美三国占领中国五年，消灭军阀，跟国民党合作，建立一个公正的政府，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使人民做好民主选举的准备”。作为孙中山理想的继承和捍卫者，宋庆龄明确地说：“孙博士从没提议让外国列强占领中国，而是主张帮助国家的发展。”

希望上述内容公布之后，那些曾经广为流传的误述能够得到纠正，也算是我在有生之年还能为宋庆龄做的一点事情吧。

25. 惊心动魄的 1976 年

1976 年，整个国家都笼罩在悲痛的阴霾之中，三位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无不令宋庆龄深感悲痛。

最先离世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因病于 1 月 8 日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宋庆龄悲痛不已，连连叹息“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在多年的革命工作以及几十年的日常交往中，宋庆龄与周恩来夫妇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文革”中周恩来给了宋庆龄很多关心和帮助。宋庆龄曾在信中告诉我“文革”中她父母的坟墓被红卫兵砸毁，是周恩来及时干预，将宋家的墓地修复。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周恩来在困难时刻为她做的事情，她非常感激。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周恩来夫妇对宋庆龄也非常关心，经常电话问候。周恩来去世以后，宋庆龄担任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委员，抱病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并且给了邓颖超亲切的慰问，请她节哀。

周恩来的逝世让全国上下都无比沉痛，宋庆龄形容



1976 年 1 月 15 日宋庆龄参加周恩来逝世追悼会并慰问邓颖超

说：“悲痛像戈壁滩上恐怖的风一样蔓延。”周恩来去世后，宋庆龄请人购买了很多周恩来的遗像，分赠给国内外的友人，表达对周恩来的悼念，我也收到了一张。宋庆龄在1976年1月20日的来信中写道：“我给你寄了一张我们最敬爱的总理的照片，他的不幸逝世让我们所有人产生巨大的悲痛。他最后的遗愿是将骨灰撒在长江和黄河以及祖国大地。沉痛的悼念活动规模宏大，场面混乱，以至于灵车用了四个小时才到达八宝山。但是没有人愿意将遗体火化，即使邓大姐劝说也无济于事。最后还是毛主席打电话来，告诉火化工总理自己的遗愿是被火化，所以他们最后执行了。”据我所知，除了我以外，宋庆龄的老朋友格兰尼奇也收到了周恩来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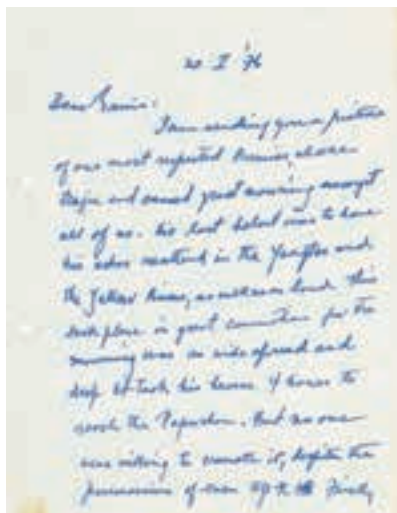
在同年11月给我女儿邓勤的信中，宋庆龄写道：“周恩来总理的逝世特别让人悲痛，因为他很亲切，而且在很多问题上都很体谅并能解决。他的妻子也是如此，是我的好朋友。为了中国革命，我们牺牲了太多的生命。”

周恩来逝世以后，宋庆龄情绪很低落，加上身体的原因，就打报告回了上海。那段时间，宋庆龄治疗很频繁，与我的通信间隔时间比以前长一点。据我所知，7月朱德在北京逝世，宋庆龄立刻乘专机前往北京，向朱德遗体告别，并担任朱德治丧委员会委员，参加朱德追悼会。她在给廖梦醒的信中多次表达了对朱德逝世的悲痛心情，感到“好像失去了一位敬爱的亲戚一样”！

9月9日，毛泽东逝世，宋庆龄又立刻飞赴北京，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在给我的信中，宋庆龄表达了对毛泽东逝世的悲痛心情，她写道：

“你要原谅我没能常常给你和你的家人写信。你一定知道这里发生的许多让人不愉快的事情。当然，我们早就知道毛主席将要离我们而去，对于他的逝世我们无力回天，但是这一事实真的确实发生的时候还是让人难以置信。我们有那么多的岁月在中国革命中是联系在一起的。

毛主席的一生实质上是这一伟大时代革命斗争的历史



1976年1月20日宋庆龄来信

长卷。正如他自己所说‘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实际上是他的墓志铭。现在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必须更加努力工作来巩固毛泽东思想。”

在宋庆龄心目中，九个月内中国“失去了很多有经验的同志，他们都是不可取代的”。在信中，宋庆龄说：“你可以想象我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参加三个领导人的葬礼，他们都是我个人非常好的朋友。”

1977年，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宋庆龄写了一篇

Shanghai
Nov 3, 1976

My dear Grace, you and pastime
you and being within your property
to you and family; you must know the
heavy painful events that have been
happening here. Of course, we had
known for a long time the imminent and
inevitable passing of Chairman Mao, but
the very fact of it becomes crushing and
unbearable. In most of our lives have
been bound up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ogether.

The age of Mao is an immense the
struggle of the revolution and the history
of this great period. He is kind and
the blessing of the people as he intended,
and that is really his epitaph. Now,
but we are ignorant of the fact that
we must go on, we must go on
and work with hands to build Mao
to long thought.

and our beloved Premier Zhou
De Lai's death is, to some of us,
more sorrowful, as he was chosen
by you know. They thought of
Chairman Mao just died after me

operation few days ago. He has been a true
father and teacher for them without
at all for over 20 years. Through him
we established the Sino-American friend-
ship which has become unbreakable
alliance (in 1972). He has been a great
help to us. Also, he was a personal
friend. He is the only one,
Boys will miss of his work.

Thank you, David for kindly
sending me this from them
how enough as please don't need
any to me unless I request you for

the revolution. I am very, very (Love in
feeling) and very, very up, friendly.

Therefore, you and I must
hold on, but be fully honest
of you and standing to the
revolution. As for you, this is
me to Shanghai after the
revolution. I have given back
again. He will be the one,
where authentic know me as
dependent upon help coming to
covering our side during the past
years. Love to the and family,
and family.

1976年11月3日宋庆龄来信

文章《怀念周恩来总理》，全面评价了周恩来的功绩。这篇文章发表在1977年4月的《中国建设》杂志上，文中写道：“周恩来毕生鞠躬尽瘁为人民。他的遗愿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气中，他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除了三位国家领导人以外，1976年宋庆龄还失去了好几位挚友。第一位是老朋友陈乙明。陈乙明1月16日还参加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为悼念周恩来举行的吊唁仪式，3月9日便在香港病逝。宋庆龄是3月10日晚上得知这个消息的。她非常难过，11日写信给我，托我向陈乙明的夫人转达她的关心和对逝者的哀悼。3月13日宋庆龄发唁电悼念陈乙明，电文登载在香港的报纸上，全文谓：

“惊悉陈乙明先生病逝深为悼念。陈乙明先生热爱祖国，对反帝爱国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对其不幸逝世谨致哀悼和慰问。”

陈乙明逝世的时候，宋庆龄的好友，远在美国檀香山的有吉幸治也病得很重。宋庆龄非常担心他随时都会离开人世，在给廖梦醒以及给我的信中都有提及。毛泽东去世不久，有吉幸治也不幸离开了人世。一年之内，失去了这么多好友，可想而知宋庆龄的心情是多么沉痛。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彻底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宋庆龄与全国的老百姓一样拍手称快。在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宋庆龄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不公开露面，也不公开发表讲话，与友人通信也只谈工作与生活，很少涉及时政。只有在与一些非常亲密的朋友的信中，才会谈一些心里的看法，但是多数是要求对方阅后销毁。“四人帮”被打倒以后，她给我的信中陆续谈及了关于江青和“四人帮”的话题，主要集中在1977年。

宋庆龄对江青的憎恶在她的信中一览无余。1977年4月，她给我寄来一份为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所写的文章《怀念周恩来总理》，在来信中，她说：

“随信寄去我为已故的总理写的纪念文章的中文翻



宋庆龄寄给我的文章《怀念周恩来总理》



罗克珊·维特克著《江青同志》(1977年版)

译。他是每个人的朋友。江青恨他，因为他总是批评她那些不光彩的行为。我想你一定读过维特克关于她的书。如果没有，我会给你寄一些关于她和‘四人帮’的材料。”(1977年4月1日)

宋庆龄信中说的这本关于江青的书是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写的。1972年维特克来中国访问，先后在北京和广州长时间采访江青。维特克将江青的谈话整理后出版为《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当时宋庆龄手头有一本，她刚读完，建议我也看一看。那时这本书在香港很难找到，所以宋庆龄在后来的信中，几次提到将她的那本寄给我看。直到2006年，这本书的中文译本《红都女皇——江青同志》才在香港正式出版。

也就在1977年的4月底，宋庆龄的老朋友凯瑟克爵士夫妇路过上海，到宋庆龄家中看望她。凯瑟克夫妇问了很多与江青有关的问题，不过宋庆龄并没有说很多，因为她不想在国外的媒体上被引用，而是建议他们也读一下维特克的这本书。而在给我的信中，宋庆龄则明确地表达了她对江青的厌恶。她说：

“如果你还没有这本书，我会把我的这本给你，因为我刚刚看完。无论如何，还是有很多第一手关于她的讨厌的故事。”(1977年5月8日)

“顺便再说，凯瑟克夫人告诉我香港只有一本《江青》，他们设法弄到了。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这本书，请马上告诉我，我会给你寄一本。对我而言，女作家和她的‘女英雄’除了狂妄自大外一无是处。”(1977年6月24日)

“下次你来的时候，我想带你去北海公园，江青那个恶魔般的女人之前把它关闭了，她想把公园变成她的私人跑马场！”(1978年3月23日)

据我所知，宋庆龄将这本书也借给廖梦醒看了。宋庆龄平时性格温和，少有尖刻的言辞，但此时她在给廖梦醒的信中称江青是“可怕的毒蛇”、“妄想自大狂”、“卑劣阴

险”。从这些激烈的言辞，我们不难看出宋庆龄对江青的厌恶到了极点。

“四人帮”轰然倒台后，全国人们奔走相告，纷纷买酒庆祝。金秋10月，正是螃蟹肥美的季节，于是人们纷纷买蟹吃蟹，而且必定是“一母三公”，以泄对“四人帮”的怨气。宋庆龄是出了名的喜欢吃螃蟹，因为无法抗拒螃蟹的美味，常常是先吃抗过敏药再吃螃蟹。“四人帮”倒台后，宋庆龄与全国人民一样，吃螃蟹庆祝，而且多次以“一母三公”比喻“四人帮”，以“横行夫人”比喻江青。她在当年给我的信中寄来她抄写的几段打油诗，其中也有一首借螃蟹“一母三公”比喻“四人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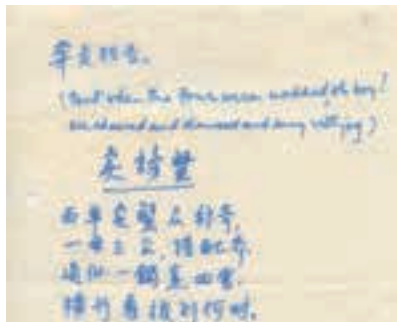
卖螃蟹

西单卖蟹众称奇，
一母三公搭配齐。
道似一锅烹四害，
横行看彼到何时。

欢呼清除四人帮

城狐社鼠为朋党，
一鼓擒之净庙堂。
十载阴谋终一梦，
臭名世界远传扬。

宋庆龄还热情解释了最后一首诗的意思：“四人帮就是恶毒的狐鼠之徒。但是我们重拳猛击清除了他们。他们计划了十年的野心、他们的丑行现在已经众人皆知。”可见她对于横行十年的“四人帮”的憎恨以及对粉碎“四人帮”的狂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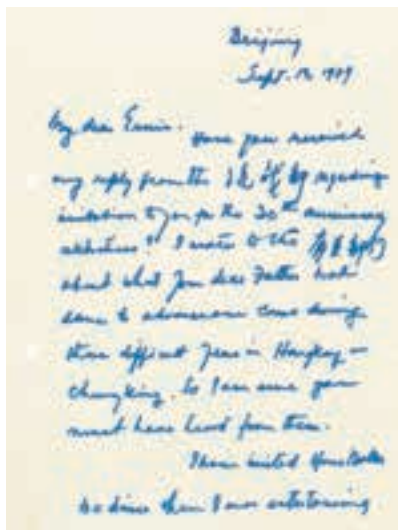
1977年6月26日宋庆龄来信中抄录的打油诗

26. 宋庆龄亲自过问的一份邀请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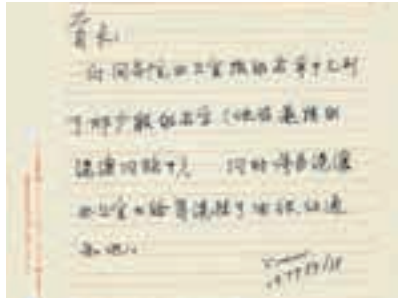
在我与宋庆龄的十年交往中，我感触很深的一点是宋庆龄从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为保卫中国同盟、为国家所做的贡献，遇到重大的庆祝活动，总会想到我父亲，也希望我能邀请我参加这些活动。1978年6月是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宋庆龄早在1977年4月15日的来信中就说：

“明年将会是中福会40周年，你亲爱的父亲曾经帮忙担任过‘财政委员长’，所以你必须来参加这次庆典。我设法将活动安排在北京举行，这样你可以带些朋友来。”可惜1978年的时候我没能去北京参加宋庆龄于6月14日举行的自助餐会。而1979年宋庆龄为了邀请我参加新中国成立30周年庆典，多次与有关部门联系的事情，也是让我至今想起来仍然十分感动的记忆。

在新中国成立30周年之际，宋庆龄希望能邀请我参加国庆周年庆典。最初中侨委邀请的港澳观光团名单中并没有我的名字，宋庆龄特地让秘书打电话给侨务港澳办公室，告知他们我父亲当年为革命做的贡献以及希望邀请我参加的意见。1979年9月4日，宋庆龄来信中说：“我立即叫秘书联系了有关部门，说我建议邀请你作为政府的客人来参加我们建国30周年庆典，因为你父亲为八路军做了那么多事情，他不仅贡献了很多，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担任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司库。我希望很快会有个结果。随信寄上他们的第一个回复。”为了这件事，宋庆龄还特别给有关部门写了信。1979年9月13日，她来信询问我是否收到了统战部邀请我参加庆典的回复。9月18日，她再次来信告诉我说：“我再次得到确切的消息，让你参加周年庆典的邀请函已经寄给你了。我们碰面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已经到了。所以我希望尽快听到你的声音。顺祝一切都好。”也就在当天，我回复她13日的来信，告诉她我还没有收到邀请函。21日她收到我的信后立刻向统战部的朋友询问此事，同时让秘书张



1979年9月13日宋庆龄来信第一页



1979年9月18日宋庆龄来信及秘书张珏给宋庆龄的便条

珏给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打电话询问。确定给我的邀请函一定会有之后，她又立刻写信告诉我，并让我不要着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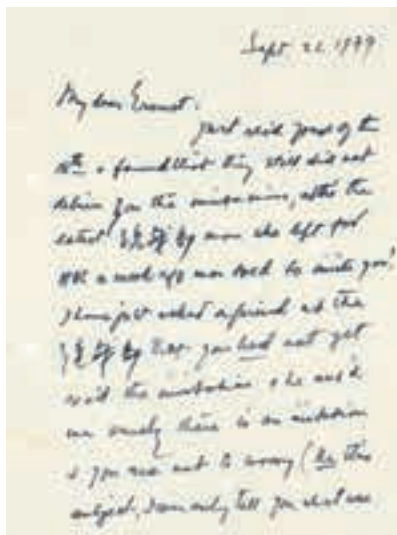
在宋庆龄的亲自过问之下，不久我收到了邀请函，动身前往北京。30日晚上，我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庆建国30周年盛大国庆招待会。宴会由华国锋主持，宴会厅主席台上并排悬挂着毛泽东和华国锋的巨幅画像，画像两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出席宴会的国家领导人 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宋庆龄等，还有4000名全国各族各界人士和来自五大洲的外国朋友。

9月30日晚上，宋庆龄派秘书杜述周到我下榻的友谊宾馆，给我送来一封信。宋庆龄在信中感谢我和母亲给她准备的精美食物，作为回报，她送了一些水果给我和母亲。

10月4日晚，我应邀来到了宋庆龄家中吃晚饭，那天应邀出席的还有爱泼斯坦夫妇、汉斯·鲍尔、路易·艾黎、米勒夫妇、马海德夫妇和儿子周幼马等。

因为一封邀请函，宋庆龄亲自过问了那么多次，足见她对这件事情的重视，也表明她从来没有忘记过我父亲曾经为国家、为革命所做的贡献以及我所做的一切。也许，这也是她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是她高尚人格魅力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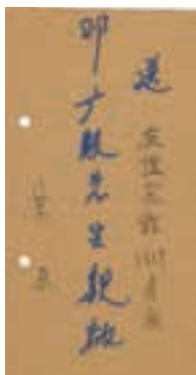
这些难忘的情景，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中，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仍能感受到宋庆龄亲切的笑容，仿佛就在昨天。



1979年9月21日宋庆龄来信第一页



1979年9月30日宋庆龄给我的便条



1979年9月30日宋庆龄来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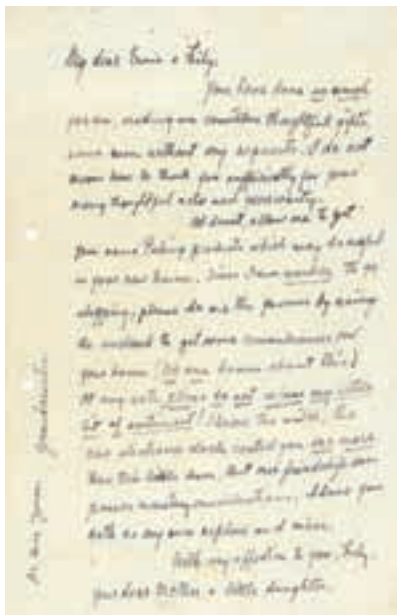
27. 宋庆龄的感谢与回报

虽然十年来，我为宋庆龄提供了不计其数的日常用品和办公用品，但我要强调的是，这种付出并不是单方面的。宋庆龄从不会忘记别人给过她的帮助，她会真诚地向每一位帮助过她、为她做过事，哪怕是很小的事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谢。对于我们一家，宋庆龄无数次在信中表达对我们的关心和谢意。当年，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宋庆龄就视他如同子侄，亲切地称他为“BB”。父亲去世后，宋庆龄也视我们一家为家人，每次来信，都会对我母亲、我和夫人以及我的女儿邓勤表示问候。她在信中称我为“my dear grandnephew”（亲爱的侄孙）。她在1973年6月19日的信中写道：“真不知道如何感谢你，你想得那么周到。你们真是我唯一的家人！”她还在“我唯一的家人”下面划线以示强调。在1975年7月23日给我的信中，宋庆龄写道：“深切感谢你、君莲、勤勤和你母亲以及这里所有你的家人。”

1972年初，宋庆龄写信托我帮她买一块手表，之后宋庆龄连续几封信中都要求我将手表的人民币价格告诉她。她告诉我说，坚持要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她和其他老太太一样迷信，认为送钟和手表不吉利，而是因为这是她的原则。对于我经常为她送去各种生活日用品，她已经非常感激，不能再收下如此贵重的礼物。所以尽管我一再推托，她依然坚持等我下次去的时候再解决这个“良心问题”。

1972年香港遭遇暴雨，宋庆龄对我和家人非常挂念。得知我们都很安全后，她很欣慰，并一再表示在安置新家过程中如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她。8月间，宋庆龄给我们夫妇寄来一封信，里面还有一些钱，她让我用信封里的钱给新家添置点东西。她在信中说：

“亲爱的广殷和君莲，你们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周到地给我送了数不清的礼物，有些我甚至没有要求过，真是太体贴周到了。我都不知道如何才能向你们的体贴细心



1972年8月宋庆龄的来信

和慷慨表示感谢。

“至少让我送一点北京的东西给你们，或许在你们的新家有用。因我不能外出购物，所以请用信封里的钱给你们的家买一些纪念品（没有人知道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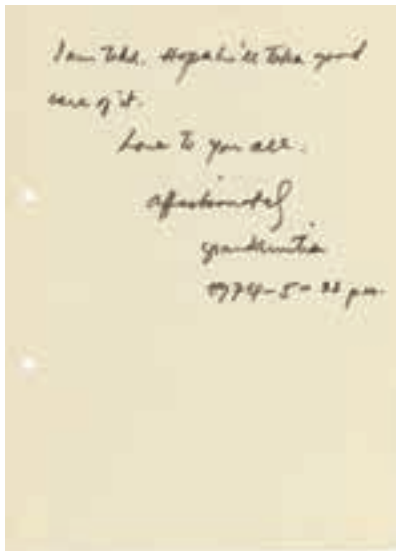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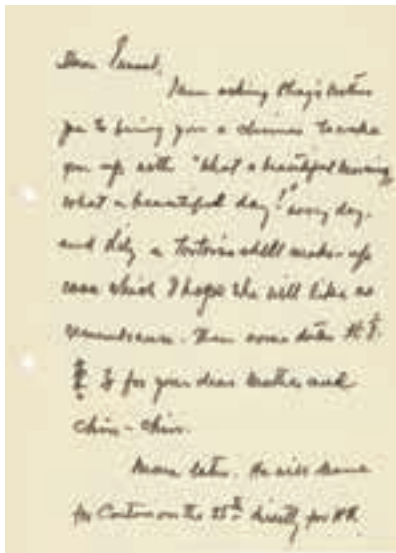
“请无论如何不要拒绝我这一点小小心意！我知道你们在那块手表、那个新电子钟上花费的远不止这一点。但我们的友谊是不能用金钱来考量的。我爱你们如我的侄子和侄女。”

1973年11月，宋庆龄的一位美国朋友，“二战”时期美国新闻处在中国的负责人艾米·谢菲尔（Amy Schaeffer）到中国访问并看望宋庆龄。艾米·谢菲尔12月8日动身回国以前，宋庆龄托她带了两件女士冬天穿的居家睡袍到香港，一件给陈乙明的妻子，另外一件给我母亲。1974年，马海德的弟弟乔去北京，离开时要经过香港，宋庆龄便托他带东西给我。她在5月22日的来信中说：“我让马海德的弟弟乔给你带个自鸣钟去，每天早上用‘多么美丽的早晨，多么美丽的一天’来叫醒你，给君莲一个玳瑁化妆盒，希望她喜欢。还有一些北京枣子给你母亲和勤勤。”

1975年，宋庆龄托华侨银行的陈志昆（孙科夫人陈淑英的堂弟）带给我一瓶家传的酒。宋庆龄曾经在信中说自己的祖上是以酿酒为生的。她在1975年3月11日来信中说：

“听说华侨银行的陈志昆和一些美国银行家一行在这里。他从上海回来的时候，我会要求他转交一瓶佳酿给你，另外一瓶给乙明叔叔，是我父亲留给我的，他以前在上海为自己和家人保存了一个酒窖。他的父母在海南岛文昌县五指山靠酿酒为生。”

1979年初，宋庆龄因为经济拮据回上海变卖一些东西，其中包括她母亲留给她的皮草和父亲留给她的酒。她特地留了几瓶送给我和其他一些朋友。因为她的一位朋友林国材要去见她，所以她托林国材将酒带给我。宋庆龄在



1974年5月22日宋庆龄来信

1979年2月3日信中说：

“我让林国材先生带给你两瓶我从我父亲那继承的白兰地葡萄酒和威士忌。请你自己享用，不要给别人，因为这是很稀有的酒。我还送了一瓶给李医生（你的医生），因为他和他亲爱的妻子给我送来了很多我在这里没法获得的有用的东西。”

1980年，宋庆龄托阿霞给我带来钢笔，还送给我女儿邓勤一副家传的中式金耳环。她在信中说：

“那是我母亲给我的，我从来没有戴过，因为我的工作不允许我戴首饰。这是送给勤勤作为留念的，我希望她尽快从病中康复。”（1980年2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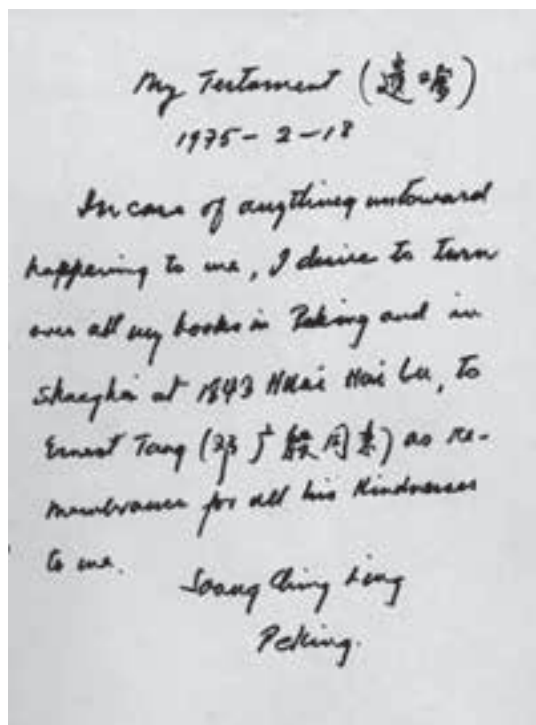
这就是宋庆龄的一贯风格，对于帮助过她的人，总是不会忘记的，也会尽自己所能加以回报。

最让我感动的是宋庆龄单独写给我的一份遗嘱。1975年2月18日，宋庆龄从北京给我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信中说：“亲爱的广殷，我匆匆写这几行字是要告诉你，我们接到通知，从现在到这个月底有一次六级左右的地震，

11.2.75
Dear Guangyin,
I am hastening a few lines
to let you know that we have been
informed that there will be an earthquake
of 6 degrees, center in Beijing, between one
and two of the month! Everyone is in
further, as you can well imagine, some
Shanghai friends expect me to return to
my home there but that would create
more trouble amongst the people here,
as I shall remain, come what may.
I have written my testament already
but I don't want to write a separate one

for you to keep.
I heard from Chia-chia that
she has passed her exams and is very
happy now, and intends to visit
Zou-ai during her mid-term examina-
tion.
I hope this will find you and
family in best of health and that
the weather has been improved.
With love to your dear family.
Affectionately,
Grandmother.

1975年2月18日宋庆龄来信



1975年2月18日宋庆龄单独写给我的遗嘱

中心在北京。你可以想象得出，每个人都很紧张。一些上海的朋友催我回上海的家，但是那样会在这里的人民中间引起更大的恐慌，所以我还是留在这里，不管会发生什么。我已经写好了遗嘱，但是我想单独写一张由你保管……”

随信附了一份遗嘱，用英文写成，翻译成中文如下：

遗嘱

1975年2月18日

如果我有不测发生，我愿将我北京和上海淮海路1843号家中的所有书籍赠予邓广殷同志，以答谢他对我善意。

宋庆龄

北京

其实早在1974年8月22日的信中，宋庆龄就提到了“遗嘱”的事情，她说：“我正在接受密集的治疗。专家们已经竭尽所能，我很快就会恢复正常。你想象一下每天

早上三个小时接受透热治疗、按摩、注射，还有膝部关节炎针灸！希望不要再有什么反常出现。不管怎样，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遗嘱’，你将获得我赠送的藏书，因为有些是绝版的经典名著，我认为你会尤其珍爱，而且你跟我一样喜欢读书，对书的珍惜超过其他东西。”

想来，宋庆龄知道我和我的父亲一样喜欢读书。当年我的父亲唯一的嗜好就是看书。他最喜欢读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方面的新书。抗战胜利后，他与在美国的老朋友爱泼斯坦恢复联系，首先也是请求爱泼斯坦从美国“多寄一些全世界的好书”给他，几封信里他都提到“盼望你能寄些书籍给我，因为我渴望读到英文书”。他的这一嗜好，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广州定居期间受到了很大限制，那时很难看到各国新出版的英文书。“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更不用说了。

之后，在1974年12月4日的来信中，宋庆龄再次提到了这些藏书，她说：“广殷，我的书还没有多到需要图书管理员。因为故居由政府接管作为一个纪念馆，所以故居的书属于政府所有。我在这里的书还有在上海淮海路1843号家里的书，约有几百本，可以打包装到木箱子里运给你。没有人可以阻止这件事，因为这些书是我读书以来保存的，包括当代和古典名著。或者你把它们保存在这里也可以。”

但是当我真正收到宋庆龄1975年2月18日的来信和单独给我的遗嘱时，我很震惊，也非常感动，原因有二：其一是她将私人财产中最珍贵的部分遗赠给我，表明她将我视为她最信任和亲近的人，也表明她从未忘记我的父亲和我为她所做的一切，也希望以她的方式作为回报。其二是她面对北京地震传言所表现出来的与人民同在的决心与镇定。

1975年春天，北京被地震的传言包围着，因为2月4日的时候，辽宁省海城、营口市附近发生7.3级大地震。当时由于预报及时，地方政府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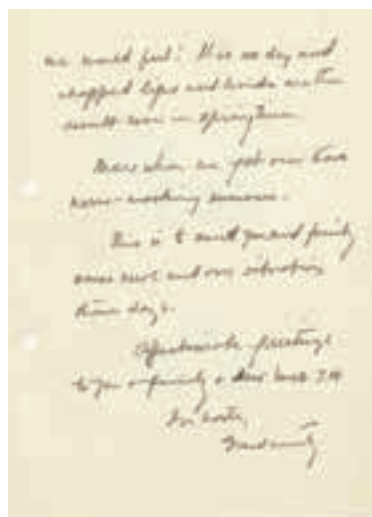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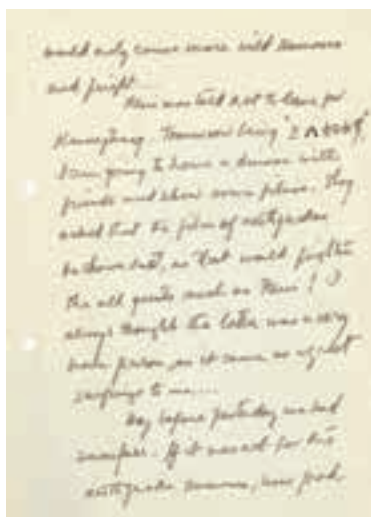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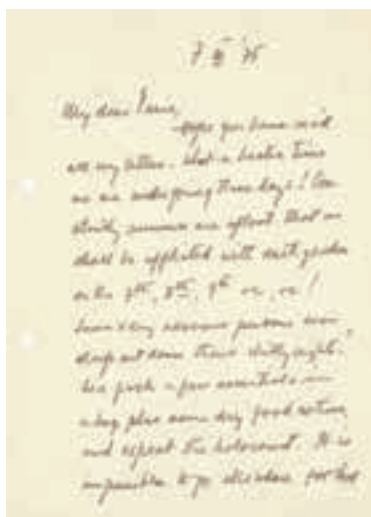
大减少了人员伤亡。宋庆龄在2月26日给我女儿邓勤的信中说：

“我们中的一些人很紧张，因为有传言说北京这几天可能会有地震。我想你一定已经看到了最近辽宁省和周边地区地震，造成了可怕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的消息。不过我们的政府立刻采取措施，派遣了医疗队等救助那里的难民。他们乘飞机过去，两个小时不到救护队就在营口和其他几个地方登陆了。

“艾黎叔叔开玩笑告诉我说他准备了一个帐篷，好给我们遮风避雨，我回答说我们的房子已经准备好接纳难民，他应该带毯子来，因为我们没有。一些朋友劝我回上海，那里更安全。但那样会造成很坏的影响，所以我打算坚守在这里，不管出现什么情况。”

宋庆龄还告诉邓勤，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地震，她打了一个包，装了些饼干，还有些必要时可以解渴的水果，因为“口渴比饥饿更难耐”。

其间，我也陆续收到宋庆龄关于地震的来信。1975年3月7日信中说：“亲爱的广殷，希望你收到了所有的信，我们这些天经历的日子是多么忙乱啊！经常有谣言说



1975年3月7日宋庆龄来信

7号、8号、9号要有地震，等等！一些精神紧张的人甚至在这么冷的晚上睡在户外！我们把一些要紧的东西打在一个包里，再加上一些干粮储备，就在等待着大毁灭的到来。不可能到别的地方去，那样只会造成更多的谣言和恐慌……”3月18日信中说：“我们8号确实经历了四级震动，幸运的是那时我们正在家里看电影，非常投入，有趣的优美的音乐伴随着故事情节，我们都没有感到害怕，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地震！幸运的是我‘按兵不动’，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召开一系列的重要会议，这封信寄到你处之前你就已能读到相关报道了。”这里提到的重要会议指的是宋庆龄3月18日出席的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特赦全部的在押战争罪犯。

从这些信中，我看到的是宋庆龄在危难将至的紧急时刻表现出的勇敢与从容以及始终与人民和老百姓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面对即将发生的灾难，宋庆龄选择了与人民同在，明知危险，却临危不惧，泰然安排后事，显示了她一切以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为重的胸怀，也体现了她沉着坚定的意志。这一点令我十分钦佩，难以忘怀。这也是在多年的革命工作中她的一贯作风，是她一生具有的伟大人物的高贵品德。

收到宋庆龄寄给我的遗嘱后，我认为事关重大，决定秘不示人，妥善保管。那时，我的女儿邓勤在瑞士洛桑读书，我正准备前往探望。于是，我立即携带遗嘱前往瑞士，将其存入了银行的保险箱中。

28. 宋庆龄像一位慈祥的祖母

在宋庆龄的晚年生活中，有两个女孩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那就是与宋庆龄一起生活过多年的隋永清、隋永洁姐妹俩。宋庆龄像一位慈祥的祖母，在这两姐妹身上倾注了无尽的爱。两姐妹与宋庆龄的感情也是无法抹煞的。

这两个女孩是宋庆龄的警卫秘书隋学芳的女儿。隋学芳是东北人，1950年代初来到宋庆龄身边做警卫工作。为了工作方便，他结婚后的家就安在宋庆龄上海寓所的附楼上。永清是隋学芳的大女儿，生于1957年，宋庆龄非常喜欢这个小女孩，常常让隋学芳将她带过来玩，后来就将她接到身边照顾。隋学芳中风瘫痪后，家中子女多，宋庆龄又将他的二女儿永洁也接过来照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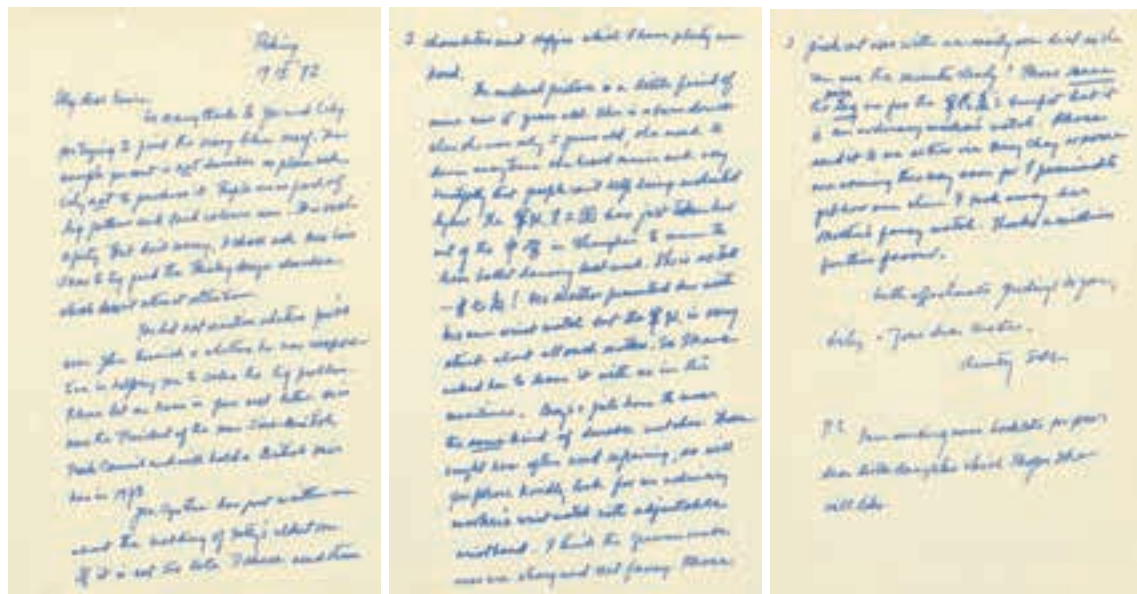
姐妹俩称呼宋庆龄为“妈妈太太”。2011年我在上海见到了多年未见的永清，她告诉我关于这个称呼的由来，也是个有趣的故事。原来当时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称宋庆龄为“首长”或“夫人”、“太太”，刚学说话的永清也学着身边工作人员叫宋庆龄“太太”，宋庆龄觉得不好。宋庆龄年长姐妹俩60多岁，按辈份是祖母的年纪了，但是她又不喜欢那些听着显老的称谓，因此，姐妹俩如何称呼宋庆龄成了问题。上海寓所的餐厅里有一幅宋庆龄母亲倪太夫人的油画像，永清知道这是宋庆龄的妈妈。有一天，保姆李燕娥逗永清玩，指着墙上的画像问这是谁。永清本想说是“太太的妈妈”，由于年纪小，一着急就说成了“妈妈太太”。宋庆龄觉得这个称呼很有意思，便让永清以后就叫她“妈妈太太”。从此，永清和永洁一直称呼宋庆龄为“妈妈太太”。

我与宋庆龄开始通信往来时，这两个女孩已经十几岁了，深得宋庆龄喜爱。宋庆龄称她们为“my 2 young Protégées”，意思是“我照顾的两个女孩”，宋庆龄给她们姐妹俩分别起了英文名字，永清叫Yolanda，永洁叫Jeanette。宋庆龄在许多来信中都会提到她们，生活中发

生了什么事情，学习上有了些什么进步。她们姐妹俩无疑给宋庆龄的晚年生活增添了许多欢乐。

宋庆龄时刻关心着两个女孩的成长，尽量满足两个女孩生活中的需求。有时宋庆龄也会托我或其他朋友为她们买一些内地比较难买到的东西。1972年4月19日，宋庆龄来信托我帮她买一块手表，最好是德国造的普通工人手表，因为德国制造的很结实，也不花哨，还特别在信中说明要挑一款刻度盘比较容易看清楚。她在信中说手表是给一个15岁小姑娘的，在北京学芭蕾，还附上了一张照片。宋庆龄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个女孩的喜爱，她是这样写的：“随信附上的照片是我的一个小朋友，今年15岁。她天生是个舞蹈者。她只有5岁的时候，经常一听到音乐就翩翩起舞，跳得很美，人们不禁都被她吸引了。上周部队文工团把她从上海的中学要过来学芭蕾。她很高，有一米七。”信中的这个小姑娘就是永清，刚刚被北京总政文工团招收为文艺兵，4月14日刚到北京。

1974年秋天，永清被八一电影制片厂看中，要录用她赴海南拍一部反映“女民兵”的电影。对于永清要加入



1972年4月19日宋庆龄来信

电影公司，宋庆龄并不赞成。她希望永清能集中精力进行政治和英语的学习。她也反对永清再跳芭蕾，因为永清曾经在练习的时候不慎摔倒，伤及一侧膝盖而不得不接受手术。在宋庆龄看来，舞蹈演员的生涯太短暂了，没有几个人能像英国著名芭蕾舞演员玛歌·芳婷（Margot Fonteyn）那样创造奇迹。尽管如此，宋庆龄最终还是同意了。因为永清要在海南拍戏待上半年，所以宋庆龄又请我帮忙给她买一块适合户外佩戴的手表。

宋庆龄对两个女孩的关爱还体现在对她们的包容。1974年6月23日，宋庆龄在寓所正要走出房门，永清突然推门进来，宋庆龄吓了一跳，因而摔了一跤。但是，出于对永清的爱护，宋庆龄不让保姆请医生，也不让告诉秘书，怕永清为此受到责难。一直到第二天，宋庆龄才去北京医院检查。医生检查后诊断为尾骨挫伤，有水肿，幸好没有骨折，建议药物按摩。北京医院觉得宋庆龄摔跤事关重大，便将此事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为此，副总理李先念特别指示宋庆龄寓所的工作人员，吸取教训，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宋庆龄听说以后，特别嘱咐秘书杜述周，请他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解释不是因为任何人的粗心使她摔倒的。她说：“这只是个异常的偶然事件，没有人能够掌控的，我怎么知道永清要进来？或者她怎么知道我要出去呢？请早一点送达，我的摔跤不要责备任何人。”不仅如此，宋庆龄在给廖梦醒的信中提到摔跤一事的时候甚至都没有说是因为永清突然进来导致的，而是说：“上星期日晚上我正要开门到走廊里去的时候，突然有人开门进来，一股气流把我吹倒在地！幸亏没伤及骨头，但我的腰背痛得更厉害了，一个肩膀摔得青肿。医生每天上午在给我治疗，所以不要为我担心。”宋庆龄一点都没有责怪永清的意思，可见，她对永清的疼爱和宽容。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两个女孩没有机会好好读书，这也是让宋庆龄觉得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她安排15岁的永洁在北京301医院图书馆工作，准备接受全

面培训成为一名医生。1974年11月，永清要去海南拍戏，永洁要跟301医院的干部到山区拉练，要在那里帮农民干活，跟他们一起生活几个星期。宋庆龄在1974年11月1日的来信中难掩对两个女孩的牵挂，她写道：“天气那么冷，希望她们不要生病了。”

由于永洁在301医院图书馆学习非常辛苦，每天要抄写书目，眼睛很疲劳，宋庆龄很心疼她，便萌生了送她去外国语学校学习的打算。1975年宋庆龄请廖承志帮忙，想办法让隋永洁去外语学校读书，但是廖承志对此也无能为力。宋庆龄在信中让我转告廖承志她完全理解，并对廖承志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此外，宋庆龄在工作之余，也会自己为永洁辅导英文，希望将来她成为有用之才。

宋庆龄晚年生活孤寂，两个女孩给她的生活带来了生气和欢乐。然而由于永清进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永洁在部队图书馆，只有周六晚上回来，所以宋庆龄与两姐妹只有周日和周一早晨能在一起吃早餐。尽管相聚时间不长，但对宋庆龄来说也是很快乐的时光。两个姑娘就跟平常人家的孩子一样，星期一一早在7点之前出门坐地安门的公交车，8点到达各自的目的地，中间要换三次车。宋庆龄北京的寓所，周围环境比较安静，两个姑娘周六晚上很晚才回来，宋庆龄对此很不放心。她在1975年4月28日的来信中说：“我们住的地区很安静，有很多流氓和小阿飞出没，不愉快的事情时有发生。两个姑娘住得很远，所以她们周六很晚才到，因此我叫一个朋友带了两个警察用的哨子给她们！”字里行间流露着对两个姑娘的关心。

宋庆龄对这两个女孩也非常信任，她们可以自由进出宋庆龄的房间。宋庆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也会交给两个姑娘去办。宋庆龄曾经在信中说：“如果你有什么重要的消息给我，请用英文写下来，让永清和永洁等我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给我。”（1975年7月22日）

宋庆龄在家中宴请客人，几乎都少不了两个女孩的身影。有朋友到北京，宋庆龄常常安排永清陪他们去观光。

1978年7月，外交家伍廷芳的孙子伍竞仁和夫人伍郑镜宇到北京看望宋庆龄。他们在北京待了一个多星期，观光之余也收集一些有名的菜谱，以便在他们开的中国餐馆推出。他们不会讲普通话，宋庆龄便让永清陪着他们，做他们的翻译。

1978年底，宋庆龄最后一次回到上海。关于最后一次回上海的原因，她在给一些朋友的信中提到要整理一些重要资料和信函。而她在1979年1月25日给我写了一封带有“绝密”字样的信。她写道：

“现在，我必须跟你坦白我在这个节骨眼上回上海的原因。我500块的薪水不足以支付家庭开销，我得给永清和永洁提供吃的、穿的，她们的父亲瘫痪躺在医院15年多了，她们的母亲是公安局的一名小干部，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养，一个16岁的女孩和一个15岁的男孩。现在永清和永洁长大了，她们要穿好看的衣服，和她们学校的同学一样。所以我得给她们买衣服等等——尽管一些美国的朋友有时候会给她们寄点衣服，还给她们每人买一辆自行车和鞋子等。虽然有这些朋友善意的帮助，我还是入不敷出。所以我必须得回家来，卖掉一些我母亲留给我的皮草大衣，甚至包括从我父亲那继承过来的一些酒。”



1977年于北京。
左起：经普椿、
廖承志、廖梦醒、
邓广殷、邓勤、
宋庆龄、隋永洁



宋庆龄与隋永清（左）、隋永洁摄于1978年

这里我也看到了宋庆龄对两个女孩的爱，为了满足孩子们的需求，为了让孩子们生活得更开心更幸福，不惜变卖母亲留给她的物品。80多岁高龄的宋庆龄，虽然身居高位，为了负担两个女孩子的生活，却还要为经济方面的事情烦心。而且宋庆龄一向公私分明，性格坚强，不愿意要求国家补助，更不愿祈求别人的帮助，她在信中说：“卖掉上面说到的这些东西，我想我应该可以偿还一些相关的债务了。我不想乞求别人的帮助，我要自己解决问题。幸运的是，红卫兵没有冲击我家，因为总理命令他们不许碰我的东西。”

宋庆龄与我通信的后几年中，似乎提到永洁更多一些，夸她是个“值得信赖又聪明伶俐的姑娘”。永洁的聪明伶俐深得宋庆龄喜爱。宋庆龄晚年出席一些活动，很多时候都是永洁陪同，并搀扶着她。宋庆龄曾在信中给我讲过一个有关永洁聪明机灵的例子。那是1978年，宋庆龄出席2月26日至3月5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那时候宋庆龄已经85岁高龄，从大会上的各代表发言，到小组分头讨论，甚至晚上也不中断，宋庆龄那么大的年纪，实在是感到筋疲力尽，连走路都不稳。但是外国朋友在电视上看到的宋庆龄似乎“很健康很强壮”。这多亏了永洁一路搀扶着她走路，机灵的永洁只要看到有人对着宋庆龄拍照，就马上放开手，这样看起来是宋庆龄自己在走。对于永洁的贴心照顾和支持，宋庆龄非常满意，也很欣慰。

1979年，宋庆龄通过国外的朋友安排隋永洁去美国念书，开始在纽约的哥伦比亚预备学校读书。永洁在“文革”中没能够好好读书，基础差，所以她在美国读书非常用功。但是，她不习惯美国的饮食，身体状况不佳。宋庆龄非常担心。她在1979年9月13日的信中写道：“永清可以吃外国的食物，可是永洁不行！她每天学习18个小时，为了赶上那些她在这里从来没有学过的课程。事实上，她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那时候学生们不学历史或者数学，

而是被‘四人帮’教唆着去殴打他们的老师。(不过永洁没有这么做!)就因为那样,有数不尽的教授后来死于腰子病!”1979年10月18日的信中是这样写的:“我最最担心的是我的永洁的身体。她很孤单,每天要学习18个小时。文化大革命期间孩子们不能学数学、历史等,所以她是一个受害者。现在,她觉得数学很难,因为她在这里只上了两年英语课。那个国家陌生的风俗习惯一定把天真的她给吓到了。她已经晕倒过三次了,两次在学校的房间里!我自然非常担心,因为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很勤奋,也很直率。我要试着找些朋友帮她弄一张下个暑假回家的机票。我在加州有一些中国朋友,也许能帮上忙。能否成功我不确定,因为那里的生活成本已经飞涨。”

永洁在美国学完预科全部课程后,又在特尔尼蒂大学(又称“三一学院”)学习。宋庆龄在美国的一些朋友如《纽约时报》的沙利文(Sullivan)等,对永洁很照顾。永洁体质差,宋庆龄想安排她做一次全面体检。然而美国生活费用很高,一次体检要花很多钱,虽然永洁申请到了奖学金,但是也只能维持她的学费和伙食。宋庆龄无力承担这样的费用,于是宋庆龄便想办法让永洁回北京做检查。宋庆龄与朋友商量,想到了一个办法。在1980年2月1日给我的信中写道:

“一个要好的中国朋友给我提了个建议,今年夏天她要组织一个妇女代表团来中国,永洁可以在她们20天的旅程中充当导游和翻译。这样她自己所需的费用就可以由代表团来支付了。我想既然我们不想接受帮助,那么这就是最好的计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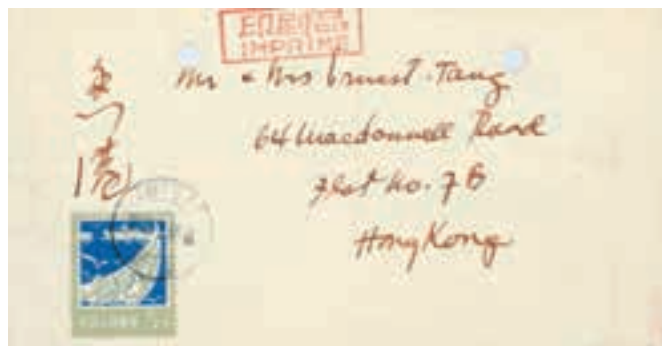
“即将见到亲爱的永洁我真是非常的高兴,她是个有责任心的学生,而且她很想家!请不要跟任何人提及这件事,因为还只是在计划中,我不想有人毁了我的计划!”

1980年4月29日的信中是这样写的:“永洁很快就要回家了,因为她要做一次体检。她学习很刻苦,但不能吃牛肉、羊肉、黄油,甚至牛奶也不能喝,你可以想象她

会变得多么消瘦。她的奖学金只够支付她在国外的学费和伙食，所以我的一些好朋友在帮忙，让她暑假能够回国来。我微薄的收入不能帮助她回来接受治疗。”

1980年6月，宋庆龄来信告诉我永清要结婚了，她要为永清举办一个简单的婚礼，但不会铺张，只邀请一些好朋友。宋庆龄身体不太好，不能亲自筹备婚礼。好在差不多同时期，宋庆龄的一位朋友负担了永洁的旅费，永洁从美国回到北京，宋庆龄非常高兴，便让永洁帮着张罗永清的婚礼，负责帮她挑选家具。宋庆龄还给我寄来了永清的结婚请柬。

永清结婚后与丈夫住在外边，虽然经常来看望宋庆龄，但是毕竟相处的时间少了，宋庆龄非常挂念她。她后来给我的信中写道：“她和她丈夫住在一个水泥地的二居室的小公寓里（因为北京缺少木头），客人多的时候，得坐在她床上，这让她很不开心。我会想办法给她找一个三房的



1980年宋庆龄寄给我的隋永清结婚请柬

公寓，这样就可以放进一个衣橱啦。这就是这里的生活！”

永洁在暑假结束后就回了纽约，虽然团聚的时间很短暂，但对宋庆龄来说是十分快乐的事情。永洁在特尔尼蒂大学学习刻苦，宋庆龄很欣慰。但遗憾的是，宋庆龄没能等到永洁学成回国。1981年永洁回北京之际，宋庆龄已经病危。宋庆龄去世之后，作为宋庆龄晚年身边最亲近的人，永清、永洁两姐妹一定非常难过。宋庆龄追悼会以后，永洁返回美国继续完成在特尔尼蒂大学的学业。据说，从此以后永洁便再没有回过中国。

从宋庆龄的信中，不难看出宋庆龄对这两个女孩的关爱。宋庆龄在1974年考虑遗嘱的时候，也考虑了两个女孩。多年以后，我从曾经参加执行宋庆龄遗嘱的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原副局长李家焯先生那里了解到，宋庆龄当年在遗嘱中除写明将自己的一些物品在她身后赠送给隋家姐妹外，还向她们赠送钱款，永清5000元、永洁10000元。当时受赠钱款的共有10人，10000元是最高数额。

但不可否认的是，两个女孩在成长过程中也给宋庆龄带来过烦恼。多年来，人们对这两个女孩讳莫如深，少有人谈及。但是在我看来，这两个女孩的确在宋庆龄的晚年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给宋庆龄晚年孤寂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29. 保姆李燕娥最后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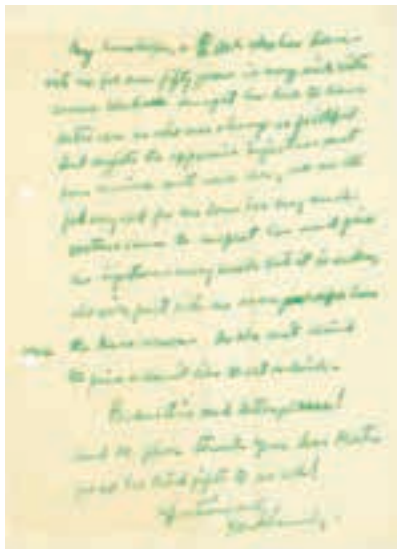
宋庆龄有一位跟随了她 50 多年的保姆李燕娥。宋庆龄去北京工作的时候，李燕娥留在上海帮她料理家中的事务。虽然我与这位保姆没有什么接触，但是对于她半个多世纪忠心耿耿追随和照顾宋庆龄的故事是早有耳闻。

这位出生于旧社会的普通劳动妇女，幼年生活困苦，自 16 岁起就来到宋庆龄身边，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特别是在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年代，国民党特务机关曾经以种种卑劣的手段，诱使她监视宋庆龄的活动以及宋庆龄与共产党的来往，她都不为所动，严辞拒绝。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轰炸香港之时，日本飞机就在上空盘旋，她一心保护宋庆龄，架起梯子，帮助宋庆龄翻越墙头，到隔壁邻居家的防空洞里避难。生死关头，她却完全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全，足见她对宋庆龄的忠心，因此，宋庆龄与她感情深厚，如同亲人。宋庆龄在 1974 年 12 月 4 日的来信中提到了她与李燕娥的深情：

“我的管家，已经跟了我 40 多年，也已经领退休金退休了。她还住在我上海的家里，因为我们就像亲人一样。她没有家可以去，没有一个亲人。她对我很尽职，也很忠诚，所以有她跟我在一起我很开心。”

1979 年 4 月，李燕娥被诊断出患了子宫癌，宋庆龄先后两次安排她乘飞机到北京治病。虽然经过手术治疗，但是癌细胞还是大面积扩散。1980 年 3 月底，李燕娥病情恶化，无法再次手术，只能用药物来延长她的生命。为此，宋庆龄心烦意乱，一筹莫展。她非常担心李燕娥会很快离她而去，想了很多办法，不仅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要向李燕娥透露她的病情，还想方设法给她打进口针剂，延长她的生命。宋庆龄在 1980 年 12 月 12 日的来信中说：

“我的管家，一个已经跟随我 50 多年的香山人，得了癌症，病得很重。因为她一直很痛，我们把她接到这里来接受更好的照顾。但是尽管给她注射了美国进口的昂贵



1980 年 12 月 12 日宋庆龄来信第四页



1980年宋庆龄与保姆李燕娥（左）在北京寓所

针剂，还是治不好她，所以我們都很伤心，因為我們都很愛她。每個星期醫生都來給她檢查，打針，但是沒有用，她可能聖誕節之前就會離我們而去。因為她受不了這種疼痛，不想吃喝。”

那段时间，宋庆龄给很多好朋友如爱泼斯坦、马海德等的信中都提到了她对李燕娥病情的担忧，以及那种无可奈何的焦虑。在宋庆龄心目中，李燕娥早已不是保姆，而是助手，忠实的益友，更似亲人，只要打针还能维持她的生命，宋庆龄就要让她活下去，不惜一切救她。

尽管宋庆龄给予李燕娥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是李燕娥的病情日趋恶化，终于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于1981年2月5日在北京医院病逝。李燕娥的病，前前后后有一年多的时间，身心都很痛苦，宋庆龄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这种焦虑的煎熬让她六神无主，心绪极度烦乱。

李燕娥撒手人寰后，宋庆龄多次伤心落泪。她强撑病体，亲自过问李燕娥的身后事，按照她以前与李燕娥的约定，将李燕娥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宋家父母墓的西侧。

虽然我对这位忠诚的劳动妇女了解不多，但是，我能够感受到宋庆龄与她的深厚感情。每当我去上海宋庆龄的寓所缅怀宋庆龄，都会在二楼宋庆龄的办公室驻足片刻。



李燕娥墓



2012年4月我与夫人
孙君莲祭扫李燕娥墓

在她的办公室中间，有一张小餐桌，两把靠背椅，一把朝南，一把朝西。据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宋庆龄晚年遇到工作繁忙或者身体不适，就在这里与李燕娥一起用餐，而且是把朝南的位子给李燕娥坐。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宋庆龄没有把李燕娥当成“下人”，而是像朋友、亲人，不拘泥于繁文缛节。而在故居二楼李燕娥的卧室里，有宋庆龄特别要求工作人员为李燕娥定制的比较低矮的席梦思床，方便身材矮胖的李燕娥休息，还有一本宋庆龄为纪念李燕娥而亲手制作的相册。每每看到这些，我都感触良多，这就是宋庆龄的崇高品德和人格魅力，时刻关心着身边的工作人员，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工作情况，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每年去宋庆龄陵园祭扫宋庆龄墓，我也总会在李燕娥的墓前献上一束花，祭奠和怀念这位把一生的年华都奉献给宋庆龄的女性。

30. 巨星陨落在世界的东方

宋庆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80年12月12日。在信中，她谈到了保姆李燕娥的重病以及她内心的焦虑和担忧。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收到她的来信，我和家人很是挂念。

宋庆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1981年5月8日，出席加拿大温哥华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她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的仪式。宋庆龄坐在轮椅里，精神饱满地发表了英文讲话。其实当时宋庆龄已经病重，身体衰弱，很多人劝她就在家里接受学位，在仪式上播放讲话的录音，但是宋庆龄坚持去人民大会堂亲自参加授赠仪式，觉得不这样做便是对远道而来的朋友的一种不尊敬。

仪式之后，宋庆龄的病情恶化。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宋庆龄病情的第一号公告。这一举动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公告全文如下：“宋庆龄副委员长患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经多方治疗，未见好转。曾多次出现发热、呼吸困难、心跳加快等症状。5月14日晚，突发寒颤高热，热度达40.2摄氏度，伴有严重心力衰竭。目前病情危急，正在积极抢救治疗。”

此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陆续发布了数个公告，向全国人民通报宋庆龄病情恶化的情况。尽管人们对于宋庆龄的病情恶化已有预感，但公告还是使各界人士极为震惊，许多领导人和宋庆龄的国内外好友相继去宋庆龄寓所探望。

5月下旬，我突然接到北京有关方面通过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潘静安先生送来的紧急通知和机票，让我即刻赶往北京。5月26日，我买了一盆宋庆龄喜欢的花飞往北京，一到北京立即被宋庆龄的警卫秘书杜述周领到她的病榻前。我看到宋庆龄鼻部插着管子，手也是浮肿的，我心中非常难过。我弯下腰，轻声说：“Grand Aunty，我看您来了。”



1981年5月26日我
在宋庆龄病榻前探望

宋庆龄听到我的呼唤，睁开眼睛看了我一下。她已经没有力气说话，随后又陷入了昏迷中。我是香港唯一受邀赶往北京陪伴在宋庆龄病榻一侧的人。

包括孙穗英、孙穗华，以及孙穗华丈夫张家恭，陈志昆、黄寿珍夫妇和他们的女儿陈燕，林达光、陈恕夫妇等在内的孙家众多亲属都已经赶到北京，前往宋庆龄寓所看望。第二天，在澳门的孙中山的外孙女戴成功也赶来了。

宋庆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陷入昏迷状态。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为宋庆龄配备了由高级专家和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小组，24小时密切关注宋庆龄病情的变化，尽力提供最好的治疗。

在这期间，我每天都到宋庆龄病床前探视，或是在楼下的走廊里徘徊，为宋庆龄默默祈祷。除了孙家的亲属以外，各方面领导人、宋庆龄的国内外友人，都以不同形式表达他们的问候，或亲自前往寓所探望，或来电话、电报慰问。宋庆龄病重期间，马海德的儿子幼马是寓所内唯一的一位摄影师，他真实地记录了宋庆龄生命最后的重要时刻。

自宋庆龄病重，我的表舅廖承志就经常守候在病床前，宋庆龄生前最后一次谈话，便是与在病榻前的廖承志长达20分钟的交谈。那时候，宋庆龄因为高烧，身体虚弱，

说话非常吃力，但她仍然用英语说：“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很感谢。”廖承志还告诉我们，宋庆龄病重之前，就向侍候在旁的邹韬奋夫人沈粹缜再三说过，她百年后要把她送到上海，埋在她父亲、母亲和已经逝世的忠心陪伴她 50 多年的李姐的墓旁。宋庆龄还告诉沈粹缜，墓地应如何安置，并且画了简单图样。

5 月 28 日晚，宋庆龄病情危急，咽部黏膜大出血，呼吸困难，又继发了肺水肿，守候随时待命的卫生部领导和医护人员进行了全力紧急抢救。抢救工作持续了 20 多个小时，直到无效，宋庆龄停止呼吸。在抢救期间，我和孙家的众多亲属均守候在病床前，直到她离世。

宋庆龄逝世以后，遗体被移到官邸底楼的大厅安放，周围放着鲜花和长青松柏，遗体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我和孙家的众亲属一直守候在遗体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各级领导，都赶来向宋庆龄遗体致哀，并向我们表示慰问，



1981 年 5 月 29 日我（左一）与孙家众亲属守候在宋庆龄遗体前



1981年5月30日《人民日报》关于宋庆龄逝世的报道

与我们一一握手。之后，众亲属上前与遗体告别，孙家的众亲属下跪磕头。宋庆龄的众多好友路易·艾黎、马海德、爱泼斯坦、柯如思以及在京的各国友好人士西园寺公一、宫崎世民、艾德勒等都向遗体致哀。向遗体致哀的还有宋庆龄的医护人员、工作人员，以及数位武警战士。最后向宋庆龄遗体告别的是隋家两姐妹，她们哭得很伤心，向宋庆龄遗体鞠躬以后，工作人员就带着她们离开了。深夜，陈志昆的女儿陈燕代表众亲属给宋庆龄在海外的亲属发了电报，告知他们宋庆龄不幸逝世的消息。

《人民日报》第二天详细报道了这一场面的仪式，并登有家属排队守灵的图片。那一天的报道上有我的名字，新闻照片中也有我。然而在之后的报道中，我就“人间蒸发”了。开始我也非常不理解，宋庆龄临终以及去世后守灵，我全程都参加了，为何新闻中偏偏将我隐去不报？后来我才得知，是我的表舅廖承志刻意要求的，因为他一向不喜欢“裙带关系”，虽然我家与宋庆龄情深意重，但是鉴于我与他的亲戚关系，为避人口舌，还是谨慎处理好。

宋庆龄逝世以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表公告，宣告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病逝，并决定为宋庆龄举行国葬，还立即成立了由邓小平、邓颖超、廖承志等393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全面开展有关吊唁和安葬事宜。

宋庆龄逝世的消息传出以后，她的很多远在海外的朋友纷纷发来唁电，表示深切悼念。斯诺夫人洛伊斯·斯诺的电报说：“宋庆龄女士的逝世是全世界的损失。”她代表斯诺的姐姐和姐夫以及在堪萨斯城的许多朋友向中国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萨缪尔·罗森和他的夫人的唁电称：“宋庆龄是一位伟大的女性。由于失去了她的豪迈的精神，世界将逊色不少。”他们表示要通过争取实现她的加强美中两国友谊的宿愿来缅怀她。格兰尼奇夫妇在唁电里说：“她

为中国人民摆脱长期封建主义统治的献身精神将为世人所敬仰。在反动统治的最黑暗的岁月里，她从未动摇过。她将与所有为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幸福生活而献出生命的英雄人物一起名垂史册。”

5月31日至6月2日，宋庆龄的遗体在人民大会堂停放三天，在那里举行吊唁。吊唁大厅入口处的横幅上写着：“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同志永垂不朽！”大厅四周装饰着黑纱、挽幛。吊唁大厅里悬挂着宋庆龄巨幅遗像，两旁摆列着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送的花圈。宋庆龄的遗体安放在水晶棺里，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是鲜花和常青树。人民解放军战士持枪守护在两旁。遗体前摆放着陈淑英、孙穗英和孙穗华、戴成功等亲属敬献的花圈。我和宋庆龄的外国友人、孙家众亲属、宋庆龄生前身边工作人员以及各界代表等，参加了吊唁和守灵。

吊唁期间，宋庆龄生前的友人——孙中山担任非常大总统期间的外交部长伍廷芳先生的孙子伍竞仁和夫人伍郑镜宇专程从美国赶到北京，到吊唁大厅瞻仰宋庆龄的遗容。



参加治丧委员会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马海德、西园寺公一、耿丽淑、宫崎世民、柯如思、爱泼斯坦、艾德勒（左起）在宋庆龄遗体前守灵



廖承志、经普椿在人民大会堂吊唁宋庆龄

各级领导、各界代表、宋庆龄的亲属和好友，以及成千上万的民众，怀着悲痛的心情瞻仰宋庆龄的遗容，表达哀思。三天之中，首都各界约有 12 万余人参加吊唁活动。

三天的吊唁仪式结束后，宋庆龄的遗体在廖承志及孙家亲属的护送下被送往八宝山火化。我们乘坐的汽车跟随在警车护送的灵柩之后。经过长安街时，看到大街两旁伫立着无数满怀哀痛的群众，凝视着缓缓驶过的灵车。厚厚的人墙，从人民大会堂一直延伸到 20 多里外的八宝山。此情此景，深深地触动了我，让我意识到亲爱的太婆宋庆龄在人们的心目中受到了怎样的爱戴。

6 月 3 日下午 4 点，宋庆龄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由胡耀邦主持，邓小平致悼词。各级领导、宋庆龄的亲属和生前挚友等都参加了追悼大会。邓小平的悼词简述了宋庆龄伟大的一生，听着悼词，我的心中不免感慨万千。确实诚如悼词中所说，宋庆龄将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了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七十年如一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用“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来形容她的高风亮节一点都不夸张。她真正对得起“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荣称号。

追悼大会以后，宋庆龄的遗像和骨灰盒由专机送往上海，因为根据她生前的遗愿，她要跟父母以及李燕娥在一起，安葬在上海宋家的墓地。邓颖超、廖承志、廖梦醒、宋庆龄的亲属、国际友人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其生前友好，同机前往上海。当天，上海全市下半旗志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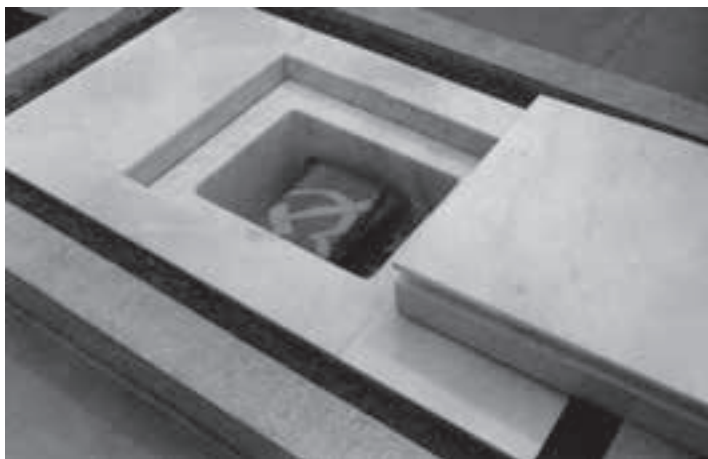
在上海西郊万国公墓，我看到了整修一新的宋氏墓地，周围冬青翠柏环绕。中央是宋庆龄父母的合葬墓，当年红卫兵将墓地毁坏之后，经周恩来过问，墓地得到重新修葺，但是墓碑上只刻了宋庆龄一个人的名字。如今，墓碑上重新刻上了她兄弟姐妹的名字。西侧是早宋庆龄三个月去世的保姆李燕娥的墓，比宋庆龄父母的墓低一些。而东侧相



宋庆龄安葬典礼入口处



重新修葺后的宋氏墓地



宋庆龄骨灰放入墓穴



我（右二）与沈粹缜、廖梦醒、李湄、伍郑镜宇（左起）在宋庆龄墓前致哀



邓颖超（右三）、廖承志（右二）、乌兰夫（右四）、陈慕华（右一）等在宋庆龄墓前致哀

对的位置，便是宋庆龄的墓穴，规格尺寸与李燕娥的完全一样，这是按照宋庆龄的要求安排的。

宋庆龄的骨灰盒由解放军礼兵安放进洁白如玉的大理石墓椁。我跟其他宋庆龄的生前友好一起，缓步绕墓一周，我的前面是廖梦醒和她的女儿李湄，我们将宋庆龄生前喜欢的黄色香石竹花，轻轻放在她的墓地上。

宋庆龄曾经在1932年与弟弟子安在父母的墓前留影，她在照片背后曾写下“树长万代，叶落归根”。如今，她也“叶落归根”，回到了她的出生地上海，与她的父母以及陪伴了她半个多世纪、同生死共患难的李燕娥长眠在一起。

安葬仪式结束以后，邓颖超代表治丧委员会设宴招待宋庆龄的亲属、国际友人和包括我在内的宋庆龄生前友好。邓颖超在宴会上讲话，对宋庆龄的亲属表示慰问，对参加葬礼的宋庆龄生前友好和国际友好人士表示感谢。

6月5日上午，我随同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和上海市负责同志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等，同宋庆龄的亲属、生前友好和国际友人一起，再次前往上海万国公墓，在宋庆龄墓前默哀，向她致敬。中午，上海市负责人举行宴会招待我们，对前来上海参加宋庆龄名誉主席



外国友人在宋庆龄墓前致哀

的葬礼的亲属、生前友好和国际友人表示感谢。下午，我们一行数人前往孙中山先生故居和宋庆龄生前寓所瞻仰。宋庆龄的亲属已经于前一日下午前往上述两个寓所瞻仰过，便没有同行，而是转道去南京中山陵谒灵，并瞻仰廖仲恺与何香凝墓。孙中山故居的会客室里，悬挂着宋庆龄的遗像。我们一行数人在遗像前肃立默哀，大家站在孙中山、宋庆龄的合影前，向这两位伟大人物表示由衷的敬意。



1981年6月5日我（后排左二）与宋庆龄的中外朋友一起在上海参加宋庆龄骨灰安葬典礼后瞻仰孙中山故居

31. 捐出宋庆龄赠给我的藏书

前面已经提到，宋庆龄生前单独留下一份遗嘱给我，将她北京、上海两地的藏书全部赠给我。当年宋庆龄让我勿将她给我遗嘱之事告诉他人，因此，直到追悼活动结束，我对遗嘱之事只字不提。葬礼完毕，奔丧队伍飞回北京。到京后大家就解散了，我也打算回香港。此时廖承志让我不要走，在北京饭店再多住些日子，也没有说明原因！

我在北京饭店没事天天躺在床上看天花板，吃了差不多两个星期“皇粮”。有时，我到廖承志家喝喝茶，聊聊天。直到有一天我母亲向廖承志要人，问为什么不让邓广殷回香港？于是，廖承志将我叫到他家，关上门，问我有没有宋庆龄的遗嘱？我回答说有的，但我并未将遗嘱带在身上。事实上我也不准备出示遗嘱。廖承志问我打算怎么办？我本能地想到，宋庆龄家里这么多藏书，分别放在北京和上海，我根本带不走，也无法搬回香港家里。当年宋庆龄在给的信中也提到过可以保存在原地，因此，我想到捐给国家是最妥善的办法。由于我事先并无思想准备，便顺口回答：“要不捐给国家？”廖承志马上说：“好，你把这个意思写下来，写个捐赠报告。”我表示自己不会写，也不懂格式，要求廖承志帮忙代写。于是，廖承志十分麻利地拿起纸笔，当场拟就一份草稿。廖承志要求我依葫芦画瓢，我马上照抄一遍，并签上了我的名字。随后，廖承志立即收起我签过名字的捐赠报告，告诉我可以返回香港了。

当时这一切是在很短时间内发生的，我稀里糊涂，没想很多，只记得草稿、捐赠报告等等都被廖承志收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直到多年后，在邓颖超的催促下，才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次简朴的捐赠仪式，北京宋庆龄基金会主席康克清向我颁发了捐赠证书。

当年我都不知道廖承志是如何知悉宋庆龄单独写了一份遗嘱赠书给我的，直到多年以后才知道他是从宋庆龄留下的相关文件中了解这一情况的。2008年3月17日的《世



2008年4月我与李家炽先生（左）会见

纪》杂志刊登了当年“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八人临时小组成员之一，如今唯一健在的李家炽先生的回忆，向世人披露了当年执行宋庆龄遗嘱的有关内情。2008年4月，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陆柳莺馆长的安排下，我很高兴地与李家炽先生见面长谈。我向他求证当时他们是如何得知宋庆龄给我遗嘱之事的。据李家炽先生回忆，宋庆龄将遗嘱锁在自己的卧室里，钥匙交给深得她信任的保姆钟兴宝保管。在宋庆龄去世后，钟兴宝就将钥匙交给了中央派来的同志。那天八人临时小组开会时，让大家传阅宋庆龄从1979年2月起写的几份遗嘱。在他的印象中，遗嘱共有五份，既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遗嘱都很简短。但是，他没有见到宋庆龄单独写给我的遗嘱，而是在其中一份遗嘱上看到有关于将书籍赠送给我的内容。李家炽至今保存着邓颖超关于《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办法（草案）》报告的复印件。《办法》共有六点内容。其中第五点是：邓广殷（廖承志表兄邓文钊之子）已有声明，所赠书籍，不接收，交公处理。

其实，当年我写好捐赠藏书的报告后就回了香港，这些藏书我都没能亲眼看到。此后，这些藏书一直由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宋庆龄故居保存。我每次到上海，一定会去宋庆龄的故居看一看。但是，宋庆龄上海故居方面由于保存

条件的限制，将这些图书存放在向上海档案馆租借的库房里，库房由两家单位共同租用，因而钥匙也是共同保管，我几次去上海，都没能亲眼看到这些书。身为全国政协委员，2001年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递交了一份提案，呼吁将北京、上海两地的宋庆龄故居所藏的宋庆龄藏书予以展出，供参观者查阅。当时上海宋庆龄故居的陆柳莺馆长刚刚调入上海故居工作不久，我的提案便是她上任后处理的第一个“棘手”问题。陆柳莺馆长很重视我的提案，为了满足我想亲眼目睹“藏书”的夙愿，她安排人员从库房内提取部分藏书暂时存放于故居的书房内，让我参观，同时将《宋庆龄藏书目录》交给我收藏。她对我耐心地做了一些解释工作，并承诺将来一定会让我看到全部的藏书，让我的提案得到实现，令我感到一丝欣慰。这也成了我与上海宋庆龄故居为了宋庆龄的事业而合作的开始。

2007年4月10日，我和夫人孙君莲将宋庆龄关于赠书的“遗嘱”制成一块铜牌赠与上海故居，希望将来在陈列展览时可用。2009年当我再次去上海故居瞻仰的时候，看到新改版的文物陈列中特别设计了一个西书房的陈列展柜，展出了宋庆龄的部分藏书以及我捐赠的刻有宋庆龄遗嘱的铜牌，我感到非常欣慰。

2010年4月，我和家人在陆柳莺馆长等人的陪同下



2002年我与金顺德先生（左）在上海宋庆龄故居西书房参观宋庆龄的部分藏书



宋庆龄上海故居的部分藏书



2009年4月我在宋庆龄文物馆藏书陈列展柜前留影

参观了文物库房，我亲眼看到了宋庆龄在上海家中收藏的全部书籍。我了解到宋庆龄在上海寓所共有藏书近 5000 册，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理论、文学、教育、宗教、科技等 12 大类。除中文外，还有英、法、日、德、俄、希腊、朝鲜、拉丁等 18 种文字，其中很多书出版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有不少已经绝版了。

我仔细地查看了这些藏书，很珍贵，保存得也很好。它们跟随宋庆龄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承载了一段段难忘的历史。我认为从这些不同时期的书中也能了解一些宋庆龄在不同时期所关注的问题，对于研究宋庆龄的思想是非常有帮助的。据了解，故居的工作人员也在致力于这些书的研究工作，让我感到非常欣慰，因此，我至今认为捐出宋庆龄赠给我的藏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32. 邓颖超推荐我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我的父亲在世的时候，与我一起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但他对我一生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父亲的言传身教让我始终对社会充满责任感，并愿意尽我所能为社会奉献爱心。而邓颖超妈妈推荐我做政协委员，使我有机会在全国政协的层面上参政议政，也尽自己的能力为国家、为宋庆龄的事业做一点贡献。

在我的记忆中，我与邓妈妈见过很多次面。记忆深刻的有那么几次。1972年秋天，何香凝在北京逝世，因为父亲的关系，我和我夫人被邀请赴京参加葬礼。香港被邀请的仅我夫妇二人。何香凝的遗体运往南京与廖仲恺合葬以后，当地政府在中山陵南京军区招待所宴请由北京来的领导和廖家亲属。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将军脚蹬草鞋，手拿斟满茅台酒的酒杯与我们一一干杯。第二天，我们一行去参观南京梅园新村前中共办事处。那是当年周恩来、邓颖超工作过的地方。参观时，邓颖超谦逊地对许世友将军说：“过去你们是正面与敌人斗争，我们是侧面与敌人斗争。”照此来看，我的父亲邓文钊所处的只是侧翼的侧翼，他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才做出了一点成绩。

1984年，我又受邀去北京参加了国庆观礼活动，那时廖承志已经去世，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个别接见我。她对我的父亲很了解，知道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对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也知道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和所受的不公正对待。邓颖超也很了解我为宋庆龄、何香凝、廖承志所做的一切。宋庆龄生前写下遗嘱将她在北京和上海寓所的所有藏书赠送给我，我又将宋庆龄的藏书捐给国家。邓颖超对此很重视，督促宋庆龄基金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我举行简短的捐赠仪式。她鼓励我继承父亲的事业，为祖国和人民多做贡献。在这次接见中，她还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总理有许多口袋，他去世，把这些口袋也带走了。”不久，中组部有人到香港，我与他谈及此事。他

也说：“有些事当时只有周总理一人知道，他走了，就没有人知道了。”我想，廖承志逝世很突然，也许他也带走了许多口袋。

1986年，任全国政协第六届主席的邓颖超向香港新华社副社长乔宗淮推荐我为第六届全国政协补选委员。当时曾经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邓广殷何德何能？乔宗淮是乔冠华之子，与我也很熟悉，在香港时期我们相处很好。他了解我的为人，因而也赞同邓颖超的建议，认为我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是能够为国家做贡献的。于是，我加入了父亲生前好友们所在的全国政协的爱国行列中。从1986年开始一直到2003年，我历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我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我到过全国各地考察，至今，我还保存着一本地图册，上面记录着我考察过的地方，每到一地，我就在地图册上做个记录。20年下来，除了青海和西藏以外，几乎全国各地都跑遍了。20年中，我还拍摄了大量考察期间的照片，真实地记录了这些地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

1997年、2002年、2007年我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九、十、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会议成员。我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成员之一。推委会于1996年11月由香港特区筹委会筹组而成，是负责选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行政长官及临时立法会的组织。推委会共由400名推选委员组成。我也是中华海外联谊会名誉理事，还担任香港中华文化总会名誉会长。2009年9月底，我有幸参加香港各界人士的国庆60周年观礼团，规格之高前所未有。

正是因为邓妈妈的推荐，我才能够有机会在全国政协的层面上为国家做点事情，因而我在任期内也是尽职尽责，不辜负邓妈妈的期望。至今，我的书房中还挂着邓妈妈与我的合影。每当看到这张合影，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当年她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我的情景。

33. 创设“邓文钊优秀教师奖励金”

1982年5月29日，我与夫人孙君莲受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为纪念宋庆龄逝世一周年而举行的纪念仪式。仪式在宋庆龄北京寓所的庭院里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宋庆龄的海内外亲属、国际友人以及各方面的人士共600多人出席了纪念仪式。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在纪念仪式上发表了讲话。讲话中，廖承志称宋庆龄为“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号召人们将宋庆龄的伟大革命精神更加发扬光大，让人民世代纪念她、学习她。

看到那么多国家领导人、国际友人如此爱戴和尊敬宋庆龄，我的内心也深受感染。作为宋庆龄最信任的晚辈和友人之一，我认为我有责任为她的事业尽我的绵薄之力，将她的精神广泛传播。此后，我对宋庆龄的事业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除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以外，我参加了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投身于这位伟大女性生前倾注了无数心血的福利事业。

担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港澳理事期间，我积极参与基金会的各项活动。我了解到宋庆龄创



1982年5月29日廖承志在宋庆龄逝世一周年纪念仪式上讲话

办的中国福利会在妇幼保健、儿童文教福利事业方面进行着实验性、示范性的工作，并开展科学研究，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因为这充分体现了宋庆龄全心全意为妇女、儿童服务的宗旨。

1989年，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发起了希望工程，援建希望小学与资助贫困学生是希望工程实施的两大主要公益项目。其时，我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希望工程对中国贫困地区的关注引起我的重视和思考。在人们纷纷捐款援建希望小学时，我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当时，北京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刘启林与我讨论在基金会设立一个项目。有关项目的内容，我对他说：“仅仅将学校盖起来是不够的，怎样长期留住贫困地区学校的一线老师，这是一个大问题。”经过认真的思索与调查，我的想法更趋明确，“鼓励教师安心在农村教学，比直接资助贫困学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决定自1995年起每年拿出一部分钱，捐给北京宋庆龄基金会，旨在鼓励和表彰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长期扎根艰苦环境，甘于奉献，为当地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中小学优秀教师，并将奖金命名为“邓文钊优秀教师奖励金”。

1996年，我和中国福利会副主席杜淑贞在北京一同



2005年12月我为海南文昌优秀教师颁发“邓文钊优秀教师奖励金”



2006年9月我在安徽金寨为第十届、第十一届“邓文钊优秀教师奖励金”获奖教师颁奖

2007年金顺德先生（主席台右二）代我为宁夏原州区优秀教师颁奖

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见面时，她对我说，“邓文钊优秀教师奖励金”这个项目很有意义，见解独到，做法也很特别，建议我在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也设立同样的专项基金。我们很快签署合作协议，并将项目实施地点选在安徽省金寨县，因为那里曾经是革命老根据地，出了 59 位将军。

这样，我陆续出资请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在革命老区安徽金寨、贫困边区宁夏固县、宋庆龄祖居海南文昌、白求恩大夫逝世的地方河北唐县，分别设立为期十年的“邓文钊优秀教师奖励金”。十年中，共有 1520 名中小学优秀教师获得奖励。我虽然腰腿不好，行动不便，但多年来坚持不顾旅途颠簸亲自为优秀教师颁奖，以此表达我对农村山区基层优秀教师的敬意，对宋庆龄事业的追随，对祖国教育事业的支持。

34. 资助海南文昌市医护人员培训

宋庆龄是在上海出生的，但是在晚年给我的信中，她多次提到她的祖籍是海南文昌。虽然她一生中从没去过那里，但是我知道她对文昌有一份特殊的感情。2001年，为了缅怀宋庆龄，使宋庆龄的事业和精神在她的家乡海南文昌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我在宋庆龄逝世20周年之际出资2万元制作了一座高90厘米、宽100厘米、厚58厘米的宋庆龄半身雕像，捐赠给文昌市庆龄妇幼保健院。为了制作好雕像，我奔波于香港、广州和海南三地，因为劳累，一度病倒。后来我又在夫人陪同下去广州检查雕像的质量。现在，宋庆龄半身雕像坐落在该院门诊大楼的大厅内，供后人瞻仰，使人们缅怀宋庆龄的丰功伟绩，继承她的遗志，进一步发展文昌市妇女儿童保健事业。

也正是在此期间，我又萌生了另一个念头。当时，文昌市庆龄妇幼保健院的门诊大楼在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对口援助下刚落成不久，就硬件条件而言已相当于上海的社区医院，然而医生的业务能力与管理水平却相差甚远。我向中国福利会和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的同志提



2001年我（前排中）在海南文昌市庆龄妇幼保健院宋庆龄雕像前与医护人员合影



2005年我（前排中）在资助海南文昌市庆龄妇幼保健院培训项目签约仪式上

出我要捐资培训那里的医生和护士。我说：“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要让文昌市庆龄妇幼保健院的骨干医生和护士到宋庆龄亲手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受训。”基金会的同志一开始有些担心，觉得两地差距过大，怕实施起来有一定难度。我想了种种办法，找领导谈，坚持一定要让那里的医生到上海，让上海的医生手把手地教她们，因为我相信培养一支医护队伍比建一所医院更重要。终于，我的努力在2006年成为现实。

2006年，我与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合作制订了文昌市庆龄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五年进修计划，由我每年出资承担受训医护人员的培训费和住宿费以及往返海南与上海的旅费，上海宋庆龄基金会负责联系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具体落实培训计划。文昌市庆龄妇幼保健院每年派出三名医护骨干到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跟班进修，主要学习产科、新生儿科、护理、儿童保健等基础理论及实践操作等知识，使受训医护人员掌握降低新生儿死亡率，产妇急救、护理管理、新生儿康复治疗等基本技术与方法。

进修计划实施后，效果显著。我很快决定，从2008年起，将进修名额增加到每年五名。至2010年，文昌市庆龄妇幼保健院在五年内已选送了21名医护人员到中福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进行了对口专业培训。

我每年还利用在上海参加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会会议的空隙，抽出时间去看望这些医护人员，请她们到金茂大厦旋转餐厅吃饭，同时了解她们的进修情况，听取她们的学习体会，仔细看她们的学习小结。2011年，我在英国做医生的小女儿到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参观，就遇到了在那里进修的文昌庆龄保健院的医护人员。这些医护人员非常珍惜这样的进修机会，学习非常努力，我感到很欣慰。



2008年我（前排中）在上海金茂大厦旋转餐厅与中国福利会领导以及海南文昌市庆龄妇幼保健院在上海进修的医护人员合影。左一为中福会秘书长艾柏英，右一为副书记季红星

35. 在香港接待宋庆龄事业的追随者

诚如当年在香港接待宋庆龄的国际友人一样，对于来到香港的宋庆龄事业的追随者们，我也像招待自己的家人一样款待他们。

1998年6月14日，纪念宋庆龄在港创立保卫中国同盟（现名中国福利会）60周年招待会在位于湾仔海畔的华润大厦50楼贵宾厅举行。中国福利会主席黄华、副主席李储文、爱泼斯坦、许德馨出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马毓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郑国雄担任主理嘉宾，我也应邀出席。中国福利会的领导、机关和基层的领导以及支持保卫中国同盟事业的画家丁聪、舞蹈家戴爱莲和当年陪同宋庆龄赴香港的中共联络员李云、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人员潘标等老朋友在香港相聚非常难得。我们一起到保卫中国同盟办公地



1998年6月在香港举行的纪念中国福利会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左起：中国福利会副主席李储文、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马毓真、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中国福利会主席黄华、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郑国雄、中国福利会副主席爱泼斯坦、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朱育诚

1998年6月我（右一）与参加中国福利会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的部分代表寻访当年保卫中国同盟旧址。前排右二为潘标，右三为许德馨



1998年6月我（后排）与黄浣碧、戴爱莲、爱泼斯坦、黄华（前排左起）摄于香港游艇会



点——西摩道21号寻根，可惜，原来的办公楼已经拆除，现在已经建成一栋公寓楼了。6月15日晚上，我包下了香港游艇俱乐部一层，招待参加纪念保卫中国同盟60周年的朋友。

2000年春，中国福利会办公室主任沈海平女士到香

港中文大学短期进修。“家”里来人，我自然要尽地主之谊。我先请她到赛马会参观并吃了顿美餐，然后就去祭扫“保盟”的一位外籍中央委员——诺曼·法朗士的墓地。当年，日军攻打香港时，法朗士与“保盟”的另一位中央委员贝特兰都加入了保卫香港的志愿城防队。开战不久法朗士英勇牺牲，贝特兰亲手掩埋了他。光阴荏苒，50多年来，大家一直不知道他的墓地现在何处，是我费尽周折，终于在赤柱的英军坟场找到的。我急切地带沈海平冒雨上坟，作为她香港行的重要内容。于是，沈海平很荣幸地成为中国福利会第一个来为法朗士祭扫的人。碰巧的是，法朗士的墓地竟然就在爱泼斯坦当年被拘禁的日军集中营对面。那一天，我与沈海平在雨中虔诚默哀、鞠躬、献花……我要她永远记住这位中国福利会的先驱，记住法朗士的安葬位置，并叮嘱她回去转达我的意见，一定要组织中国福利会同志专程来祭扫。

2001年，中国福利会许德馨副主席带领学前教育团在结束澳大利亚考察后回国，途经香港，与专程赴香港的爱泼斯坦和中国福利会部分成员会合在一起，计划去祭扫



2001年我（后排左一）与中国福利会部分成员在香港法朗士墓前

法朗士的墓。祭扫法朗士墓地前一晚，我和夫人在赛马会宴请大家，一起追忆中国福利会的先驱在战争年代所做的特殊贡献。第二天我们来到法朗士的墓前，默哀、鞠躬、献花，并认真聆听爱泼斯坦讲述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以及保卫中国同盟的外籍人士在香港保卫战中的英勇事迹。

之后，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一起到深圳大鹏湾华侨永远墓园祭扫了我父亲的墓地。墓地背靠青山，面向浩瀚的大海。当时，我非常激动，这是中国福利会的同仁第一次来到我父亲的墓地祭扫。

2009年3月18日，我与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的陆柳莺馆长分别应邀参加了在香港孙中山纪念馆举办的“清菊雅石——宋庆龄文物珍品展”开幕式。展览开幕以前，我与陆柳莺馆长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并就我所珍藏的宋庆龄英文亲笔信辑集影印刊布的相关事宜达成了初步意向。此后的几年中，上海宋故居的馆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几次到香港来，我都非常高兴，像家里人一样招待他们。工作任务完成以后，我会带他们环游香港。

这些年，每当有朋友来香港，我都会带他们到邓家位于中环伊利近街的“静安居”去坐一坐，向他们讲述当年香港秘密大营救时，我父亲和我们全家在潘静安先生的安排和护送之下离开香港的难忘经历。当年潘静安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一位机要工作人员，精明能干，化名潘柱。他在大营救初始阶段承担了寻找、联系、安排困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偷渡出香港岛的重任。新中国成立后，潘静安曾任中国银行驻香港副总稽查，1980年代奉调回国，曾任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行董事会常务董事，2000年7月病逝。多年后，为了铭记潘静安对邓家的救命之恩，同时也表达我们家人对潘静安的感激，我请廖承志为“静安居”题写了名字。在这里，我与宋庆龄事业的追随者们共同缅怀宋庆龄以及那么多仁人志士抗战时期在香港所做的贡献。



1990年代我看望病中的潘静安先生（左）

36. 让宋庆龄的遗物“回家”

在我与宋庆龄长达十年的通信和交往中，我深知，在宋庆龄的心目中，去北京是“上班”，到上海是“回家”。她在上海淮海中路 1843 号的寓所，永远是她“可爱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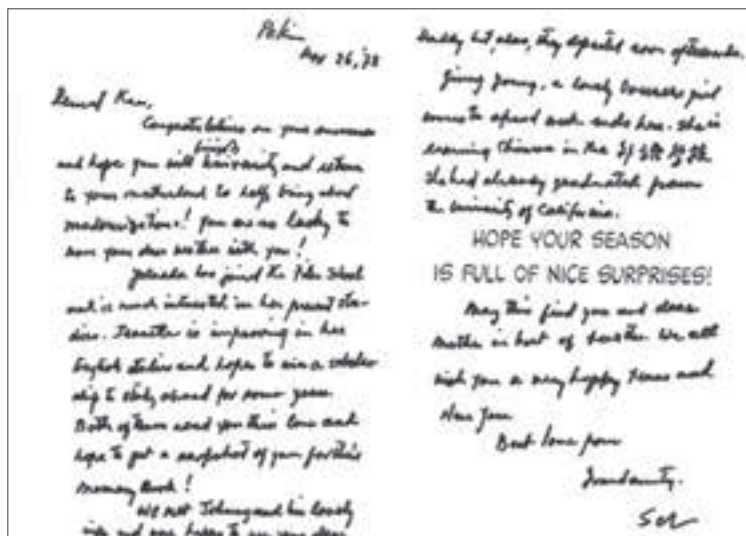
虽然由于工作的关系，宋庆龄自 1960 年代开始常住北京，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她并不喜欢北京。一来，北京是一个让她伤心的地方，与她相伴十年的爱人和导师孙中山就病逝在那里。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派邓颖超、廖梦醒前往上海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的时候，宋庆龄也犹豫了很久，不愿再踏上伤心之地。二来，北京的气候比较干燥，又经常刮风，受到沙尘暴的影响。宋庆龄患有家族遗传的皮肤顽症，北京的气候让她非常不适。因此，虽然常住北京，但只要有机会，她都会回到上海的家，也算是暂时逃离繁忙的国务活动，获得短暂的休息。



宋庆龄上海寓所

她喜欢回上海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为国家着想。北京的房子很大，冬季一天要用掉一吨煤才能让偌大的房子暖和，而在上海，一吨煤可以用整整一个月。她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们这里在刮风，很冷。我把开暖气的的时间推迟了，因为这个大房子一天需要一吨煤！事实上是个巨大的浪费！”（1972年10月28日）“这里的天气又干又冷。我推迟了用暖气的的时间，因为给整个大房子和外屋供暖要一吨煤。这里天气令人很难受，我正要求回上海去，那里的天气更适合我。我那里的家很小，供暖一个月才需要一吨煤——真是给工厂大大地节约煤了。”（1972年11月3日）这也体现了宋庆龄精神品质中的又一个令人敬佩的侧面。

在她晚年给我的信中，常常能在字里行间看得出她对上海寓所的感情。相比北京醇亲王府花园，她更喜欢上海那面积不大但是充满温馨的寓所。1972年11月13日的来信中她写道：“我刚刚到家，发现气候清爽，我很喜欢。没有讨厌的刮风！我的小花园很怡人，有高大的桉树，鸟儿在上面筑巢，清晨鸟儿们歌唱。我的管家说它们似乎知



1978年11月26日宋庆龄寄给邓勤的贺卡

道我回家了，一直在歌唱！”她还常常在“home”（家）一词下面标下划线，着重强调家的意义，可见她对上海以及上海寓所的深厚感情和无尽的眷恋。

宋庆龄去世以后，我每次去上海，都要到宋庆龄故居去看一看。故居的陆柳莺馆长与我也算是老朋友了。自我们因为我关于宋庆龄藏书的提案而相识之后，我对陆柳莺馆长和故居员工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非常认可，信任感与日俱增。

经过对上海故居的考察和慎重的考虑，我和家人做出了一个决定，让家中珍藏的宋庆龄遗物回到属于它们的“家”中。宋庆龄在世的时候，非常喜欢我的长女邓勤。当年邓勤在瑞士念书，宋庆龄常常写信关心她的身体，鼓励她学业有成之后为国家做贡献，还送了一件做工非常精细的缎面棉袍给我女儿。由于香港冬天气温比较高，邓勤又非常珍惜这件礼物，视为珍宝，因此一直珍藏着没有穿过。2006年5月，得知宋庆龄故居正在整修，收集宋庆龄遗物，邓勤便托我将这件珍贵的礼物带到上海，捐给上海宋庆龄故居，作为永久的纪念。



2009年11月邓勤夫妇在宋庆龄文物馆藏书陈列展柜前留影

37. 将珍藏的宋庆龄书信辑集刊布

每次到上海瞻仰宋庆龄故居，我都要在西书房坐一会，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书房的墙上挂着当年我和邓勤与宋庆龄以及一些友人的合影。也是在西书房，我向陆柳莺馆长提及家中还珍藏着大量宋庆龄给我和家人的英文亲笔信，希望能让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发挥其应有的研究价值，为宋庆龄研究事业做贡献。陆柳莺馆长极为赞同并表示愿意帮助我完成此项愿望，她提议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为这些书信整理出版影印集，我觉得这是一件值得斟酌的好事情。

将书信内容公布于众，我是经过一番慎重考虑的。几年前，就有朋友动员我将宋庆龄的书信辑集出版，但是当时我有很多顾虑。因为这些信中的内容多为生活中事，当年宋庆龄非常信任我，信中谈了她对一些人的看法，而有



2009年4月我在上海
宋庆龄故居西书房留影

些信宋庆龄是要求我保密或者看后销毁的，就是因为她不希望信的内容泄露，因此我担心公布其中内容会对所涉人物造成伤害。此外，当时这些书信与其他亲友往来信件夹放在一起，需要花些时间慢慢整理，所以没有答应。随着年事渐高，周围了解宋庆龄的老朋友相继离世，了解宋庆龄的人越来越少，很多年轻人对那个时代的历史不了解也不感兴趣，我越发感到有必要将这些信的内容公开。特别是当年宋庆龄对埃德加·斯诺所著的《复始之旅》中关于她和家人的一些描写失实之处非常不满，但却因各种原因没能加以纠正。如果公开这些书信内容能够为宋庆龄实现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愿望，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为慎重起见，我还特别致电书信中所涉及人物的亲属，确信公布书信内容不会造成任何困扰之后，才将书信交给宋庆龄上海故居编辑整理。

而经过对宋庆龄上海故居的长期考察，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圆满完成这项工作。当我决定将这批珍贵书信交给上海故居整理编辑之后，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立即成立了由郑培燕等年轻的研究人员为主力的工作团队，着手开展工作。这期间，郑培燕与我就信中所涉及的事件背景及人物进行了多次的讨论，我对小郑这种认真负责、虚心钻研的工作精神非常认同。经过一年的努力，2010年5月，《邓广殷、孙君莲及邓勤藏宋庆龄书信集》（英文珍藏本）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辑刊布，设计精美、装帧考究，每封信都保持了原件的年代本色，我非常满意。5月20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举行了书信集的刊布仪式，向致力于宋庆龄研究事业的专家、学者赠阅。在此期间，上海故居还从这些书信中精心选取了60余封，筹备了主题为“海纳百川 明德惟馨”的展览，作为宋庆龄晚年生活的剪影。

书信集英文珍藏本推出以后，我又在思考如何能让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更好地发挥史料研究的价值。由于这些书信都是用英文书写的，而能读懂宋庆龄手写体的人很有



《邓广殷、孙君莲及邓勤藏宋庆龄书信集》（英文珍藏本）



2010年5月20日我在“邓广殷及家人藏宋庆龄书信刊布赠阅暨（英文版）刊布仪式”上



2010年5月20日我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长陆柳莺（右）、副馆长董卫的陪同下参观“邓广殷及家人藏宋庆龄书信展”

限，因而，有必要尽快将书信的内容翻译成中文。我得知上海宋庆龄故居在编辑整理英文书信集的时候，为了更好地把握书信内容，已将这些书信进行了初步翻译，作为内部参考资料。于是，我立即决定继续委托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辑刊布书信集的配套中文译本。2011年5月，书信集中文译本的编辑刊布工作也顺利完成。

38. 捐赠宋庆龄书信的小插曲

书信集中英文珍藏本的编辑刊布工作顺利完成以后，我最终下定决心，将这批书信正式移交给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永久保存。

其实我几年前便有了捐赠这批书信的意向，一是因为自己已届耄耋之年，希望还能能为宋庆龄的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二是因为在香港的气候条件下，在家中保存这些信件并不十分有利，因而我非常希望能有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

2009年3月我与陆柳莺馆长在香港会面，商谈书信集英文影印本事宜的时候，我将一套书信的复印件捐赠给了上海宋庆龄故居，并与陆馆长签订了捐赠协议，待我百年之后无偿捐赠这些书信的原件。然而之后不久，北京方面也与我接洽，希望我将这批书信放到北京宋庆龄故居保存，为此，我颇感为难。

在我的内心深处，我非常了解宋庆龄对上海的“家”的那种眷恋之情，所以将我家中所珍藏的宋庆龄赠的锦缎棉袍捐赠给了上海故居。我也相信这些信件放到宋庆龄上海的“家”中更符合她本人的意愿。而经过多年对上海宋庆龄故居的考察以及近两年就书信集编辑刊布展开的合



2009年3月18日我与陆柳莺馆长签订书信捐赠协议

作，我对上海故居各方面的工作都很满意。我曾于 2010 年 4 月在馆领导的陪同下前往上海市档案馆宋故居租用的文物库房里察看宋庆龄在上海的全部书籍，保管得很好。我还在馆领导的陪同下察看了宋庆龄生前常与我提及的“藏酒”，经过特殊处理，保存得也非常妥当。我坚信让这些信件“回家”是最好的选择，它们也必然会得到妥善的保管。因而，我非常诚恳地致信北京方面，解释我做出如此决定的原因，得到了北京方面的理解，对此我也感到很宽慰。

经与上海宋庆龄故居方面协商，我决定不再等到我百年之后，而是尽快将这批书信正式移交给上海故居永久保存。2011 年 5 月 29 日，在宋庆龄逝世 30 周年之际，我携夫人代表全家将近 200 封宋庆龄的英文亲笔书信捐赠给了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方特别举行了捐赠仪式。

如今，这些尘封了 30 年的书信，又回到了宋庆龄的家中，对我和家人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寄托了我们对宋庆龄的崇敬和怀念之情，也有利于广大热爱宋庆龄、致力于宋庆龄研究事业的专家、学者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宋庆龄晚年的思想、生活。虽然这些信件中所记述的都是她晚年生活中的一些点滴看似不起眼的小事，



2009 年 4 月我在
上海宋庆龄故居
参观宋庆龄藏酒

但是在我看来，这些恰恰能反映宋庆龄最真实的想法。从这些点滴的生活琐事中，我看到的是宋庆龄对国家与人民的热爱、对身边朋友的关怀、对青年后辈的关爱等等高尚的品质。我相信这些信的内容对宋庆龄的研究事业一定会有所裨益，如此也就实现了我捐赠这些信件的初衷。我也相信这些史料能够得到妥善的保管，能够更好地发挥史料研究的价值。



2008年5月我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唐闻生（左）会见



2009年9月30日我在北京宋庆龄故居举行的宋庆龄雕像揭幕仪式上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席胡启立（右）合影



2010年5月20日我的子女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向宋庆龄雕像献花



2010年我与子女祭扫宋庆龄墓



2012年4月我与夫人孙君莲祭扫宋庆龄墓



2012年4月我在金顺德先生（右一）及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陆柳莺（左二）、馆长金晓春（左一）陪同下参观宋庆龄陵园的宋庆龄生平展



2012年4月我在陆柳莺书记（中）、金晓春馆长（左）等陪同下参观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举办的“宋庆龄在寓所的国务活动展”



我出席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大会期间在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留影

后 记

光阴荏苒，宋庆龄逝世至今已经 30 余年，每当想起我与她老人家生命中最后十年的通信和交往，总会浮现出当年她在北京寓所款待我和家人，与她众多的朋友们一起欢聚的情景。这些年来，我尽我所能，为宋庆龄的事业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2008 年 5 月 29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 70 周年纪念座谈会暨宋庆龄樟树奖颁奖仪式上，我荣幸地被授予“宋庆龄樟树奖”。我认为这一殊荣不仅是给我的，也是给我全家的。自我九岁开始，我们一家便与宋庆龄的事业结缘，至今已有 70 余年。父亲去世后，父辈的友谊由我来传承。我继承父亲的遗志，以宋庆龄的事为己任。当我意识到自己正渐入老年时，我便经常带自己的子女前往参加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会的活动，并且一定带他们祭扫宋庆龄的墓地，瞻仰宋庆龄的故居，了解宋庆龄的生平和所开创的事业；我的小女儿在英国做整形医生，我曾要求她到海南文昌庆龄妇幼保健院做义工。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传承与弘扬宋庆龄所热爱的妇幼福



利事业，同时我觉得这也是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我希望邓家与宋庆龄事业的情缘能够继续传承下去，我也相信一定会传承下去。

2013年是宋庆龄诞辰120周年，非常感谢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的各位领导和故居的工作人员，为我编撰出版这本口述回忆录，使得我家与宋庆龄事业的情缘能够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也实现了我向宋庆龄诞辰献礼的愿望。在本书的编撰过程中，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提供了部分馆藏图片和大量的资料图片，大大丰富了书的内容。与此同时，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各位领导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大力的支持，文管委的专家学者也对本书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并提出了良好的建议，在此一并感谢。

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老朋友，原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福利会宣传联络处处长金顺德先生。这么多年来，是老金一直全程陪同我出席各种与宋庆龄事业有关的活动。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因身体不适，不能亲自前往宁夏，便委托老金代我前去为原州区的优秀教师颁奖。我戏称老金为我的“政委”。老金对我十分关心，照顾得非常周全，每次我来内地，只要有老金陪同，家人都特别放心。因此，我为宋庆龄的事业所做的一切，也离不开金顺德先生的鼎力协助。我非常感谢和信任他，我们也结成了多年的好朋友。

宋庆龄婆婆，我永远怀念您！

邓广旻

2012年12月



我与夫人孙君莲（右）、长女邓勤对宋庆龄充满怀念之情